

卷首语

8 月 27~28 日，为纪念苏东坡仙逝 910 周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全国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苏轼钟情常州，留下了许多诗词，现将其《浣溪沙·咏橘》：“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素描如下：

林光暗淡，霜叶暗藏，残花黯然，霜雪烘托着菊花凋伤的桀骜。友人枯坐，水面枯涩，生机枯竭，风雨点染着荷叶残破的风神。一夜霜、一阵风、一场雨，留得残菊惹霜露、枯荷听风雨、衰草接云天。

新橘青黄杂糅，经过一夜霜、连夜霜、夜夜霜淬炼、孕育、滋润，变得黄澄澄、金灿灿、亮晶晶，仿佛花苞绽放在绿叶之间、闪烁在绿树之中、燃烧在旷野之上。远离尘俗的竹篱、回归自然的茅舍和袅袅娜娜的炊烟，在浅丘的山腰、在橘林的深处、在青黄的缝隙露出画意、诗意和惬意的冰山一角。

风姿绰约的橘女在果丛中赏橘、摘橘、擘橘，是从唐代“压酒劝客”穿越时空而来的吴姬吗？橘皮的汁液芳香得穿透橘林、空气和阳光，橘皮的香雾喷溅得弥漫太湖、荆溪和蓝天，急不可待，猝不及防，惊诧莫名，香雾噀湿了她的手脸、衣襟和心魂。

初擘橘果、初尝橘瓤、初怯酸甜，羞涩的酸、荡漾的甜、凝结的冷，在表情中、在姿态中、在动作中隐隐约约，仿佛霜天之中的美女款款而行，仿佛绕梁三日的歌声袅袅不绝，仿佛明月松间的清泉淙淙而流。“二年洞庭秋，香雾长噀手。”一噀三日香，再噀香满园。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1 年第 4 期（总第 27 期）



目 录

□特 稿

- 全国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致辞 张志烈/4
天下 版图 代表 冲突 张戡炜/5
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杨胜宽/8
文星落处天地泣——苏轼仙逝常州纪实 苏 慎/15
东坡终老地藤花旧馆变迁考 戴博元/18

□苏学论坛

- 试探苏轼和谐理念的内涵 陈 弼/20
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赖正和/26
说说苏东坡之妾 孙开中/31
苏东坡的诗意之旅 刘小川/35
散谈乌台诗案——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江澄格/38
从《清明上河图》看三苏
在京城寓所、宅院和府邸 刘继增/40
亭亭欲立东坡魂
——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续篇（一） 吴继路/43
苏轼尺牍校勘记（上） 刘奇晋/49
再论苏洵族谱理论之宗旨 陈子彬/54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李 酌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希龙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 酌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本期关注

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
——品三苏中秋沙龙活动掠影 刘 寅/58

□诗文鉴赏

醉眼中与月光下的春夜薪水
——重读苏轼《西江月》 颜正源/59

□新书序评

郭福彬、郭文英编著《苏轼故事选》序 蔡心华/61
孟昭全编著《苏学发展学初探》序言 蔡心华/62

□苏学专家

情系东坡
——苏灿学习研究东坡文化记事 宋明刚/63

□研究史话

苏味道研究概述 苏士福/69

□景苏札记

偕友访桃榔庵 林开鸿 张志烈/76
中秋邀坡仙 王影聪/77
常州的月亮 王晋川/77
凤翔东湖拜苏公 刘川眉/78

□苏学动态

2009~2011年度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名单 秘书处/7
增补李酌为学会副会长 秘书处/75
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召开 宜居/79
东坡遗址，黄冈名片 流水/79
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组委会/80
项目合作，成果卓著 刘清泉/80

全国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致辞

张志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常州隆重集会，纪念苏轼逝世 910 周年。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理事、各位会员、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常州当地的各位领导、各位会员、各位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向筹办会议付出辛勤劳动的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文联各位领导，以及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的陈弼会长，苏慎、邵玉健副会长以及会务组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由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眉山县文教局发起，1980 年 9 月成立于眉山三苏祠。31 年来，18 个苏轼遗址地的党委、政府，如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河南平顶山、海南儋州、浙江杭州、陕西凤翔、山东烟台、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河北栾城、河南郑县、江苏江阴、广东从化等，纷纷与学会联合主办苏轼学术讨论会、纪念活动、国际论坛、东坡节等近 30 次，苏轼研究和传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2009 年 9 月，与苏轼“殆是前缘”的常州申请主办“全国第 17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会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来，因故更名为“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会员大会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十一届理事（扩大）会”，经过会务组的精心筹备，今天如期举行了。

在苏轼的人生旅途中，常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化解不开的情结。常州自古以来为苏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向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誉。苏轼《楚颂帖》云：“吾来阳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宋徽宗靖国元年（1101）这 30 年间，苏轼曾来常州 13 次，其中有史料明确记载其具体活动的为 5 次，而且曾 2 次乞居常州，

且有“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之句，可见他对常州的纠葛、迷恋、钟爱。

其二，人生旅途的终点。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赦北归，至虔州时，身患重病，斟酌再三，决定来常州养老，到常州一个多月，不料病情恶化，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于孙氏馆，即现在的藤花旧馆。因此，藤花旧馆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符号意义，那是别的苏轼遗址地无法替代的。

这次会议围绕“苏轼和谐理念与实践”研究、讨论和交流，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 10 次提到“和谐”问题，他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从古典文献、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去观照苏轼，你将会发现苏轼精彩纷呈的和谐世界观，它包括和谐社会观、和谐政治观、和谐博弈观、和谐人际观、和谐家庭观、和谐文学观、和谐生态观，等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的会议主题是与大政方针、社会发展、百姓愿望同频共振的、步调一致的、交相辉映的。

此次会议“征稿启事”发出之后，陆续收到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等 240 多件次，其数量之多，可谓是历次会议之最。可见，大家的踊跃之态和期盼之心。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现在会议终于顺利开幕了。在此，我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天下 版图 代表 冲突

——在纪念苏轼仙逝 910 周年笔会上的讲话

张戡炜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

公元 1101 年 8 月 24 日，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苏东坡先生，就在我们脚下的这块热土上，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呼吸。今天，全国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常州和常州苏东坡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们欢聚一堂，纪念东坡先生仙逝常州 910 周年，并举行景苏诗文笔会。受市领导的委托，我谨代表常州市委、市政府，代表主办方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文联、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以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向本次盛会，向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

盛会之上，岂能无辞。今天在这里，我先作一个中心发言。我不是研究苏东坡的，发言中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今天，我想说的大致可以概括为 4 个主题词：第一，天下；第二，版图；第三，代表；第四，冲突。

第一，天下。这两个字的来源，是顾亭林先生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总结成八个字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段话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国家”和“天下”分开来看，汉民族自从周朝代殷以后，政权的更迭，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之说，以至于二十五史中，有两度是外来民族主宰中原地区。我们还为“五胡乱华”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撰写了国史。说明汉民族在国家政权这一点上，心态是很开放的。国家政权，由谁来组成国家政权、政府，在汉族人眼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

所谓“天下”，章炳麟先生曾经下过一个定义，

无非是三条：第一，语言文字；第二，典章制度；第三，人物事迹。由这三者构成天下。

天下者，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总结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提出的观念。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化观念呢？我以为，这个观念的形成，跟苏东坡和与苏东坡一样伟大的汉民族文化人物的思想有关。换句话说，正是苏东坡和与苏东坡一样伟大的汉族的文化代表人物，最终为汉族奠定了“天下”。奠定了我们的语言文字以及它所表达的丰富内容，奠定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典章制度，记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两千五百年的人物事迹。这些东西，使我们今天拥有了可贵的精神宝库。

会前，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举行如此盛会来纪念东坡先生？纪念东坡先生其实就是纪念我们的“天下”。没有苏东坡就没有我们的天下，谈不上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天下。我们在为东坡先生举行这样的活动，正是为了超越政治，超越国家，甚至超越民族，来纪念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个伟大的文化元素。这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花这么大精力，来纪念苏东坡的理由之一。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在我们历史上，无论是外来民族还是我们汉族本身，其对于以苏东坡的景仰，换句话说，对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汉族文明成果的景仰，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一点，我们走到了一起，作为常州市的市民，东坡研究者，常州市党委、政府，正是有了这么一个基点，我们才能举行如此的盛会。

第二，版图。版图，原是国家概念。我们国家疆域在哪里，版图就在哪里，但人类文化学上有另外一个角度叫“文化版图”。这两种版图不完全一

样。在某种情况上，文化版图和自己的疆域版图是重合的，有多大疆域就有多大文化；在某种情况下，文化版图和统治疆域可能不是一回事。一种是文化版图小于实际控制疆域，一种是文化版图大于实际控制疆域。汉民族的文化版图，或者说汉民族的“天下”，从来是超越自己的实际疆域的。

在汉民族历史上一直有夷夏之辩，现在已没有夷与夏的区别。在古人语境中，夏是华夏，是文化中心区域，夷是文化的边缘区域。在这种语境下，就引出文化版图问题，华夏的疆域在当时并不大，夷的疆域很大，为什么夷会团结在华夏的周围，那是因为华夏的文化版图要远大于它的实际领域。华夏文化最大时，北边到贝加尔湖，东到朝鲜日本，往南涵盖越南，往西到西藏，其实都是汉民族的文化。换句话说，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典章制度在政权中起着核心的保护作用，这就是文化版图大于实际疆域的客观实际存在。汉民族历史上凭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文化版图，那就是因为有了苏东坡和与苏东坡一样伟大的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非子，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有了苏东坡，正是因为汉民族有如此伟大优秀的文化代表人物，才为我们汉民族撑起了巨大的文化版图，为汉民族核心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这是我们今天能在这儿跨越历史、跨越民族、跨越政治，甚至跨越政权，来纪念苏东坡的理由之二。

第三，代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如果其间没有自己的杰出的文化代表，能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涵盖整个民族，乃至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分子并肩组成世界文化高峰的这些代表，这个文化是无法长久发展的。纵观世界各国，世界各民族，有些民族衰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杰出的文化代表。如印第安文化，没有能产生一个伟大的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代表。同样，玛雅文化当年发展得如此强盛，由于玛雅文化中间没有一个杰出的留下自己典型的文化代表，我们对于今天玛雅文化为何会发展到强盛的原因，一无所知。柬埔寨的吴哥窟，其京城面积 200 多平方公里。中国古代最大的城池，天子之城方九里，换算成公里，也就 20 多平方公里。一个在南边热带、人均寿命非常短的国家，居然能有 200 多平方公里的王城，我们很难想象它当时是怎么弄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发展阶段，没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没有留下从弱小走向强盛的文化记录，没有总结出长久地保持强盛的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他们衰落了。

汉民族 2500 余年代代相继，以史为镜，保持了汉民族核心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这与我们这个民族有其杰出的文化代表有关。苏东坡就是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个。苏东坡是伟大的，可以理解成，与世界各民族的伟大人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说康德伟大，他只懂哲学；莎士比亚伟大，他只懂艺术。在诸多世界文化高峰中，能与苏东坡相比的，就我的认识范围而言，大约只有达芬奇才能相比，他们都是属于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物。苏东坡的文章，在宋代，天下第一，无出其右；他的书法，《寒食帖》被称天下第三行书，排在他前面只有他的前辈王羲之和颜真卿；苏东坡的绘画，我以为，他能打破艺术的陈规陋习。他画红的竹子，别人问他，竹子有红的吗？他反问，竹子有黑的吗？这一句所蕴含的艺术观，我认为，所谓西方的解构主义、达达主义，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我们今天，通过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前面讲到的典章制度、饮食、服装，等等，都是典章制度重要的内容之一。欧洲的面包和我们的东坡肉，都是人类饮食文化中的瑰宝。他甚至极爱美食，像孔子一样自创美味，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乃至苏东坡的身高，都是汉民族的优秀代表，当时 1 米 7 的身高，在亚洲都算高了。当时日本男人才一米五几。我们推出这位文化代表，是足以与世界文化代表人物并肩，并毫不逊色。我们之所以有天下，所以有巨大的文化版图，是因为我们有东坡这样的文化代表。

第四，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其实就是文化冲突。我们很多人喜欢说这么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不对，这句话有特定的语境。这句话的出处，来自于鲁迅。鲁迅当时谈论的时候，仅仅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特征，使用了这句话。有特定的文化语境，这句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彝族的服饰再美妙，它不可能成为世界主流。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要能够有能力形成世界文化主流的东西，才能算是民族特色。否则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其实就是消亡。

文化冲突很残酷，就是强势文化欺凌乃至灭绝弱势文化的过程。我并不相信一种强势文化把弱势文化侵吞后，说在文化融合中还能留下痕迹。我个人觉得这不对。想象一下，拓跋宏当年把鲜卑族并

入了汉族，尽管我们的历史学家到现在还在讨论隋唐皇室的鲜卑血统问题，但是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它所有的文化已经全部消失了。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天下、文化、版图、代表，他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已到了亡天下的地步了。前面说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衣服款式，饮食结构，都是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在座哪一位还在穿我们民族的服装（汉服），当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去掉后，我们现在就是洋人。窃以为，这也是我们这一群坚守在苏东坡研究阵地上，在始终不渝地宣传、研究、保存、发展我们汉民族文化，并做出努力的人们，还在保持着我们心中仅有的那一点“天下”。

这一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认为非常严峻，乃至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要把保持各民族多元性作为重要课题提出来，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课题，提到世界文化的概念上，这是为何？在我们的“天下”中，被章炳麟列为首位的语言制度。你看我们身边，我们的语言，普通话的强势推行，方言的逐步消失，两千多年方言的发展，包含的一些信息，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正在消失。法国多次表达对法语夹杂英语的愤怒，而我们主流的媒体，已经夹杂了英语，甚至在执政党的中央文件和国情报告中，CDP、CPR 英文缩写堂而皇之进入我们的语言文化，更别论是网络语言存在不正规、不规范状态。

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投水自杀，原因很多，我赞成陈寅恪说的一句话，他是在殉一种文化。王国维先生犹如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他感知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他为之献身一辈子的“天下”没有了，他可以在清朝留辫子，但他心中保存着汉文化的精髓。辛亥革命枪响了，他深深感觉到了，这种文化渐渐丧失，汉民族面对亡天下的可能，他内心深深的悲哀和绝望，他殉文化而走，这是一种态度。我们现在这里研究苏东坡，我以为两者并存。王国维先生等不及了，他先走了，他走的目的，是在激励我们要把汉民族的文化遗产下去，

综上所述，我以为，这四个关键词要倒过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与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汉民族文化如何保存下去，如何在世界文化高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是摆在所有汉文化学者，包括苏东坡文化学者面前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努力，在这种冲突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找到自己的文化代

表，扩大自己的文化版图，乃至振兴我们汉民族曾经有过的“天下”。我们今天为之做的一切努力，都包含在这四个关键词中间。今天这个聚会，其实是在书写着中国的文化史。我相信，中国文化史也会永远记住我们的努力。谢谢大家！

（常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常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州文史学者，张戡炜演讲、张军记录）

2009-2011 年度加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名单

徐州：徐新民、朱静、焦安玉、李慧、苏化友、王万里、郭吉明、胡德兴、王新文、曹学海、汪晓秋、郑敏芝、刘冰、葛传英、张瑾、王勇、金德欣、董雪、王海伟、陆明德

常州：颜正源、贺守邦、许植基、高纯林、冯士彦、高进勇、邵玉健、赵军、吴开荣

四川：尧军、吴健、欧忠剑、王浩宇、王伟、杨江帆、唐雅兰、付艳霞、张茂

河北：傅吉生、张斌、张景义、李宗昌

河南：乔建功

黄冈：张龙飞

安徽：苏有恒

高校：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雷汉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吕肖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郭杏芳：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教授

朱安义：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李新：保定学院中文系讲师、河北大学文学博士

喻世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副教授

安熙珍：韩国檀国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教授、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

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杨胜宽

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8月27~28日，在江苏常州举行。本次收到参会专家会前向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提交的论文100篇，根据论文内容，分五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实践研究

本次会议，以“苏轼和谐理念与实践”为主题，共计收到这方面内容的论文20余篇，对苏轼和谐理念的内涵，苏轼的人生观与社会和谐理想，苏轼的养生观、人际交往观、家庭观、生活观、博弈观、生态观、幸福观、生命观、政治主张中的和谐思想等分别进行了探讨，还涉及《东坡易传》中体现的和谐思想，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儒释道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苏轼践行和谐思想观念等问题，涵盖了会议征文启事20个论题的绝大部分，内容广泛，聚焦于“苏轼和谐理念与实践”的主题，有利于拓展苏轼研究的领域，深化苏轼的人生与社会思想研究，并为今天的社会和谐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在苏轼和谐理念的理論探讨层面，陈弼《试探苏轼和谐理念的内涵》，从“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三个方面探讨了苏轼和谐思想的基本内涵。杨胜宽《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理想》，认为苏轼的人生观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以此为检验标准，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观念，对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赖正和《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认为苏轼的政治变革主张，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他的富民、利民思想与作为，是为了缓解官、民利益矛盾，有利于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朱海涛《和顺、和善、和睦——浅述苏东坡的和谐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苏轼和顺自然、和善百姓、

和睦邻里的精神与行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今天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齐梅鹿《不是心中有定力，哪堪冰炭置一胸——试论苏轼“中国文化心灵”中的“和定力”》，提出苏轼的“文化心灵”是以和顺、调和、应和等内容为灵魂的，并深入分析了其“文化心灵”的六个方面的特质，认为具备这种心灵，可以德润天下、心和万物、身历万难。其观点与论述角度具有启发性。刘清泉《谈苏轼的和谐博弈观》，从弈棋“小道”切入看苏轼的和谐思想，认为苏轼的《观棋》博弈观是和谐娱乐，人际博弈观是和谐相处，政治博弈观是和谐竞争，文艺博弈观是和谐发展。高纯林《〈东坡易传〉的和谐思想之初探》、吴洪生《〈东坡易传〉的和谐思想》两文，都侧重于苏轼代表性哲学著作《东坡易传》体现的和谐思想之探讨，并结合苏轼的哲学、文化、政治思想与人生观念，分析了《东坡易传》的和谐思想内容。关于苏轼和谐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王克群《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儒释道》、晏飞《苏轼与佛禅》都侧重于解析苏轼和谐思想受到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的明显影响，认为苏轼善于灵活地、综合性地吸收传统文化于己有用的成分，他的思想与人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对不同传统思想吸收的侧重与选择，体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朱安义《苏轼养生观念阐释》、熊朝东《苏轼精神养生的阳光心态》、许淳熙《儒释道养生思想与苏轼》三文，从不同角度对苏轼的养生观念进行了探讨，朱文从神闲气定、随缘自适，张弛有度、动静相生，食疗为主、辅以药物，取人所长、善作总结四个方面，归纳了苏轼的养生思想观念；熊文则结合苏轼多灾多难的人生，分析了其以良好的修养、乐观的精神、平和的心态处之，是一条文人充满阳光的养生之道；许文对苏轼与儒释道养生思想渊源关系进行了

考察,认为苏轼在接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同时,作了丰富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点。

在苏轼和谐理念的实践研讨层面,陈慧君《青松出涧壑,七里闻风声——苏轼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及探由》,通过列举分析苏轼的和谐人际关系事例,认为显赫的文名、卓越的政声、高尚的人品,是其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主要原因。万波《浅析苏轼在水利建设方面的生态意识》,结合苏轼在地方官任上实施的水利建设工程,考察了苏轼所反映的超前生态意识。苏轼的生态观,对于今天保护生态环境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具有启迪意义。江澄格《苏东坡知足常乐的自处之道》,结合考察苏轼仕途履历变化,分析总结了其对己力求容忍,待人务必宽厚,处世首重和谐的自处之道与人格品质。李新《论苏轼对于传统儒家和谐理念的践行》,分析了苏轼践行儒家仁者爱人、济世为人、爱物同人的思想观念,实现了与亲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李宗昌《一个和睦家庭成就了旷世奇才苏东坡》,考察了苏轼成为旷世奇才与其家庭和和睦的内在联系,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造就千千万万个和睦家庭,这是古今共同的启示。颜正源《苏门之和:一个北宋文学团体的往事——试探苏东坡和谐观之践行》,认为苏轼以德才双馨的魅力来吸引、选拔、团结苏门人士,这个文学团体的诞生、成长、发展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苏轼践行和谐思想理念结出的硕果。邵玉健《寄情山水,对话天地——探析苏轼生命观的转折升华轨迹》,考察了苏轼从遭遇乌台诗案到谪居黄州的数年间,走过了生命的跌宕期、迷茫期、珍爱期、升华期的变化历程,认为在此过程中,苏轼逐渐实现由“非我”“小我”到“大我”的寄情山水、对话天地之生命境界的提升。黄玉峰《人生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幸福观和实践及其对当今的启示》,从无所保留的付出与自由自在的创造、和谐融通的人际关系、无可无不可的良好心态、包罗万象的业余生活、并不迷信的宗教情怀五个方面,分析了苏轼充满幸福感的人生意味,认为据此设想“国民幸福指数”,对于现代社会和谐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物质逐渐丰富、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的当今社会,值得引起深思。周二中《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略论苏轼之闲》,论述了苏轼在游观自然、饮酒吟诗中所体验到的闲散乐趣,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内容丰富、况味复杂的生活方式。

二、苏轼精神研究

涉及苏轼精神总结探讨方面的论文有6篇,主要从苏轼精神遗产的梳理提炼与如何学习发扬其优秀精神品质两个角度开展研讨。

杨常沙《试论东坡精神》,把苏轼精神概括为善良无私、一心为民,正直无畏、直言勇为,博学善思、敬业精事,坚韧宽容、人格完美四个方面,认为它们体现了苏轼精神的真、善、美内涵。苏轼精神怎样总结与提炼,还需要更加深入广泛的探讨。贺守邦《向东坡学“思无邪”》,认为苏轼对孔子“思无邪”的话有着自己的理解,并对其无思之思、不思之乐进行了分析,提出苏轼基于此形成的浩然正气,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与发扬的。蔡啸《浅析苏轼人生追求之一——创新与实践》,对苏轼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一生的仕途经历中,不断在创新——实践——创新的追求中提高与完善着。刘继增、袁桂娥《苏轼廉洁从政的人生观及其渊源初探》,认为苏轼廉洁从政的人生观,铸就了其特有的官德、官格与人格,这种人生观源于家庭教育、学堂教育及北宋的廉政生态,儒家思想是其文化渊源。这些对于今天的廉政文化体制、机制的建设,应该具有借鉴和启示性。苏太模、苏太潮《弘扬东坡精神之浅见》,提出要弘扬和学习苏轼民为邦本、为民请命精神,执政为民、多办实事精神,科学决策、善政惠民作风,一生为民、逆境惠民精神,正直善良、清正廉洁品德。苏群《弘扬东坡精神,如何当好市长——浅谈几点认识》,围绕当代城市的市长如何弘扬苏轼精神,当好市长,提出了熟悉市情、明确职责、重视城市规划与统筹发展、提升自身素质、树立正确政绩观等五点看法。

三、生平、性格、交谊、政绩研究

对苏轼生平经历、为人品行、社会交往活动及突出政绩开展研究的论文25篇,内容比较宽泛,其中不乏对一些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争议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于苏轼个性品格探讨的论文有:郑秉谦《“东坡性格”漫议》,对苏轼身上存在的矛盾性格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随和与尖刻、“必有所忍”与“性

不忍事”、真雅与鄙俗、心存社稷与皈依自然，对立统一于苏轼的性格构成中，体现了其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孙民《苏轼的士大夫特质》，对北宋士大夫特质的共性与苏轼性格中体现的士大夫性格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志在利民、气以辅志、言必谔谔是苏轼性格中的明显特质。徐定辉《论苏轼的诗化人格》，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苏轼的诗化人格品性，即：济世安民、忧国忧民、独立不惧的人格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旷放、处时安顺、超然物外的通达个性，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珍爱生命的人生态度。

林冠群《释苏轼的人性论》，对苏轼的人性论思想进行了辨析，认为苏轼的人性观，不同于孟子性善、荀子性恶、扬雄“性善恶混”，而与告子的“生之谓性”人性观最接近。苏轼的人性观，具有辩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意义。

关于苏轼社会交往情谊的论文有：周云容《君子之交，相投即谊——以苏轼与六位梦得的交谊为例》，分析了苏轼与马梦得、张梦得、赵梦得、范梦得、高梦得、吕梦得的交往情形，展示了苏轼与这些友人的深厚情谊，认为其中体现了苏轼处理人际关系的和谐之美。傅吉生《声融金石，光溢云汉——从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浅谈苏辙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具体分析了苏辙祭兄名文《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认为该文告诉了后人一个全面的苏轼，它体现了苏轼兄弟之间的深厚手足之情。苏士福《乌台患难铸真情》，侧重讨论了在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弟弟苏辙、夫人王闰之、侍妾王朝云等亲人或奔走救助、或焦急忧伤的行动表现，认为在重大患难之中，铸就了其家庭亲情。张斌《苏轼亲情名篇里的感动》，通过对苏轼《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三篇作品的分析，认为这些作品成为千古名篇的全部秘诀，在于其中在在皆有的充盈真情，与对千百年来读者的永不衰竭的“感动”。徐丽《每逢蜀叟谈终日——有感于苏轼的家乡情结》，通过对苏轼一生所写的有关家乡的诗歌作品的分析，从思乡、望乡、梦乡三个层面，肯定了苏轼热爱生活、热爱故土及其浓郁而真挚的故乡情结。

关于苏轼生平经历，其政治变革主张及所持立场成为本次研讨会论文的关注点之一，有三篇论文涉及这方面的讨论。惠光启《再论苏轼是深受人民

喜爱的政治家——兼驳康震“苏轼政治保守动摇”论》，重申了作者21世纪初所提出的“苏轼是人民喜爱的政治家”的论点，用苏轼的政论文章和一生突出政绩为论据，反驳了康震“苏轼政治保守动摇”的观点，认为苏轼是一位具有独立超然政治品格、居中央则可以治国安邦平天下、居地方则可以保境安民、造福一方、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徐新民、王海伟《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通过对王安石和苏轼关于变法的理论主张与变法措施的对比分析，认为王安石是一位“聚敛民财”的“国本主义”者，苏轼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彻底“民本主义”政治家，这是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而苏轼一直受到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刘艳琴《术不同不相为谋——略谈苏轼、王安石、司马光在治国方略上的异同》，提出苏轼、王安石、司马光三人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术”的矛盾，而非“道”的矛盾，即他们在要求变革的愿望与目标上是一致的，在怎样变革的方法与途径上有所不同，认为苏轼藏富于民的政治主张，是北宋变法的正确道路。他们的观点，其意义不在于把苏轼归于何种政治阵营，而在于提出了封建社会变法的利益实质问题，为人们索解何以古代政治变革总归于失败的深层原因，提供新的思路。

沈成嵩《苏东坡与农耕文化》，在考察苏轼一生仕途履历的基础上，对苏轼亲身参与农事劳作，在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尝试果蔬种植等，认为苏轼为中国丰富的农耕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周奎生、郭庆兰《苏轼的治学之道》，从博闻强记、熟读精思，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亲身实践、善于总结，推陈出新、着意创造四个方面，归纳为苏轼成功的治学之道。高进勇《苦寻长生之药——苏东坡与炼丹术》，对苏轼一生崇道学仙、炼丹行气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中体现了“以生为贵”的宗旨，摒弃了成仙的幻想，对后人学养生之术，提供了启示。涂普生《苏东坡移汝居常的哲学考量》，对苏轼结束黄州之贬、移汝居常的选择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其间具备观变酬志、归隐避祸、恋常宜居的综合哲学考量，体现了苏轼在特殊生存背景下的人生智慧。

薛仲良《苏东坡与江阴》、田柳《苏东坡与江阴情缘》、程以正《苏东坡与芙蓉城》三文，都对苏轼与江阴的关系作了考察，涉及苏轼在江阴的行踪、交往以及创作等方面的情况，对帮助我们弄清

楚苏轼在江阴的具体活动情况具有积极作用。

刘继增《苏轼究竟患何病而死》，对苏轼的病情死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轼所患之病，中医称为髓枯（急劳）症，西医名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苏轼根据其对中医的深入研究，对症治疗，其医方成为古代的名方，他对这种病的治疗医方，比西方早了七、八百年。

苏慎《文星落处天地泣——苏东坡仙逝常州纪实》，对苏轼从儋州北返常州及病逝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梳理。周晓东《北葬郟县的原因分析》、乔建功《漫谈苏东坡葬郟探因之旅》两文，对苏轼死后葬于郟县的背景与原因进行了分析，周文具体探讨了苏轼葬郟的生前愿望、信守兄弟之约、尊重南死北葬风俗及魂归故里诸多不便等复杂原因。乔文侧重考察了宋、明以来围绕苏轼葬郟原因开展探讨争论的演变历史，中间形成了“练汝说”、“形胜说”、“求是说”诸观点，作者认为，苏轼把郟县作为死后的安葬之地，是综合了各方面考虑的无奈选择。

关于苏轼为官政绩的论文有：任永辉《苏轼签判凤翔政绩述评》，对苏轼任职凤翔签判期间，改革“衙前役”、“以官榷与民”、免除积欠、浚修东湖、祈雨重农等方面的突出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宋惠国《心系国防民生，情寄山海风物——略述苏轼在登州及沿海之作为与作品》，在考察苏轼短暂知登州期间行旅、创作基础上，梳理总结了苏轼建议加强沿海防务、建议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建议推行给田募役法等方面的保国利民、因法便民等积极举措。周嗣元《赞历史上关心民生的好官员苏轼》，则对苏轼一生本着民生思想、惠民精神，在地方官任上的所做的突出政迹进行了简要评价。

四、文学艺术创作研究

围绕苏轼文学艺术创作进行研究探讨的论文，计有28篇，其中，苏轼词的研究，苏轼书画艺术研究，成为本次会议论文内容集中的亮点。

有关苏轼诗词文研究的论文有：张志烈《谈苏轼常州所作词》，对苏轼元丰七、八年间居常州所作的6首词意义进行了考辨，包括各词具体的写作时间、写赠对象、词意内容，认为这些词体现了苏轼买田成功的喜悦心情和“常州情怀”。王文龙《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认为苏轼词的创作，贯穿其中的是“人生咏叹调”式的思想情怀，反映

了作者对出仕与退隐、理想与现实、宇宙与人生等重大人生矛盾的思考，体现出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的通达等积极的思想成分。许伯卿、胡学琦《论苏词的反正之功》，认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本质意义，是使唐末五代以来的绮艳词风，回归诗骚的优良风格传统，苏词的反正之功，在于揭示了文学发展与文学创作“自立与真情”的基本规律。胡学琦、薛建非《论苏词的叙事性》，对苏词描写型叙事、词序型叙事、自叙型叙事等叙事方式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形成其叙事性表达特征的主客观原因。词的叙事功能与表达特征问题的探讨，是一个较少深究的话题。阎慧霞《“外刚内柔”：苏词的另一种解读——以〈大江东去〉和〈明月几时有〉为例》，对一般教科书把苏词风格概括为“豪放”提出不同见解，通过《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的具体解读，认为一般认定的苏轼“豪放词”，其实是表里不一的“二重矛盾组合体”，其特征是外刚内柔。日本学者保刈佳昭《苏轼歌咏朝云的诗和词》，梳理了苏轼歌咏侍妾朝云的诗和词，分析了这些词所表达的内容与情感，比较了两种文学体裁的不同风格与作用，认为词的表达特点是如实、直接，诗的特点则是取舍、间接，诗的表达作用是情绪的“自解”，而词的作用则是感情的“升华”。刘伟《苏轼禅意诗审美内涵抉要》，对苏轼的禅意诗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苏轼的禅意诗，体现了诗人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等审美特征，拓宽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充溢着诗人浓郁的禅趣和深沉的人生思考。乔云峰《论苏轼密州诗词中的归隐思想》，对苏轼有关密州的三百多篇诗词作品所体现的归隐思想情怀作了细致分析，并考察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内外在原因与值得重视的文化意义。

苏轼与常州的缘分问题，有多篇论文论及。颜正源《苏东坡诗词中的常州风情》，对苏轼诗词中涉及常州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与世道人情内容作了研究分析，认为苏轼在诗词中对常州风物不吝赞美之辞，表现了他对常州的好感与热爱，他选择居常并死于常州，是其“常州缘”的最好说明。储盈《从苏轼“南兰陵以歿”谈他有关齐梁的诗》，重点围绕苏轼题咏常州太平寺涉及的齐梁人物与历史典故，探讨苏轼诗词风格与齐梁诗歌及乐府的渊源关系与独特情缘。薛国屏《东坡三叹——〈东坡

常州奇缘》序》，是为《东坡常州奇缘》一书所作的序言，文章对苏轼在常州的居留及终老的情况作了简要概述，认为苏轼一生十几次到常州，并终老于此，说得上与常州有“奇缘”了。

李永成《苏轼与宋代杂剧传统》，对苏轼诗文中体现的特殊俳谐情调与宋代包括蜀中杂戏在内的杂剧夸饰、铺张及讽喻等特征之间的关系与所受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苏轼诗文风趣机智之中往往讽喻当世的表现特点，是引发乌台诗案的重要因由。杨子怡《岭海书牋说东坡》，对苏轼谪居岭海间七年所写书牋进行了专门研究，从中考察了苏轼此时的生存环境、处世心态、悯世情怀与情感世界，认为苏轼的至情至性，在他晚年的书牋中体现得最为真实、充分。张涛《论苏轼的〈黄楼集〉》，对苏轼知徐州所作诗词文的作品集《黄楼集》作了专门研究，涉及《黄楼集》的编订情况、苏轼黄楼时期的交往及苏门的初步形成、《黄楼集》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黄楼时期创作的影响诸方面内容，认为从思想成熟、文学风格定型、文坛领袖地位确立、苏门创作流派形成等角度看，苏轼徐州时期的创作都值得引起重视。

周桂钿《评苏东坡议贾谊》，对苏轼的散文《贾谊论》进行了评析，认为苏轼在文章中阐述的“待”与“忍”的处世之道是不可取的，他对贾谊的批评也不够公正，还表示赞同王夫之的观点，认为苏轼的才能尚不及陆贽，自然更不及贾谊。蒋昌《综述苏轼萧统论》，对苏轼题跋中涉及萧统与《文选》的评论文字作了梳理分析，认为苏轼对萧统的批评言论，有当时具体的时代和身世背景等复杂因素，不能简单地是其是，非其所非。

关于苏轼书画艺术研究的论文，数量多、视角新、较有深度。陆林深《苏东坡的书法美学思想》，从八个方面对苏轼的书法理论作了系统分析，涉及书法风格的多样性、包容性、独创性、“尚意”书法、继承与创新、书法功夫、书法创作心态等艺术哲学理论范畴重大问题，体现了全面的书法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思想宝库，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借鉴。李景新《苏东坡北归书法创作之考论》，考察了苏轼结束儋州贬谪生活北归常州逝世的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里的书法创作情况，重点对存留至今的11幅作品作了评析，得到的结论是，该时期苏轼的创作意识强烈、创作热情高涨，作品中更多体现出大自然对其书风的影响，是其书法创

作的最后辉煌。崔慧娴《从苏轼政治生涯看其书法风格之嬗变》，考察了苏轼一生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变化，认为苏轼生活境遇的变迁、政治生活的跌宕起伏深深影响了其书法风格的变化，在黄州贬谪时期，逐步形成其“尚意”的书风，改变了唐代以来形成的书法审美观及评判标准。戚荣金《宋代文化浸润下的苏轼书学》，认为宋代文化的“内倾性”促成了苏轼书学“自然”的审美观、宋代文化的“创新性”铸就了苏轼“出新”的创作论、宋代文化的“兼容性”成就了苏轼书学“兼容”的风格论。文章还讨论了苏轼“尚意”的理论主张与“尚法”创作面貌的关系问题。杨加深《苏轼“难为贵”书法评判标准之当代启示》，专门探讨了苏轼“难为贵”的论书与评书标准，及“难”与“新”二者的关系，认为这一理论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对当代书法创作，都具有积极启示意义。柳书咸《解一字之疑，了一段公案——苏东坡〈致杜氏五札之五〉“尊丈”与“尊文”之辨》，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苏轼《致杜氏五札之五》书帖“尊文”一词作了辨析，不同意有人解读为“尊丈”的观点。

马希玲《浅论苏轼画论所表现的士人特质》、徐晓洪《丑怪的坚美，萧淡之涌动——从枯木情结看苏轼的刚直人生》，都侧重于苏轼的绘画理论与实践跟他的性格之间的联系探讨，马文对体现宋代士大夫特质的“士人画”风格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苏轼“尚意”、“尚理”绘画理论中“道”、“真”等重要内涵，以及士人特质在其画论中的具体体现。徐文对苏轼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枯木情结进行了考察，并论述了这一情结形成的原因及其重要价值。奚建伟《鉴赏书画名篇多，自古唯有苏东坡》，对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等诗文鉴赏名篇作了分析。苗贵松《苏轼题画文中的空间意识与生命情怀》，通过考察苏轼二百多篇题画文，认为这些题画文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苏轼所题绘画作品的创作背景、画作立意等情况，同时表现了题画人壮志难伸的苦闷与豁达高远的意境，浓缩了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美学主题。徐晓洪《超然物外，悦心自得——论苏轼的收藏实践及其观念》，对苏轼书画等文物的收藏方式、收藏渠道、收藏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轼的收藏观念，体现了士大夫文人的气节及“人本之乐”的审美境界。

五、后世影响、地方文化建设研究

关于苏轼对后世的影响,及利用苏轼文化资源搞好地方文化建设,为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服务的论文共20篇,从古至今,由文学到文化各方面,内容广泛。

周焕卿《苏辛之风与明清之际的词坛》,考察了明末清初词坛对苏辛词风的认识与接受过程,并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豪放词风的发展演变情况。谭坤《论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从祭祀东坡、唱和东坡诗韵、瞻仰东坡遗迹、研究东坡诗歌四个方面分析了清代常州文人接受苏轼诗学思想滋养与人格风范熏陶的情况,认为他们在接受苏轼诗学精神熏陶的同时,又追求超越与创新,使得清代常州诗学形成融性情与学问为一体的地方特色。龚景春《才华·品格·仁慈——〈梁溪漫志〉中的苏东坡》,研究了费衎《梁溪漫志》涉及苏轼才华、人品、慈爱等相关记载,认为其中展现了一个富于才学、人品高尚的真实苏东坡形象。陆士伟《洪迈笔下的苏东坡其人其文》,对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涉及苏轼评价的材料,逐条进行了分析,认为洪迈用独特的视角评价了苏轼其人其诗其文,由于洪迈的学养与东坡相近,所以《容斋随笔》对苏轼的评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叶舟《苏东坡舣舟亭:文化景观、人文精神与权力纠葛》,由苏轼在常州逝世以后常州人建舣舟亭以志纪念之事,深入考察分析了自清朝乾隆皇帝南巡将其改建为行宫,名其亭为万寿亭,引发苏轼所代表的文人精神与乾隆为代表的皇权意识的复杂意味与纠葛,认为舣舟亭的千年变迁与兴衰,象征着中国古代士人的奇特命运与复杂心态。视野独特,很有深度。龚景春《〈红楼梦〉与苏东坡》,对《红楼梦》中涉及苏轼诗词典故等内容进行了考察分析。冯士彦《高晓声论苏东坡》,介绍了作者与高晓声通信中高晓声对苏轼的评价,认为由于二人的遭遇相似,所以容易古今心意相通。凌鹏举《浅谈“苏东坡诗注”》,对宋、元、明、清学者注解苏诗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王十朋、施元之父子及清代查慎行注苏诗的成就、特点与价值进行了评判。

余忠良《储欣诗歌与〈东坡书院〉解读》,对清代散文家储欣《东坡书院》一诗进行了解析,并评价该诗的风格与价值。

周启明《千年世界名人苏东坡》,对苏轼文学、艺术、政绩等方面的贡献作了概括性评价,提出要学习其人格,弘扬其文化精神,促进今天的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马湘君《苏轼影响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论述了苏轼文化给苏轼遗址地城市带来的地方文化发展繁荣、盘活文化产业、提升文化品牌价值的几大机遇。崔勇《关于常州苏轼文化旅游及景点建设的建议》,提出了常州旅游规划的三大原则和六条规划与建设建议,也对境内东坡文化景点建设提出了十点具体意见。陈弼《景苏情怀》,重点评述了常州历代士人和民众对苏轼的崇敬与纪念情况,认为这是一道独特的常州人文景观,也是常州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证明。戴博元《东坡终老地藤花旧馆变迁考》、赵军《藤花旧馆海棠红》两文,均围绕苏轼在常州的终老地藤花旧馆作了考察,戴文对苏轼死后历代文人瞻仰、纪念藤花旧馆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梳理,能够看出苏轼在后来的巨大影响并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赵文则侧重考察了苏轼一生喜爱海棠,后世为了纪念苏轼,在藤花旧馆建海棠坞栽种海棠以表怀念的相关情况。苏化友《东坡肉民本情愫钩沉》、李文瑞《漫说东坡肉》两文,都围绕名菜东坡肉展开相关话题,苏文对苏轼黄州贬谪时期选择“价贱如泥土”的猪肉烹食,实在是由于生计困窘所迫,认为苏轼后来被贬惠州时“不敢与仕者争买”羊肉、在儋州向黎民推介“吃猪肉”,都体现了苏轼的“民本”情愫。李文则以随笔的形式,漫谈黄州、杭州、常州等地的“东坡肉”,并根据作者的见闻,补充了宜兴《蒋氏家谱》中一则关于东坡肉制作方法的罕见记载。陆林深《东坡懒板,千古佳话》,考察了费衎《梁溪漫志》所记载的晋陵守陆元光在苏轼病重期间送其懒板及这种躺具的形制与功能,以及这块懒板在南宋受到陆家后人珍视的有关情况。冯士彦《苏东坡在黄州复活》,梳理了苏轼谪居黄州的生活及文学创作及其留下的众多文化遗产,认为苏轼在黄州的复活,不只是推广东坡肉、恢复东坡文化景点等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要弘扬苏轼精神,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环境。

苏祁《浅谈苏姓文化》,对苏姓文化的起源、苏国文化、苏秦文化、苏武文化、苏颂学、苏姓谱牒文化、三苏文化等进行了梳理,显示苏姓文化研究正蓬勃开展,并就“世苏会”目前的工作情况及今后的研究设想作了介绍。陈子彬《画龙宜点睛》,

画蛇不添足——恭读进水老先生致管教授信及附件若干浅见》，对苏味道第三十九代孙苏进水所编《芦山苏氏大宗谱》涉及的苏姓宗族的发展、相关族谱材料进行了辨析。

综上，本次研讨会论文，体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主题鲜明，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社会和谐，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理想。本次苏轼学术研讨会围绕苏轼和谐理念及其实践，从不同侧面与角度进行广泛探讨，不仅有利于拓展苏轼思想、文化的研究，而且努力联系实际，把苏轼和谐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与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苏轼的不少观念和言行，为今天提供了值得借鉴和吸收的有益启示。

第二，论文数量众多，研究内容广泛。

本次会议收到国内外学者研究论文百篇以上，地方苏轼研究学术团体成员撰写的论文占有较大比重，特别是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及其下属的县级研究会，组织会员围绕会议主题及苏轼与常州、苏轼书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集中而有分量；研究内容既有传统领域，也有新领域、新视角的拓展，比如苏轼和谐思想的各个方面，苏轼和谐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苏轼遗址地城市的经营策略、苏姓文化研究等，对于无论是苏轼本身的研究，还是进一步利用其文化遗产资源，都具有深化和拓展意义。

第三，既体现对苏轼的敬仰爱戴，又具有充分的学术讨论自由空间。

许多论文表现出研究者对苏轼人品、文才、政绩、杰出成就的高度推崇，特别是近年来掀起总结、学习苏轼精神的新热潮，表明苏轼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远不止文学艺术、遗址景点等物质层面，其实还有更值得发掘和提炼的精神文化内容。我们学习苏轼，不在于他的才大艺高，而是他的高尚精神、生活智慧、成长经验，对当代的人与社会，具有有益的教育启发作用。有的学者就当前苏轼研究的某些热点问题、争议问题展开学术争鸣，发表各自的见解，比如苏轼在北宋中期政治变革浪潮中的是非得失，苏轼评价历史人物的某些观点等，不论其结论是否科学，这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学术风气，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第四，苏轼遗址地兴起研究苏轼热潮，发掘其文化资源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成为新趋势、新热点。

随着国家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地都把发展的新增长点瞄准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苏轼一生任职、谪居的足迹，遍及天南海北，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近年随着各地苏轼研究团体的成立，发掘、宣传、利用苏轼文化资源成为普遍选择，且有方兴未艾、日益升温之势。这有利于苏轼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针对性增强，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的转化意识更加明确。只要引导得当、注重点与面、古与今、研究普及与开发利用的合理结合，将有利于推动苏轼研究工作开展与苏轼优秀遗产的弘扬和利用。

当然，本次研讨会论文也存在一些薄弱点与不足处：部分论文学术分量不够，研究内容重复，结论较少新意，缺乏严格的学术表达与学术形式规范；有的论文对苏轼的敬仰、崇拜的感情居多，而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和评价苏轼的研究态度可能有所不足；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价值，怎样与深入的学理研究、文本研究、“全人”研究、地方综合和长远发展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中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整体观照和全面思考，有待以后进一步加强。

2011年8月27日

（乐山师范学院教授、纪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杨胜宽副会长作《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文星落处天地泣

——苏轼仙逝常州纪实

苏 慎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是年苏轼66岁。六月十五日,苏轼一家30余口乘船自润州(镇江)由运河赴常州。这条常润道,他已经往返数十次,熟悉而亲切。这次是一别十年之后的重返。

苏轼自去年五月,在海南儋州贬所获准北返,一路上经车舟劳苦,历经一年,五月初抵金陵(南京),在金陵、真州(仪真)、润州之间又逗留一月有余。苏轼一家所乘之船停泊在真州通长江的河浜中,盛暑骄阳,酷热难当。一家人在船中无法安生,几乎每夜都在露天里熬过。苏轼在当时就算高龄了,又从瘴疠之地的海南返回,一年多来行走道途,以舟楫为家,旅途劳顿,精力衰颓,体质虚弱,加以盛暑酷热,日夜不眠,河道薰蒸,秽气侵人,他终于病倒。六月初三,又因饮冷过多,中夜暴下(腹泻),折腾整整一宿。至六月初十,苏轼精神稍好,能扶杖徐行几步。十五日,舟赴常州。

此前,他给常州挚友钱世雄(济明)写信,商议在常州买房或租房:“此行决计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就可典买者否?”又云:“如闻常州之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若果可居,为问其直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别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与公杖履往来,乐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所云《哀词》,乃指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常州赈灾,适值钱世雄父钱公辅逝世,苏轼赶到钱家祭奠,并作《钱君倚哀词》。哀词中有“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所云“践哀词之愿”,即当年就欲到常州归息,因为这里有那么多的“君子”。现在,如有屋可居,可与世雄“杖履往来,乐此余生”了。世雄因苏轼牵连被罢官,时闲居家中。苏轼初出茅庐在京城考中进士的琼林宴上,与常州籍

同年胡宗愈、蒋颖叔、单锡等结成毕生好友,曾有“卜居江南”的“庐里之约”。但那毕竟是兴致所至,随口而言。后来十多次亲身到常州,领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他把侄女(苏轼次女)嫁给常州人胡仁修,把外甥女嫁给宜兴同榜进士单锡。“眷此邦之多君子”,便萌发了安家的愿望。他在中年时,两次乞居常州,两次在常州宜兴县购买田庄,两次在这里安过家,而今,胡宗愈已作古,自己还是如约而至。

船至奔牛埭(今武进奔牛镇),钱世雄早已迎候。“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余无言者。”(《春渚纪闻·坡仙之终》)过了一会,苏轼又说:“某前年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起身开箱,却找不到钥匙。世雄安慰他,你会康复的,来日方长,何急忙着交待这些。

船渐入常州城,时天仍酷热,常州士民聚观万劫归来的苏轼,运河两岸,千万人围观而随,争相一睹苏学士风采。苏轼“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舱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曰:莫看煞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邵氏闻见后录》)船抵常州城内顾塘桥,全家迁寓顾塘河与白云溪畔孙氏馆(即今前北岸藤花旧馆)。

抵常后,他便上表请以本官致仕。在《乞致仕状》中说:“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了饷粥。所以崎岖万里,奔归常州,以尽余年。”很快获准养老。钱世雄“往日造见,见必移时,(轼)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视,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春渚纪闻》

卷六)

六月末，杭州好友僧人参寥（道潜）派弟子来常看望。曾因苏轼受牵连遭劫难的参寥被迫还俗。现在又回到了智果禅院，苏轼回信深表感谢。

七月初，苏轼病情似有好转。时常州大旱，先生一如既往关心民间疾苦，将他多年来的藏品古人黄荃画的龙，请钱世雄等一同祷雨，果然真是下了一场透雨。为此，常州青年书生袁黠写了一首五绝《久旱得雨诗》：

青盖美人回凤带，绣衣男子返云来。

上天一笑浑无事，从此人间乐有余。

书以呈苏轼，先生大喜，为之重写。后袁氏刻石藏于家中。

苏轼病中最大的乐趣是玩赏书法刻印，“卧阅四印奇石，失病所在”。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还不遗余力地奖掖他人。他看到常州一些不知名作者的诗文佳作，总是倍加赞赏。当他看到年轻书生袁黠（思与）的《久旱得雨诗》，大加赞扬，反复吟颂，并加以修改，亲自为之重写，且以柬褒之。另一位年轻书生作了首以《蝉》为题的诗向苏轼请教：

绿荫深处汝行藏，风露从来是稻粱。

莫倚高枝纵繁响，也须回头看螳螂。

这首诗其实是对苏轼遭遇含有惋惜甚至带有讥喻的感触，苏轼不仅没有因此而生气，而且读后大加赞赏，并抄写多张送人。

在病稍轻时，苏轼撰写了《遗表》，就朝廷兴革事提出建议，身后上之朝廷，以示尽忠。他的老友道潜老读《遗表》后，乃致信苏轼，欲刻之以传世。苏轼致简道潜：“遗表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苏轼文集》卷61）苏轼恐日后朝政日非，表文触忤权要，于个人，于子孙，于友人均不利，遂改变初衷，不欲上之朝廷，亦不欲传于世。临终前当就此吩咐诸子，诸子遵行之，其文遂不传。

苏轼在孙氏馆挥毫作书，遗下洗砚石池（乾隆22年移置东坡舫舟亭畔，即今东坡公园内）。据传苏轼在病情稍轻时，在孙氏馆前手植香海棠、紫藤各一株。香海棠在清初被兵火熏死。紫藤在乾隆年间长得正茂，乾隆间榜眼、常州名士洪亮吉《东坡古藤歌》云：“紫藤花开墨池涨，古色斑烂各相抗”，“花开一卷吹古香，紫燕不敢栖雕梁”之句，直到解放初枯株犹存，“文革”间因搭建民房而毁。

七月十二日立秋，与米元章简：“某一病几不

相见，今日始觉有丝毫之减，然未能作书也。”又书在惠州所写《江月》五诗赠钱世雄。

七月十三日，书《跋桂酒颂》赠钱世雄。在惠州时，苏轼曾书小字本《桂酒颂》寄世雄，今又特书一跋赠之。（《春渚纪闻》卷六）

苏轼的挚友兼学生、中书舍人翟树文自润州来看望他。维琳长老冒着酷暑从浙西径山寺赶来探病，苏轼惊叹不已，此后维琳一直陪伴着苏轼。

来探望苏轼的人很多，出于不让病人劳累的缘故，家人一般予以婉谢。

陈辅之从丹阳老家赶来看望，被苏迈婉谢，苏轼闻讯，急令儿子追回，叙忆往事，感慨久之。常州士民到孙氏馆东小楼小窗前探视苏轼，络绎不绝。为让苏轼早日康复，钱世雄蒸和饮子送来，按苏轼立下规矩，外客所赠物品一律不收，但当知是世雄送来，特破例收下。并解释：“诸亲知所饷，无一留者，独拜蒸作之馈，望止此而已。”

这天晚上，苏轼做了个梦，梦中自己写了一首诗给他的友人、广州知州朱行中，醒后，他支撑着写下这首《梦中所作寄朱行中》诗。这是他的绝笔诗。借故人为例，托梦讽劝好友朱行中，诗末二句为：“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苏轼诗集》卷四十五）意即正因为廉洁不贪，品质反而像宝玉一样，难被蒙蔽，光照尘寰。这也是苏轼为自己所作的最后鉴定。

其实，这几天病势骤减实非吉光，而是回光返照。到七月十四日晚上，病情极度恶化。一夜高热，伴以牙床出血，全身乏力。翌日，他在《与钱世雄书》说：“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被之甚。”他自己诊断：“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但是，药物无效，气浸上逆，无法平卧，只好日夜倚坐床头。晋陵县令陆元光将自己所用的“懒板”送来，此板“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为便”。（《梁溪漫志》卷四）苏轼半躺半睡，舒服多了。钱世雄从杭州觅来一服“神药”，请他服用，苏轼摇摇头，他说，药物对我已不起作用了。

七月十八日，苏轼自知不起，将三子叫到床边，交待后事，他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墓志铭》）面对死亡，他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对生命的意义有透辟理解，完全消融了常人对濒死的痛

苦和恐惧。

七月二十一日，苏轼命迨、过二子扶他起来，勉强走了数步，亦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三日，苏轼特邀维琳长老晚上对榻倾谈。七月二十五日，病情更见加剧，似已无救。维琳长老在病榻前，苏轼艰难地手书一纸，与维琳道别：“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耳，无足道者。维为佛法为众生自重。”（《东坡纪年录》）

将死别称作“细故”，在他海南诗中“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一样有豪迈之气。

七月二十六日，苏轼已觉大限将至，但心里很平静。维琳长老与他以偈语应对。维琳吟偈诗：“扁舟驾兰陵（常州古称），自援旧风日，君家有天人，英雄维摩诘。”苏轼轻语：“与君皆甲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东坡纪年录》）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夏历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夏历丙子年），至此时已在世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万日，举成数而言。五六两句是他四年前所作《思无邪铭》中的成句，说明直至病危之时，苏轼仍神智清明，记忆如昔。结尾两句，维琳长老也不懂，询问之后，苏轼索笔，颤抖写道：“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东坡纪年录》）这便是苏轼的一生绝笔。

七月二十七日，苏轼上身燥热，而下部却渐凉寒，气也时快时慢，似已难支。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处于弥留之间。听觉衰微。卒前思弟子由，“启可无言，时惟我思”。（《祭亡兄端明文》）苏迈等按照“属纆”风俗，将一团新棉放在父亲的鼻子下，可看清是否还有呼吸。维琳长老在苏轼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轻语：“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耳边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微语：“着力即差。”（《东坡纪年录》、《清波杂志》）三子跪于床前，当苏迈含泪询问后事，不答，谏然而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享年66岁。

苏轼逝世，四方震悼，山河同悲。“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讪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墓志铭》）

在荆州，大病初愈的黄庭坚悲痛万分，将苏轼遗像悬挂正厅，每天早起整肃衣冠，上香拱拜；当地士人举行哀悼仪式，他“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挣扎着前往参加。

在颍州，张耒白衣素帽，祭奠恩师，并拿出自己的俸钱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寄托内心无限的哀思。

在汴京，数百名太学生自发地聚集在慧林僧舍，举行饭僧仪式，痛悼一代文坛巨星的不幸陨落。

在赣州，僧荣显等“为设斋供佛，哭之尽哀”。（《舆地纪胜》）

在常州，人们挂起苏轼画像，“相与吊与家”。士民纷纷涌向孙氏馆与先生作最后一别，形成了群众性、自发性的吊唁活动。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哀悼之文，更是多不胜数。

有书生冯遼赋哀诗一首：

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
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
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
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
——宋费衎《梁溪漫志》

苏轼学生李廌的祭文片断是：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
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识与不识，谁不尽伤！
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朱弁《曲洧旧闻》

一篇篇祭文和哀词，一时广为传播，像一幅巨大而肃穆的挽幛，悬于天地之间。

源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唯留一股浩然之气，永萦史河人间！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东坡终老地藤花旧馆变迁考

——纪念苏东坡仙逝 910 周年

戴博元

苏轼曾十多次来常州，两次乞居常州，留下许多遗迹，最后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终老于藤花馆（原孙氏馆）。他带病至此，知将不起，途中尚叹息说：“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居常州 40 多天仙逝，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里人纷纷致哀泪别。今年（2011）是他仙逝 910 周年。

终老地这所宅子，是苏轼通过其好友钱世雄（济明）借的，他自己也很满意，“今已决定归常，借得一孙氏宅，极佳”。（《致子由书》）其宅位于白云溪南。宋庆历三年（1043）知州李余庆在小营前开顾塘河（亦称后河），宅在河之北岸，三面环水，碧波垂柳，景色绝佳（河于解放后填没，今为延陵西路）。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苏轼病中由润州（镇江）至常时，顾塘河水路已通航 50 余年，乾隆年间《常州赋》就有“前河后河，漕运兼关文运”之句。苏轼舟船即由此河至顾塘桥上岸（参阅《常州市地名录》“城垣变迁图”）。宋《咸淳毗陵志》卷 14 载：“东坡先生晚年由儋耳欲返颍昌，次仪真，闻有忌之者，竟归毗陵，终于顾塘孙氏之馆”，即此。宋孝宗乾道壬辰（1172）郡守晁子健在此建东坡祠，后来又改为东坡书院，直到元顺帝至正年间始废为民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东坡仙逝后，许多学者、文士，慕其盛名，仰其风雅，纷纷移居至此，时称“半湾都是诗人屋”。移居的名流中有唐荆川的高祖父唐伯成父子（《唐荆川文集》卷三有一首“读东坡诗戏作”，荆川先生自注：“东坡卒于武进顾塘桥，去余家数十步”），状元杨廷鉴、吕宫，大画家恽南田，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赵 57 岁时由戴溪桥移居于此，在此居住了 31 年，有“无端

失计移城市，贪慕东坡住顾塘”诗句）。清代乾隆年间诗坛“毗陵七子”中，就有 5 位住在这一带，他们是洪亮吉、黄仲则、赵怀玉、吕星垣、徐书受等，藤花馆由此名闻天下。910 年漫长岁月中，经过战乱等沧桑变故，有些遗迹已非旧貌，今终老处石库门大门门楣方胜图案上有“藤花旧馆”四字篆额，其称“旧馆”是后人所加的。原屋进大门门屋是个庭院，堆着假山石，后面即明代建造的八檩抬梁式三间楠木厅等，东通汤宅，原由同一大门出入，旧有紫藤、海棠，传为苏轼手植，洪亮吉《古藤歌》：“半空紫伞益绝奇，千朵万朵飞玲珑”，可见当年枝叶之盛。明清两代宅屡易主人，曾先后归刘、吕、蒋、方、汤诸姓所有，如康熙间《常州府志·古迹》载：“孙氏馆在白云尖，苏文忠存没之地，今顾塘桥东刘氏所居，轩北有石洼淳泓，相传为文忠洗砚池”。又如洪亮吉《外家纪闻》：“舅氏裕中先生分宅，在北岸顾塘桥侧，实宋苏文忠撤瑟之所”。他童年时还在其舅父家见到宅东楼下苏轼临终时倚卧以终的簾板所在地，因而每过小楼徘徊不忍去。

（簾板为晋陵县令常州人陆元光所献，纵横三尺，偃值以受背，公殊以为便）。赵翼《洗砚池歌》亦说：“今蒋宅相传即当日孙氏馆故址”，他早年曾见到洗砚池，说：“石池形似槽，长三尺，深半之，相传为东坡洗砚池。乾隆二十二年清高宗南巡时，石池移置文成坝舫舟亭侧”。惟状元钱维城当时曾随侍乾隆帝南来，并绘了舫舟亭图，但他并未提到有洗砚池，此当系绘图后才移去的。又如《武阳志余》说：“香海棠在顾塘桥北方氏宅（庶常方共枢），传为东坡手植”。宅东徐永宣的老师陈炼曾在方家做过座师，他说：“余主塾方庶常家，坐卧处即东坡先生之孙氏馆”。清时方汤两宅是毗连的，如翻

开清代《常州府城坊厢图》查看一下左厢第六段695、696两个字号，上面明确标明为方汤两宅，就更清楚了。赵翼晚年曾在当时的藤花馆主人汤朴斋宅饮过酒，并有《汤公子邀饮藤花下》诗，1984年文物普查时我们曾访问过汤氏后人，据称他们是方伯公后裔，这位方伯公就是乾隆年间的广西市政使汤雄业。汤氏盛时藤花馆部分房屋曾归汤家所有，其范围颇广，前门在前北岸，后门在后北岸。那位邀赵翼饮藤花下的汤公子名汤绍业（字立方）是汤雄业的胞弟。雄业之孙、史学家、词人汤成烈于同治四年所著的《确园述怀·古藤书屋诗集》谈其宅第及古藤时说：“先祖毅堂公（即汤雄业）官广西布政（于乾隆55年前后）购吕氏入官房重葺”（此与洪亮吉《南楼忆旧诗》“买得吕家新宅子，小房分住白云尖”（指亮吉舅父蒋曙斋购置藤花旧馆部分房屋）可前后相印证，他们都是购自吕家的。藤花旧馆部分房屋在清代早期曾归吕氏所有，状元吕宫，生有六个儿子，以次排名分别是：方洪、方高、方嘉、方成、方昭、方振。长房方洪的子孙都住在藤花旧馆，到吕宫的五世孙吕尔昌时，中了乾隆28年进士，历官山东济南知府，后升至安徽按察使，是由山东巡抚富察国泰保举的。尔昌为谢其推荐之力，曾赠送他碧霞朝珠一串等，后来国泰被江南御史钱沅等参劾向属员索贿，乾隆十分震怒，下旨两江总督严查，尔昌亦被传至江宁审讯，承认在济南知府任所曾代属员汇送金银物件等，被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并查抄其原籍家产（事见《续修四库全书·王先谦编东华录》）；由此其白云尖的房产被没入官府发卖。吕尔昌因年事已高，忧心如焚，未能得到伊犁，即死在往迪化（今乌鲁木齐）路上。

汤雄业买下藤花旧馆房屋后，好景未过几年，即因几次丧亡，家道中落（汤雄业已于乾隆58年卒于广西任上）。为偿还官逋，汤家只得于嘉庆十二年又将房屋质于近邻方家，后来方氏因服官于外省，眷属随宦而居，复将屋转赁与一金姓者，此人不知保护，古藤日益憔悴，虫缘蚁蠹，嘉庆24年架坏后摇摇欲坠，次年夏，一场大风沙，藤竟摧折。同治四年，汤成烈由浙江玉环同知卸任返里，重葺家园时，古藤已残枝满目矣。他自锄瓦砾，勤奋平土，以其屋主厅为“湛露堂”，复以后楼（春雨楼）作堂侄汤世澍（润之）画室（成烈归里后任延陵书院山长十余年，于光绪六年去世）。

太平天国后，藤花旧馆等西首房屋主人为安徽

繁昌县知县方宾穆（字燮尹，光绪二十年副贡，曾任南京方言学堂监督等职。其父即地輿、数学家方楷，同治初尝从父骏谟客皖，为曾国藩器重。）后在沪兼营商务，1938年卒（时年71岁）。方氏与苏轼后人苏愚卿是亲戚，笔者曾拜访过原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苏老先生，他说，在幼年间常去方燮尹家玩，对上祖的终老地十分依恋。当时大门门额就有此“藤花旧馆”篆额。方燮尹又擅画，我们并看到他早年所绘的一幅《山水画》，下款自署：“作于紫藤旧馆”。后又接到燮尹之子、寓居加拿大的八十老人方岑一来函说：“先父购屋后即迁入藤花旧馆之楠木厅”。原屋于抗战时前廊及楠木厅售给国家（二电仪退休人员周某租），“文革”时周被调换至西厢房屋。楠木厅后廊解放前售给庄星平。

这就是藤花旧馆的变迁概貌。在我国文学家中，苏轼可称千古一人，他的诗文连宋孝宗都赞叹可“贯通山川风云……雄视百代”。悠悠岁月磨灭不了他与常州这一段情缘，常州人会世代代像对亲人一般来纪念他、崇敬他。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学术委员）



（苏东坡终老地——正在修缮的藤花旧馆楠木厅，2010年5月27日刘清泉拍摄）

试探苏轼和谐理念的内涵

陈 弼

内容提要：和谐是儒学的核心理念。苏轼对此传统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发展，其内涵非常丰富。本文分别从“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索与研究。

关键词：儒学 苏轼 和谐理念

从“大同论”说起

探讨苏轼的和谐理念，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儒家的和谐理念，因为综观苏轼的一生，其思想虽然也受到释道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儒家学说对他的浸染尤为深刻。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就是他政治变革主张的思想源泉，并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本主义者”。^①

106岁的常州籍著名学者、“我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年11月在《群言》杂志发表《孔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文。文章说，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规律，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儒家的“大同论”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用意相似，但跟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在时间上早了100多年，且意境更加崇高而远大。

“大同论”见于《礼记·礼运》篇。《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礼云，《礼记》篇名，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词的著作。其中有孔子的论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所描绘的这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在此之前，《尚书》关于尧舜禹执政理念的记载就有“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名言。尽管这幅“理想国”的蓝图，有其历史的局限，我们还应该肯定，这是儒家关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伟大创见。我们必须重视这份珍贵遗产，并批判地继承。

这篇强调“天下为公”、崇尚贤能、博爱诚信、和谐安乐理想的“大同论”影响深远。特别是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仁人志士、“民族脊梁”继承弘扬“大同论”思想，为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总书记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2010年9月22日，“全国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香港圆满落幕，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香港宣言》指出：“天行大道，地行大荣，世行大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庄严的历史使命。”这是新时期炎黄子孙传扬“大同论”思想的又一例证。

苏轼生活在儒学复兴的北宋时代，其时科考试题大都出自儒家经典，读书人要想走上仕途，有所作为，必须熟读儒家的“四书”和“五经”。苏轼年少时虽然也读过道家 and 佛学等方面的书籍，但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儒家学说，深受儒家“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影响。苏轼幼年，父亲督教甚严，五十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曾梦见儿时按照父亲苏洵的布置勤读《春秋左氏传》的情景。（《夜梦》）苏轼八岁，开始在乡校读书，有人从京城带来赞扬“庆历新政”的《庆历圣德颂》诗给老师看，苏轼好奇，在旁张望时竟脱口吟诵全诗，并请教诗中所歌颂的革新派人物的情况。老师耐心地向他介绍，特别指出其中四位大儒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杰。这给少年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轼早年为加深记忆，并练习书法，曾将有120卷之多的《汉书》手抄两遍。他十岁那年，注重对孩子进行人格培养的母亲程夫人，给他讲《汉书·范滂传》，苏轼听后激动不已，欲效东汉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名士范滂为直道殉节，并问：“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轼深受感动，“奋厉有当世志”。②由此可见，苏轼年少就怀有“书剑报国”③和“致君尧舜”④的大志。此后即使在极度困厄的贬谪生涯中，其淑世情怀并未消减，“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⑤无论是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准则，憧憬名贤范仲淹等的革故新政，还是“奋厉当世”、“澄清天下”、“致君尧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传承“大同论”思想，努力建设一个民富国强、和谐安乐、“炳然日新”⑥的“理想国”，处处成为苏轼曾经热情诗赞并期盼过的“行行玩村落，户户悬网罩。民风坦和平，开户夜无钞（钞，叉取，偷盗）。丛林富笋茹，平野绝虎豹”的“乐乡”。⑦虽然这种“理想国”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桃花源”式的“乐乡”实属罕见，但苏轼这种对和谐社会执着追求的精神，及其在长期从政实践中所体现的治国安民之道、“协和万邦”之志，很值得今人深思并借鉴。

关于和谐问题，一般认为，要研究与处理好三对基本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三是人自身的矛盾。笔者探讨苏轼和谐理念内涵，也准备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

关于“天人和谐”

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苏轼主张“天人和谐”。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热爱自然，赞赏自然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苏轼既是智者，又是仁者，他对祖国的壮丽山川、田园风光、园林名胜、花鸟虫鱼，甚至一草一木，都怀有真挚、亲和、爱恋的深情。在他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诗文作品中，赞赏、歌颂大自然生态美的佳作占有相当数量的比重。如他曾深情回忆、吟唱“孕奇蓄秀”的故乡：“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东湖》）“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春菜》）“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苏氏父子早年赴京参加科考，途中所撰诗文曾合编为《南行前集》、《南行后集》，其中有许多礼赞山川、歌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佳作，如《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元丰年间，苏轼曾两度上表乞居常州。获准定居常州期间，苏轼盛赞常州十分秀美的自然风光：“买田阳羨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自然）游。”（《菩萨蛮》，“造物”一作“物外”）“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蝶恋花》）此前的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曾在赈济灾民、办完公事之后，应甥婿单锡等邀畅游宜兴，并满怀激情写下《踏莎行》词：“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想斩蛟灵，长桥千载犹横跨。解佩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说尽功名话。”他还曾在《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诗中，高吟“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并在致杭州太守陈襄的诗中，表明自己有在此溪山秀丽、物产丰美之地归田之意：“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羨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苏轼热爱、赞赏自然，源于他深切感受到大自然具有纯真、无私、宽厚，与人美感、愉悦、慰藉等优秀品性，大自然的内部关系非常和谐、融洽与恬静。因此，他在《东坡易传》中说：“天之德，不可胜言也。”⑧这在他的千古名篇《赤壁赋》中

也有所表露。《赤壁赋》的第一段，从清风、明月，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所交织成的江山美景中，写出作者给逗引起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此后的主客对话中，又阐发出“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等寓有哲理的名言，启示我们对人与自然应有的和谐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

二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苏轼一生不仅热爱自然，赞赏自然，而且感恩、尊重自然，倡导保护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以他谪居黄州这一时期来说，身为“流放罪人”长达四年多时间，是纯朴美好的大自然给他带来最亲切、温馨的抚慰，是滔滔东流的大江使他深刻地领悟宇宙与人生的哲理。“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这期间的许多诗文佳作名篇，充分反映出大自然已成为他的知心朋友、精神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鼓励、力量和思想启迪。他还在《与范子丰书》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并非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人与自然应亲密相处。

元丰三年一月，苏轼赴黄州贬所途中，过位于麻城县界的万松亭，见万松多凋谢，感赋《万松亭》与《戏作种松》诗。《万松亭》诗叙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诗开头说：“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苏轼自注：“古语云：‘一年之计，树之以谷；十年之计，树之以木；百年之计，来之以德。’”这反映了苏轼竭力倡导植树造林与呼吁保护绿化环境的拳拳之心。元丰三年五月，苏轼住黄州定惠院时，春光明媚，百鸟和鸣，触发他欣作《五禽言五首》。此名篇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于大自然的崇尚、挚爱，对于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特别是对于“鸣鸟百族”的生态环境的由衷关注。苏轼贬黄期间，曾留墨五祖寺。五祖寺弘忍大师，系黄梅县

人，曾为破额山栽植松道，苏轼非常敬仰，游后留下遗墨“流响”二字，以示表彰。后人刻于石山上，影响深远，迄今苏风犹存。

三是遵循规律，利用自然

苏轼一生特别是从政期间，曾通过策论、政论和大量奏状发表许多政见。政见中有一大部分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对待这类问题，注重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北宋中期，杭州西湖因年久失修，湖面葑草积覆，淤湮日益严重，历届太守均无能为力，到元祐年间出现了西湖废与不废之争。元祐五年，苏轼任杭州太守，经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认为疏浚西湖是杭州广大父老共同的迫切愿望，既是为民兴利，困难再大，也必须全力去办。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苏轼上奏《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然而，“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接着评述“西湖有不可废”的五条理由，并说：“目睹西湖有必废之渐，有五不可废之忧，岂得苟安岁月，不任其责？”于此可见其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何等强烈！同年五月初五日，又上《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申明为根治西湖及相关河道问题，近期曾深入基层，广泛征求群众和属僚意见，又“率僚吏躬亲验视”，商议决定“宜参酌古今，且用中策”，然后上报此具体方案。方案中包括拟采用吴人经验，“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等措施。在西湖疏浚过程中，苏轼又决定利用开挖出来的二十五万丈之多的葑草淤泥在湖中增筑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堤”）。这样既解决了葑草淤泥堆放问题，又方便了行人，可不绕湖步行，同时节省劳力，前后历时仅四个月就使长堤提前竣工。为了沟通里、外湖和沿岸各码头的船运，长堤上筑六座拱桥；并建九个凉亭，供人们游憩。长堤两侧遍植杨柳芙蓉，巩固堤岸。杭州西湖能有今日“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的旖旎风光，成为世界旅游胜地，苏轼功莫大焉！又如徐州抗洪救灾，颍州停开“八丈沟”，兴修吴中水利^⑨，治理黄河主张让河水北流，等等，无不闪耀着苏轼尊重自然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的思想光芒。

苏轼的“天人和谐”理念，就其思想渊源来说，

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物我一体、天人同构的“天人统一”思想。“天人统一”或称“天人合一”、“天人和諧”、“天人相应”。这个思想，认为大自然是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的共同家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统一体，二者相通相应，息息相关。由此得出结论，人和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苏轼深受这一传统思想的熏陶，他在《东坡易传》中说：“凡物之将亡而‘复’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能也。故阳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长也，甫一而有余。此岂人力也哉？《传》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坏也。违天不祥，必有大咎。”人力只能顺天，不能违天，否则必然招致“大咎”。因此，苏轼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高度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与和谐。同时，苏轼在《东坡易传》卷五中又说，在一定程度上尽人力，“不以命废志”，设法与天命抗争，天命也是可以胜过的。就是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以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其唯物辩证思想的体现。

关于“人际和谐”

苏轼有句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⑩这句向他胞弟子由说的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苏轼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仁爱理念与和谐思想。其基本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泛爱众”、“和为贵”、“仁民爱物”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郑板桥评论苏东坡，对此也最为赞赏，曾说：“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

苏轼仁慈、宽容、亲和待人，反映在他与人相处的各个方面。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爱自己的亲人是人之常情，也是最根本的品德要求。苏轼谨守传统伦理道德，对父母十分孝敬，自幼勤奋接受家庭教育，父母去世均遵制守孝。母亲曾激励他长大后要效法东汉范滂“澄清天下”，父亲教导他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治气养生，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⑪苏轼对这些教诲，终生身体力行。作为丈夫，苏轼前后与妻子王弗、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相伴，均尊

敬、善待，相濡以沫，琴瑟和谐。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他在埋骨的山地亲栽三万株松苗，以寄哀思。十年后，又为王弗写下不朽名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苏轼五十八岁那年，王闰之又病逝，逝后百日，苏轼曾请挚友、大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诵经超度时献给亡妻。对坡翁关爱有加的朝云，苏轼给她写的诗词最多。朝云在惠州病故后，苏轼追念不已，既撰墓铭，又作疏文追荐，还曾撰联追思：“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作为兄长，苏轼与胞弟子由情谊深笃，风雨同舟，共度时艰。从几度相约“夜雨对床”，到逝世后同葬郢县小峨嵋山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这正是泣血嘱托，生死相依。因此，《宋史·苏辙传》说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他们俩一生相互怀念、唱和的诗词各有一百多篇，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苏轼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以写景抒情表现出处矛盾心态，又不失积极乐观的旷达情怀。词的最后，苏轼以哲人眼光审视人生的悲欢离合和明月的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体现了诗人对人寿年丰、花好月圆、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的憧憬与追求，并抒发了对包括子由在内的社会大众的美好祝愿，堪称苏轼和谐理念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寓意深远的典范艺术表述。

政治改革涉及社会人群利益的调整，是对待与处理人际矛盾的重要方面。苏轼的改革主张基于他的哲学思想——中庸观。他在《中庸论（下）》中说：“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这个观念同《礼记·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庸的精髓在于“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苏轼《中庸论》），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要把握准确的度。这能促成社会整体的平衡与和谐。因此，苏轼主张政治变革应渐

变，以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事有渐则民不惊”^⑩，反对急进。而改革的政策，应考虑不损害百姓的利益；改革的目的，强调把“富民”放在首位，主张先富民后富国。他在《策别安万民一》中，提出关于设官“求以裕民”、“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的惠民、富民主张，这与王安石关于“取天下之财”以“富国”的主张，大相径庭。同时，苏轼对民心向背十分看重，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强调人主要施仁政，以“结人心”。又在《君使臣以礼》中指出，“结人心”只能以德，不能以利。“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从苏轼的改革主张来看，他特别注重“民安”（25篇《进策》中有6篇讲“安万民”）与“民富”，这是他“人际和谐”理念在从政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苏轼在《东坡易传》卷三“剥卦”和卷四“睽卦”中，着重讲了在待人方面主张宽容和“求同存异”。由于苏轼待人真诚、友善、宽容，他的周围聚集了北宋众多文人学士和三教九流的各路朋友，于是出现了“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西园雅集”等文人相亲、亦师亦友的著名群体和艺坛佳话。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思想。他一生长怀赤子之心，人生征途充满了亲情、爱情、友情、同情，但他又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原则立场，具有直而不随、独立不迁、不畏权势的刚正精神。这正是苏轼人格魅力的光辉所在。

关于“身心和谐”

一个人的身与心的关系，实质是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如何达到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和谐，不使身心失调，儒家认为要靠“修身”。这在《大学》中说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儒家讲“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也即“世行大同”的理想。如何“修身”？苏轼在《东坡易传》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要“自敬”。苏轼在阐释《周易》“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时说：“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则畏、动则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内直（内心正直）；推其直于物（将其正直用于具体的事情），故外方（外表方正）。直在其内，方在其外，隐然如名师良友之在吾侧也，是以独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二要“立诚”。苏轼在阐释《周易》关于“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时说：“修辞者，行之必可言也（自己的行为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修辞而不立诚，虽有业不居矣。”强调了为人处世必须树立诚信的意义。他在《东坡易传》卷六“中孚卦”中，也明确指出，君子唯有诚信，才能取得民众的信赖。

三要“自强”。苏轼在阐释《周易》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不被虫蛀），故君子庄敬曰强（君子保持端庄、恭敬，就能一天比一天自强），安肆曰偷（满足现状、任意妄为，就会一天比一天苟且敷衍）。强则日长（提高），偷则日消（消沉）。”关于“天行健”，“以不息故健”，苏轼在阐释《周易》“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时说：“方其变化（当其处于变化的时代），虽草木犹蕃（就是草木也会繁茂）；及其闭也（当其处于闭塞的时代），虽贤人亦隐（就是贤人也要隐退）。”这说明了变革、创新与开放的重要。

四要“厚德”。苏轼在阐释《周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说：“坤未必无君德（坤卦也不是一定就没有君主的美德），其所居之势，宜为臣者也（只是其所处的时势，使其应该作为臣下而已）。《书》（《尚书》）曰：臣为上为德（大臣辅助君上施行德政），为下为民（帮助下属治理人民）。”这里阐明了大臣应尽的职责，也是君子“修身”应重视培养的品德。

五要“循理无私”。苏轼在阐释《周易》关于“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的观点时说：“以六居二，可谓柔矣。（阴爻居于二位，即阴位，可以称得上是‘柔’了。）夫直方大者，何从而得之？曰：六二顺之至也，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回答说：六二爻是最为柔顺的爻，君子表现出顺从哪里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只是因为遵循着理、做到无私而已。）故其

动也为直，居中而推其直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所以，其行动表现为‘直’，即正直，站在中正的立场而推广其正直，就是‘方’，即方正，做到既正直又方正，不称其为‘伟大’又能是什么呢。）夫顺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习无不利’。（顺从产生正直，正直产生方正，方正产生伟大，君子不是有意去追求这些，遵循着理、做到无私，就自然形成了正直、方正、伟大，所以说‘不用学习，无所不利’。”如果人人都做到如苏轼所倡导的“循理无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发展也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要达到自我身心内外和谐，除了注重“修身”，苏轼还十分重视“养生”。“随缘自适，放旷达观”是苏轼养生的基本理念。他在《问养生》一文中，热情宣扬友人的也是自己的两条养生经验：一是和，二是安。和即心平气和，遇事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待人和气热情，和谐共处。安即心安理得，平安是福，安居乐业。他还在《记养生》一文中自定“三养”成规：“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苏轼的养生理念与经验，充分体现了他的和谐包容精神和惜福延寿之道。

苏轼的养生之道、生存之道，儒释道相融，在其诗文中大量阐述，明末江苏人王如锡曾汇编《东坡养生集》，共12卷，细目达1141条之多。苏轼对气功（包括胎息法、辟谷、瑜伽）、采日月华功、中医、药膳等均颇有研究，有《苏沈良方》、《采日月华赞》等许多著作行世。他还记有一首非常实用的养生诀：“固脾节饮水，游乐多行走。盘脚擦涌泉，闭坐观菖蒲。地黄芪门煎，酌饮蛤蜊酒。常饮茯苓面，常餐杞菊肴。”至今还被人们所赞赏和效法。去年8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在眉山举行，学者饶晓明、饶学刚合作的论文《东坡养生理论新体系及其时代意义》在会上发表^⑬，值得重视。

和谐是儒学的核心理念。苏轼对此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其和谐理念内涵非常丰富，在其浑涵光芒的策论、史论、奏议、散文、诗词、书信等各类作品中均有所反映，也体现在他的从政实践、被贬谪时期和日常生活中。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实践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今天，仍富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笔者对此还缺乏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试探”，意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教。

论文注释：

①邱俊鹏《在中国第15届苏轼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②、⑩陈宏天、高秀芳点评《栾城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页《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1238页《藏书室记》。

③、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之二）、第109页《留题峡州甘泉寺》。

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⑤、⑨、⑫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0页《与滕达道六十八首》（第二十首）、第3384页《进单鹄吴中水利书状》、第3100页《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

⑥龙吟点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⑧杨军译《苏轼讲周易》，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⑩《悦生随抄》。

⑬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编辑《“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

2011年2月

（《常州日报》原副总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会长）

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赖正和

内容提要：本文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提出、苏东坡先后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争、苏东坡践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作为等几方面，论述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关键词：苏东坡 政治主张 和谐追求

一

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建立和谐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和谐社会的建立，须要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但首要的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要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①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统治者与人民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建立和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则是恰当而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如果统治者大肆聚敛，超过人民承受的极限，就会破坏和谐关系，为求生存的人民就会揭竿反抗，最终推翻统治者。纵观中外历史，无一能够逃避这一社会法则。

我们明智的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社会真理。孔子回答子张“何谓惠而不费”的问题时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②（把人民应有的利益赐给他们，这不就是施恩而不浪费么？）可见孔子是主张利民的。赵国武灵王告诫公子成：“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他把“利民”强调为制国之本。荀子批评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指出聚敛者“筐篚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王者富民”。^③荀子把富不富民提高到亡不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认定聚敛者“亡”，富民者“王”。唐太宗告诫侍臣：“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

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费广而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④唐太宗用“割肉充饥”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了统治者不能“刻民”的深刻道理。

苏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比冠，学通经史”。^⑤贾谊、陆贽分别为西汉、唐代政论家，都曾联系现实提出治国安邦之大计。陆贽在担任宰相期间，明确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在经史及贾、陆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苏东坡，深知“民者，国之本”，^⑥自然懂得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懂得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在于利民而切忌刻民。

二

苏东坡 22 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作了《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政论文虽然仅有六七百字，却阐明了他终身坚持不渝至死也不放弃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和根本。这核心和根本是什么？就是“爱民”“忧民”“广恩”“慎刑”这八个字。爱民、忧民是其政治主张的发源点，广恩、慎刑则是其政治主张的大原则、总框架。这八个字就是苏东坡为建立、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制胜法宝。苏东坡后来提出并坚持践行的政治主张，就都是由这八个字生发开来的。

苏东坡 26 岁时参加制科考试，进了策、论各 25 篇，作了《御试制科策》，后来在凤翔签判任上又作了《思治论》。这些策、论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张，内容十分广泛全面，涵盖经济、财政、吏制、民政、军事、外事、高层统治集团的整顿等诸多方面。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他认为最高统治者富有四海，不应该与人民“争于锥刀之末”，应该“其与民也，优；

其取利也，缓。”

他说，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向人民索取，也“时有所置”（置：搁置，停下来）。他批评现实说：“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本来征收赋税有固定的时间，现在却要提前征收；本来有固定的征收数量，官吏却以多征收为能。天地之间有可取之利，无不留给官府而禁止小民去取。现在是“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①“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②他主张：“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而把利让给人民。③他严厉地指出：“毒莫深于夺民利。”④

因此可以断言：真正按照苏东坡让利于民的主张去做，无疑可以在赵宋王朝统治下，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关系。

三

苏东坡 34 岁时服父丧满回到京师，正遇王安石在宋神宗强有力的支持下密锣紧鼓地进行变法。

对于王安石变法，自宋至今褒贬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是极其推崇、赞赏王安石的，曾经“三写王安石”。他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①邓先生一语中的！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问题原来就是理财。何谓理财？拿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②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统治者依靠天下的劳动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统治者攫取天下的财富供给治理天下的统治者花费。王安石认为前世统治者理财就是如此，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竭力推行的新法便多以理财为目的。邓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专谈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第四章中，就认定王安石推行的几项主要新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是理财的新法。由于这些新法的施行，天下财富滚滚而来，涌入朝廷。神宗朝有两笔原来没有的巨额支出：1. 熙宁三年（1070）开始给原本没有薪金的“吏”发薪金，仅熙宁六年（1073）发给吏的薪金就多达 110.32 余万缗③；2. 元丰四年组织五路兵马进攻西夏，耗去巨额军费。这两笔巨额费用支出后，北宋政府还

积累了巨额钱粮。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说，施行免役法十六七年后，光免役宽剩钱一项就积累了“三千余万贯石”。④元祐元年（1086），全国各州县积累的钱粮多达“数十百巨万”，如全归户部作为经费，够支用 20 年。⑤该年任户部尚书的李常报告说：光常平、坊场、免役积剩钱，就有 5000 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枢密院事的安焘回忆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⑦由此看，王安石通过变法富国的目的确实实现了。

然而人民富没富呢？没有！不仅没有富，而且更穷了。元祐四年（1089）至六年（1091），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向朝廷反映的种种情况足可说明这一点。他在《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中说：“浙中州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⑧为什么二十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多？除了饿死（因灾荒）、病死，多半是为了躲避官府催收积欠，不得不举家逃亡了。何谓积欠？就是一年一年积累下来的百姓欠官府的钱。苏东坡在《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中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税之债，田宅在官（已折价纳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⑨后来他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也说：昔日号称无人可比的大姓富户，“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余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⑩据苏东坡统计，经多年“鞭策督促”后，杭州百姓因朝廷推行新的盐法而积欠官盐钱的还有 445 户，仅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积欠的官盐钱就多达 50300 多贯；仅熙宁年间百姓积欠官酒钱的就有 1433 户，到元祐五年（1090）还有 404 户积欠官酒钱 13400 多贯；元丰四年，官府强行把残次丝绢派发给百姓，经十几年“如捕寇盗”般催收后，还有 282 户百姓欠官丝绢钱 8200 余贯；因朝廷推行市易法而积欠市易官钱的百姓实在还不了钱，官府强行将其楼店屋产折价纳官，直至元祐五年（1090）还有 112 户因失去产业而久无所归。⑪自秦汉以来，江浙地区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江浙百姓都如此穷苦，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苏东坡也曾说他“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⑫

由上述不难看出，经王安石变法之后，社会不是迈向了和谐，而是加剧了原来的不和谐。社会的

不和谐，必然导致生产力下降，生产成果减少，使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久，坚持民本思想的苏东坡便看出其要害在于敛取天下财富，看出施行新法的最终结果必然使各阶层人民都走向穷困而加剧社会矛盾。于是，他“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不惧丢官乃至杀身，挺身而出，多次向神宗皇帝上书批评新法，揭露新法的聚敛实质，甚至质问神宗：“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与，抑富国与？”^{②③}由此可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实质是富民不富民之政争。

王安石攫取天下财富是为“富国”。对于富国，苏东坡并不反对；反对的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他早在参加制科考试时所作的《策》中，就提出了富国的两项主张：一是廉取；二是节用。可见他们两个富国的途径、手段是大相径庭的。走苏东坡的富国途径，既可富国，又不伤民。对于富国、富民二者的关系，苏东坡主张“必先裕民而后裕国”。^{②④}他对神宗皇帝说：“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②⑤}《论语·颜渊》记载：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叫他恢复“彻法”，即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鲁哀公说：我现在按十分之二征收赋税都不够花销，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⑥}仔细推究苏东坡引用有若的话，可以窥见他观点：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应当让人民先富；统治者应当减少榨取。这就是他对富民、富国二者关系的认识。

不难看出，苏东坡富民思想、主张如果得以实行的话，得到的结果必然与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截然相反——人民的疾苦可以稍得缓解，其生产积极性可以稍微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可以稍有缓和，人民稍可安居乐业，也就是稍能推进社会和谐。

四

苏东坡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富民的主张，一直没有被朝廷全面采用。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尽管时常碰壁。

元丰八年（1085）末至元祐初（1086），苏东坡与全面废除熙宁新法的司马光发生了役法之争。

司马光坚持废除雇役法而复行差役法；苏东坡力主保留雇役法而去其弊。其时，司马光是门下侍郎，而苏东坡仅为礼部郎中（稍后为起居舍人），级别悬殊。可苏东坡不顾官卑职小，在政事堂与司马光争论，竟致司马光“忿然”；苏东坡见司马光终不肯采纳他的建议，便数次上书请求罢免他的“详定役法差遣”，司马光“始怒，有逐公意矣”。^{②⑦}苏东坡与司马光早有交游，私人关系很不错；在神宗朝又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可以说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早在熙宁二年（1069）十月，司马光就曾向神宗皇帝举荐苏东坡出任谏官；熙宁三年（1070）八月，司马光又在神宗皇帝面前替苏东坡辨诬。这么好的“战友”，怎么竟因役法弄得如此对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认为，苏东坡“真正坚决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当初反对王安石是这样，现在反对司马光也是如此。”^{②⑧}康震教授这句话实在厉害，把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与司马光役法之争的内容和实质全抹去了，而仅仅归结为反对“独断专行”。历史真是如此吗？否！在役法之争当中，苏东坡给司马光分析了差役法、雇役法各自的弊害之后说：“今以此易彼，民未必乐。”司马光问该怎么办，他答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如果不变雇役法而去其二弊（指加重人民经济负担的两个做法），“则民悦而事易成”。^{②⑨}苏东坡认为，复行同样有弊害的差役法“民未必乐”；改革雇役法的弊害而不变其法，则“民悦”、“民不惊”。可见，苏东坡完全是从人民的负担和感受出发来考虑该不该改变役法的。役法之争的实质就在于此。他站在人民一边，不惜与老朋友、上司冲突，表明他“爱民”、“忧民”的思想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表明他坚持富民的主张是不会动摇的。可以说，苏东坡与司马光役法之争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样，是他们不同政治主张之争，是“富民”与“刻民”之争，是“便民”与“困民”之争。所以，把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与司马光役法之争，笼而统之地说成是苏东坡反对“独断专行”，是不是篡改了主题哟？

五

元祐时期，苏东坡三次在朝为官，也三次出任地方长官。他在地方长官任上的作为，是他践行自

己政治主张的具体表现。

苏东坡知杭州时，组织开浚西湖、修复六井、疏通城中两条运河——茅山河和盐桥河、捐资兴建病坊，为人民造福，留下许多佳话。更值得说道的是他积极组织赈灾和主张赦免百姓积欠。

他到杭州的当年（元祐四年，1089），浙西七州军因涝灾无法播种早稻；五六月间又遭干旱，损害晚稻。因此，刚入冬就有饿饭的了。他见形势严峻，估计来年春夏必发饥谨，便于十一月初旬向朝廷上书，提出几项赈灾建议，其中重点是要求制止官方抢购粮食，避免粮价“涌贵”，不使“小民乏食”。翌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不止，淹没半熟的庄稼，而且潮浪毁损了堤堰和农田。他断定“民之穷苦，实倍去年”，于是他在短短的两月半里，向朝廷连上四状，请求朝廷减少上供米的数量，并拨款从丰收地区买粮 50 万石运到浙西救灾。朝廷批准他的请求，拨钱 100 万贯，命发运司从外地买粮赈济浙西，但发运司只截拨 20 万石上供米给浙西出售。他非常气愤，虽然已离知杭州任，仍以“前知杭州”的身份上书朝廷，批评发运司“拒塞朝旨”，请求朝廷命令发运司再拨米 30 万石赈济浙西。可见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在北宋，百姓常欠官府的钱。苏东坡在凤翔任签判时就曾上书三司使蔡襄，请求免除百姓所欠官钱。王安石变法以后，百姓欠官钱累积更甚，被称之为“积欠”。百姓“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恼火得很。元祐五年（1090）六月，苏东坡向朝廷上了《应诏论四事状》，报告杭州百姓经元祐朝多次赦免后还欠官钱的户数及所欠数额，请求豁免穷苦百姓的所有积欠。过了 108 天，他不见朝廷答复他的请求，就上书催促朝廷答复。可是，又过了 500 多天，已经是扬州知州的他还不见朝廷答复，便又上了《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过了一个月，他再上《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请求朝廷按照他的建议减免百姓积欠，“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⑩他为求百姓“一饱之乐”，不惧执政大臣的百般阻挠，数年间一直坚持要求朝廷减免百姓积欠，其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元祐七年（1092）三月间，苏东坡在赴扬州任途中，看见到处“麻麦如云”，丰收在望，可百姓“皆有忧色”。经调查，得知“丰年举催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有的百姓惧怕催欠，竟不敢归乡，成为游民。他深有感触地

说：“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⑪他再次要求朝廷减免百姓积欠。他能看到百姓害怕催欠超过害怕猛虎和水旱，而且把催欠的吏卒看作虎狼，这说明他的立场站到了人民一边，他的情感与人民息息相通。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苏东坡的所有作为，都是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的。

今天，我们阅读苏东坡关于赈灾和减免积欠的十四五篇奏章，虽然存在几近千年的“时间鸿沟”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时代代沟”，但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人民的情感，依然动人心弦，催人泪下。他为救人民于饥谨之中，为解百姓于重负之下，不怕得罪权臣，不顾个人得失，为百姓奔走呼号，为人民请命朝廷，无论古人、今人，有几个能与他匹比？无论古今，官员们如果都像他那样把人民的疾苦置于心上，忧人民之所忧，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和谐社会何愁不能建立？！

六

更为可贵的是，苏东坡在从政权的高端跌落下来，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依然时时事事关心人民的疾苦，不顾个人安危地千方百计地为人民争取利益。

绍圣二年（1094），广南东路秋粮大丰收，百姓手中有粮，但缺钱。按理官府征收秋税本当征收秋粮，但官府偏将粮价高折后，要百姓交钱——比如征收秋粮一石，市价 700 钱，官府偏要折价为 1000 钱，让百姓交。谪居惠州的苏东坡了解到这种坑害百姓的做法，十分气忿，可他既无职权，连发言权也没有，一时之间束手无策。幸好这时他的表兄（也曾是他的姐夫）程正辅正担任着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他便给程正辅写了一封 900 字的长信，诉说百姓之苦和官府作法不当，请他跟本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两位官员商议，纠正坑民害民的做法。^⑫他觉得这封信还没有把问题讲清讲透，次日又给程正辅写了一封将近 1500 的长信，进一步阐述高折粮价收钱的做法不符合朝廷赦文精神，而“使民倍费”，建议“三司联衔”发文，要求各州“听从民便，任纳钱米”；如果纳钱，则按现在市场中价折价，“不

得辄有丝毫加抬”。^③

谪居惠州的苏东坡了解到，惠州军人有一半无营房，住营房者“皆两人住一间，颇不聊生”（当时的军人是带家眷的，两个军人住一间怎么住呀？）；其余赁居民房。因此，军人贫穷；难于管辖；有的逃走作贼；军妻犯奸者众。严重影响了军人和百姓的生活以及社会秩序。他调查统计出各营军人数、营房数，总计大约“少三百来间好屋”。于是，他又给程正辅写了一封长达 1500 多字的长信，请他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信中建议组织兵匠上山采木、自烧砖瓦、自建营房。他估计这样办，官府只须支出四五百贯，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他又推荐“甚勤干”的权都监王约参与组织修建营房事宜。^④

按宋代的规矩，贬谪官员不得过问官事，否则有“僭管官事”之罪。秋粮高折收钱和建造营房都是官事，苏东坡是不能过问的。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更清楚那帮整他的人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巴不得抓到他的一点“罪证”，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在给程正辅写信的时候，就生怕别人知道他在过问官事。他在上述给程正辅的第一封信中，叮嘱程正辅说：“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万！千万！”在第二封信中也叮嘱说：“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告！”第三封信则叮嘱得更严：“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虽二外甥亦勿令见。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他过问官事那么热心、认真，行动时又那么小心、谨慎，反差很大。这很大的反差正好体现他为了使“一路生灵受赐”（赐，惠也。苏东坡致程正辅信中有“若蒙采用刍蕘，一路生灵受赐也”一句），而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崇高精神！

结束语

通观苏东坡的政治主张，和他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与王安石、司马光发生的冲突，以及他终身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作为，不难看出：

一、他的全部政治主张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民为邦之本，民贵君轻，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政治主张。

二、他的政治主张把富民、利民摆在第一位。一旦有伤害人民利益或有悖富民的政策、做法出现，他便不顾个人安危与之斗争。从他反对王安石

变法，到与司马光争执，再到批评、纠正各种损害百姓利益的政策和做法，无不表明他是富民主张的坚持者和百姓利益的维护者。

三、他的政治主张以及他践行他的政治主张的全部作为，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缓解人民的疾苦，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论文注释：

①、③《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9 页、第 80 页。

②、④《论语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0 页、第 103 页。

④《中国皇家文化汇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31 页。

⑤、⑥《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126、1117 页、1121 页。

⑦《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0 页。

⑧《王安石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6 页。

⑨、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壬申记事、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丁亥记事。

⑪据《西台集》卷七，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

⑫据《宋史》卷三二八《安燾传》。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33 页、第 255 页、第 255 页、第 135 页、第 286 页、第 768 页、第 903 页、第 1402 页、第 957 页、第 875~881 页、第 958 页、第 305 页、第 305 页、第 791 页、第 971 页、第 957 页、第 1608 页、第 1609 页、第 1600 页。

㉞《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诤案”：“由此而参观《论场务书》，必先裕民而后裕国，审矣。”

㉟《康震评说苏东坡》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00 页。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说说苏东坡之妾

孙开中

内容提要：本文对苏东坡文字中的“妾”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探索，同时对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身世作了客观而冷静的评述。

关键词：妾 侍妾 朝云 千古遗憾

一、从“予家有数妾”说起

苏东坡《朝云诗并引》云：“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唐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由于王朝云进苏家后，确实成了苏东坡十分喜爱并一再歌之咏之的“侍妾”，加之当时和后世一些文人的追捧，不仅王朝云大放异彩，而且苏东坡“侍妾”队伍不断扩大。“予家有数妾”自然成了文字“铁证”。

纵观苏东坡极不平凡的一生和传留下的各种文字资料，苏东坡一生先后“二妻一侍妾”的家庭格局非常清晰。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对待家庭婚姻、爱情上，严肃认真，责任明确，担当具体。他思想开放，但行为绝不放荡。他有令人艳羡甚至着迷的文采风流，但言行不俗气、不下流。他真正做到了“事无不可对人言”，算得上跨越时代的“真君子”。

似乎苏东坡早预料到后人会对他的家庭生活状态说三道四，所以他在《朝云墓志铭》中明确宣布“东坡侍妾曰朝云”，“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又《惠州荐朝云疏》言：“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从字面逻辑讲，无疑“东坡侍妾”只有一人，那就是王朝云。

那么，《朝云诗并引》中的“予家有数妾”作何理解呢？我以为指奴婢。

原来历史悠久的汉字具有多义性和流变性。今人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不可不慎。

“妾”有三个义项：一指女奴隶，如《尚书·费誓》：“臣妾逋逃”（臣，男奴隶；妾，女奴隶；逋逃，逃跑。）中的“妾”。宋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时期，奴隶与主人的依附关系、人权状况与奴隶社会相比已大为改善，此时的奴隶类似奴仆、奴婢、用人等。二指古代女子表示谦卑的自称，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李白诗《长干行》：“妾发初复额，折花门前剧。”三指旧社会的男子在妻子之外另娶的女人。如《战国策·齐策一》（即《邹忌讽齐王纳谏》）之“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这个“妾”的义项影响深远。如《红楼梦》中之“赵姨娘”、“尤二姐”便是，俗称“姨太太”、“偏房”、“小老婆”。

元丰四年（1082）正月，苏东坡于黄州写的《子姑神记》道：“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显然，“妾”是何氏女子自称，“纳妾为侍妾”（意为威逼我作了小老婆），“侍妾”才是与主人有两性关系的女人，这也照应了《朝云墓志铭》和《惠州荐朝云疏》的同一说法。

在东坡的词中，“侍妾”的同义词有：侍人、侍姬、家姬、姬等。

如《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位才艺出众，一心跟定朋友王定国的“点酥”（又名柔奴），改称“侍人”。另外，《殢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亦如此，叶申芑《本事词卷上·苏轼赠妓词》则称之为“又赠王都尉晋卿侍姬”，“侍姬”表明：王晋卿（名诩）侍妾由歌妓转化而来的事实。

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黄州知州徐君猷妻妾成群，为应酬起见，苏东坡分别写了好几首《减字木兰花》和一首绝句，赠送给徐君猷的侍妾们，称她们为“家姬”、“侍人”，或直呼其名“胜之”、“庆”（亦称阎）姬”。那独得苏词二首的“胜之”，据《挥麈后录》载：“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

乐全之子厚之怨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要说，苏东坡反对“蓄婢”、“买妾”的立场是一贯的。

早在熙宁六年（1073）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时，得知当代大词人忘年交张先“买妾”的绯闻时，苏东坡写了《张子野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他用“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等文史典故公开劝阻，张先和诗“愁似鲛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既辩解又大述迟暮之苦后，东坡才于欣赏诗句之余予以谅解。

《王直方诗话》言：“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元祐四年，继妻王闰之的兄弟“王十六（元直、王箴）见惠拍板两联，意为仆有歌人，不知初无有也。然亦有用，当陪傅大士唱《金刚经颂》耳”（《书赠王元直三首》之二）

又《轩渠录》载：“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客，即云：‘有数个搽粉虞侯出来祇应。’”这里的“有”，自然是掌控之意。这些官妓的职能是什么？苏东坡用了“搽粉虞侯”的比方，即化了妆的勤杂服务接待人员来说明。可见，这类人也没有谁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侍人”。

作为公认的大文豪，在具体运用中国汉语写作时，苏东坡不但讲究继承，而且注意发展和创新。他在《保母杨氏墓志铭》中赫然写道：“先夫人之妾杨氏，名金婵，眉山人。”杨金婵尽管是弟弟苏辙的“保母”，然而其身份仍为家中女仆。“妾”当女仆讲无疑是苏东坡运用汉语写作时的创新。回头再看“予家有数妾”等语，就顺理成章了。初进苏家的王朝云身分本来就是“小女仆”嘛！苏家先后有几个，哪怕八九个女仆（包括长工和短工），因不再需要或女仆另谋高就，“四五年相继辞去”，岂不合情合理？应该说，这才符合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雇佣关系的常规。勉夫教子的杰出女性程夫人自然不会搞“同性恋”，于是又有人把“先夫人之妾杨氏”，理解成暗指杨氏系苏洵的小老婆，这也实乃大谬不然。试问：一个家庭“极贫”，在眉山一事无成，生活靠贤夫人辛勤维持的老儒生，有条件“纳妾”吗？姑不论苏洵为恪守古礼的道德之士，单说苏洵与程夫人娘家结怨绝交的事实，他曾高调指责程浚家庭伦常的混乱和败坏，如果他也偷偷摸

摸“纳妾”，岂不正好授人以柄？

二、“东坡侍妾”王朝云探秘

苏东坡《朝云墓志铭》沉痛而悲凉地写道：“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又）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遁，未期而夭。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墓志的主人公王朝云事迹简略，个人命运显得凄美而神秘。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把“朝云来归”定为熙宁七年（1074），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孔凡礼撰《苏轼年谱》采用了这一说法。因朝云年仅十一、十二岁，进入苏家时，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什么钱塘名伎、歌者，王文诰斥这种论者为“妄人”。一个到死也不知是否有父母、兄弟、姐妹存世的苦命女孩，称她为孤儿是合情合理的。“来归”者，收养、收留之别名也。只是一进苏家，从此不再离开而已。

对此，还是兼顾一下东坡家庭的具体情况为是。王朝云来归时，苏东坡尚在杭州通判任上，实际不到38岁，前妻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嘉祐四年即1059年生）约15岁，而继妻王闰之于熙宁三年（1070）生下次子苏迨后，又于熙宁五年（1072）四月四日生下三子苏过。那时，苏东坡公事繁忙，应酬特多，还曾代理过杭州州守。偏偏苏迨从小身体欠佳，东坡自叙：“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见诗集卷九《赠上天竺辩才师》、二册465页）苏辙《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证实并颂扬道：“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虽然长时间笼罩东坡心病解除了，但是仅有一岁多的苏过必须加强看护，无疑是一向爱子心切的苏东坡的人之常情。他甚至把添子的喜讯传达给了数千里外眉山的堂兄：“轼房下四月四日添一男，颇易养，名似叔，并荷尊荫。”关于自己在杭州通判任上的生活状况，此信也曾提及：“此中公事人事无暇，又物极贵，似京师，圭田甚薄，公库窘迫，供给萧然，但一味好个西湖也”。（《与堂

兄》见《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七 5444 页)

这段时间,苏东坡表面活得很风光潇洒,实际上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为应付堂姐(苏澹或苏涣之女)女儿嫁给同年进士单锡,他甚至硬着头皮向驸马王洙借钱二百贯。苏东坡一向重视亲情和乡情,得知叔岳丈王庆源应礼部试赴京师,他十分关注,主动去信约请他来杭州叙旧探亲。

从东坡《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等诗中,无不闪动着继妻王闰之贤淑、深情、有教养的身影。“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亲春老孟光”,频繁的官场应酬酒会,使他对温柔体贴自己的“老孟光”心存愧疚;“香雾凄迷著髻鬟”,一直盛妆等候丈夫夜归的王闰之看来并不土气;“共喜使君能鼓乐”,则说明王闰之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

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因素,东坡的顶头上司、会作诗爱喝酒能鼓乐的杭州州守陈襄就刚刚指示苏东坡写诗反对词人张先“买妾”的事实(见前)。

鉴于以上背景,任杭州通判期间的苏东坡根本没有财力、没有心情、没有必要去“买妾”,“王朝云来归”纯粹是因为要减轻继妻王闰之的辛劳,给她寻找一个帮手。说得直白一点,王朝云在苏家的真实身份只能是“小女仆”。

二十余年过去,绍圣二年(1095)三月,苏东坡《与陈季常》的信称:“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羨,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即朝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早已是“侍妾”的朝云在家中的地位与“二老婢”多少有些分别。而同年六月《与王定国》的信中则明确说:“某到此(指惠州)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显然,“二老婢”和王朝云又平等地成了“三庖者”,幼子苏过在苏东坡的心目中自然远在“三庖者”之上。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王朝云病亡后,苏东坡《与林天和》的信中谈到惠州的瘟疫:“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某亦旬浹之间,丧两女使,况味牢落,又有此狼狈,想闻之亦为之怆然也”。“庖者”也罢,“女使”也罢,不都自始至终说明王朝云女仆的身份没有改变过么?

由于有被苏东坡称为“当年江上生奇女”的继妻王闰之的亲自主持和打理,苏东坡的家庭维持了长久的安定、和谐。尽管历尽劫波,但是团结一致

的家庭内部充满了温馨和幸福。在这种忠孝节义浓厚文化氛围的长期浸润和影响下,王朝云的“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就有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性。

在苏家,王朝云的具体工作可能是照看略小她十岁的苏过及稍大而瘦弱多病的苏迨。作为“庖者”,则要向王闰之学习准备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她后来的确能歌善舞、美丽纯情,苏东坡在逆境中,先后写过不少诗词和其他文字(数量比两位妻子多),进行讴歌,视之为“巫山神女”、“散花天女”,就这么一个柔弱痴情的女子,曾给仕途失意的苏东坡莫大的慰藉和欢乐。认真说来,元丰三年(1080)苏东坡贬谪黄州以前,王朝云在苏家默默无闻,东坡各体文字也不曾涉及王朝云。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写了《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遁,小名干儿,欣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见《苏轼诗集》四册 1239-1240 页),原诗如下: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
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
未期观所好,踟蹰逐书史。
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
忽然遭夺云,恶业我累尔。
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
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其一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
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
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
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
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
知迷欲自返,一恸送余伤。——其二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并未直接点出孩子的生母王朝云。之前,苏东坡系只身到达贬谪地黄州的。直到元丰三年(1080)五月末,苏辙才带着王闰之等家小来黄州会合。按说,王朝云已经成人,可以选择去留。东坡在与友人、时任鄂州州守朱康叔的信中说:“所问菱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朱康叔对东坡的家庭状况非常熟悉,生活上十分关照贬谪黄州的苏东坡。稍后苏东坡又回信称:“老媳妇得疾,初不轻,今已安矣。不烦

留念。”这“老媳妇”不是别人，而是东坡对继妻王闰之的谦称。那前信中的“云”显然是在苏家地位有所提高的王朝云，“菱翠”则很可能曾是苏家地位与朝云不相上下而朱康叔认识的女仆。已经决意成为东坡侍妾的王朝云，姑且打发菱翠离开苏家，不是既合情又合理吗？有学者忽视两封信的内在联系，对“云乃权发遣耳”这句并不生涩的话，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和臆测，得出“菱翠”也曾是“东坡侍妾”的结论，与苏东坡坦白认真的书面表述大相径庭。

林语堂《苏东坡传》说得有道理：“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苏东坡一生受“诗礼传家”的影响甚深，“收朝云为妾”，看来是在王闰之的支持和默许下进行的。这有苏东坡给亲到临皋看望过自己，并派人营造南堂的友人蔡景繁的书信为证：“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儿见，况他人乎？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与蔡景繁九首》之三），所谓“云蓝小袖者”，必因穿着代指蔡景繁到临皋亲自见过的王朝云。字里行间，苏东坡报道朝云生子一事，是轻松而欢快的。甚至可以体会到对王闰之非凡器量的赞赏和感激。另外，朝云大约18岁收为侍妾，21岁生下苏遁的事实，体现林语堂的说法较为可信。

中国民间自来有“皇帝重长子，百姓爱么儿”的说法。苏东坡在《洗儿戏作》的诗中俏皮而幽默地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遁的降临，在患难中，给苏家无疑带来苦涩而短暂的欢乐。

中国民间同时又有“母以子贵”的说法。苏遁的降临，无疑也给王朝云带来了新的生活希望。他不仅成了维系苏王爱情的纽带，而且成为王朝云新的精神支柱。

东坡自然是真爱朝云和苏遁的。他总是按照风俗和习惯（包括当时的法律法规）妥善地处理日渐复杂的家庭关系，一直想为朝云母子在苏家争取平等而恰当的地位。苏遁之名与先前两位妻子所生的迈、迨、过三子，名字都同样带一个“辶”，便是一种文化人特有的暗示和期许。

但是，一切努力最终都落空了。

致命的打击源于幼子苏遁的天亡，王朝云的早逝断送了苏王二人美好的姻缘。朝云病逝后，苏东坡《悼朝云并引》全盘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近乎撕心裂肺地倾诉了对朝云的无限深情：

绍圣元年（1094）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1096）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东坡的母亲程夫人、继妻王闰之逝世以后，都有明确记载做过各种佛法悼念活动。在艰难困苦之中，苏东坡对于笃信佛法的侍妾王朝云之死不仅做了佛事活动，把她埋葬于佛寺之侧，而且衷心祝愿她成为忠实的佛教信徒。这段刻骨铭心、感动地的爱情故事竟然引发了自然界的特异现象。据东坡《惠州荐朝云疏》讲述：“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痴情的东坡老人甚至拉上已经二十四、五岁与王朝云关系融洽的幼子苏过一同观看和印证“灵迹”。

三、没有必要硬称“夫人”

侍妾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少数权贵人物一夫多妻的社会现象。“东坡侍妾”千百年来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苏东坡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的人格魅力所致。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来审视苏、王的结合，显然，他们经历了两情相悦、相互认定的阶段。在苏家这个狭小的空间，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平等、自由和幸福，并且得到了继妻王闰之及东坡三个儿子的理解。

然而，历史注定了这段姻缘的悲剧色彩。

政治上接连失势的苏东坡连生存都面临着危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经营好这种超凡脱俗的事实婚姻。仕途的坎坷、苏遁的天折，使他们从“人生如梦”的生命体验中，进而希望在宗教（主要是佛教）信仰里得到解脱。“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袖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朝云诗并引》）养生和读经，成了王朝云生命后期的主要活动。从东坡元祐五年（1090）任杭州太守时写的《六观堂赞》得知，《金刚经》实是苏、王二人共同爱好的佛家经典。

（下转第37页）

苏东坡的诗意之旅

刘小川

内容提要：苏东坡 21 岁从西蜀眉山出发“宦游”大半个中国，历经荆襄，中原，陕西，齐鲁，江南，淮南，岭南等地，以他丰富的内心感觉、独特的审美视觉，寸寸抚摸山川草木，时时牵挂天下苍生，深度体验生活乐趣，海量创作文学作品。

关键词：苏东坡 宦游 诗意之旅

苏轼二十一岁那一年（1056），偕同老父苏洵和弟弟苏辙，从西蜀眉山陆路出川，到汴京考进士，翻秦岭，走栈道，出剑门关。过莽莽苍苍的秦地，继而马行辽阔的中原，马累坏了又改乘驴子。这一路，沿途阅县三十六，行程两千里，走了几个月，走一路玩儿一路，历险揽奇也阅美。苏轼后来又回老家丁忧，两次水路出川，官船过三峡，向荆楚，沿途写诗，留下著名的《南行集》。

中国古代文人，以美的尺度步步丈量大好河山。苏东坡一生“半中国”，走过无数的城市与乡村，水陆行程几十万里。唐宋做官有“宦游”之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分派到全国各地。任期一般两三年，也有任半年的。升迁或贬谪，长期在路上。治安状况真不错，杜甫说：“九州道路无豺虎。”史籍称：“行者虽万里而不持寸兵。”兵指兵器。苏东坡携家带口，走荒村宿野店，从未遭遇盗贼。春夏秋冬，雨雪艳阳，异地风俗，美酒佳肴佳茗，他要尝个饱。唐宋官员文化素质高，大多数人知道诗意是什么东西。诗人艺术家们惊奇天地万物，六百年没完没了。另外，宋代邮递的速度快，好作品能迅速传播，皇帝也管不着。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歪瓜劣枣也会盛传。

当代大作家张炜说：有些作家下笔几十万字，看不见一点山川草木。

张炜二十年行走齐鲁大地，一步一个脚印。最艰苦的时候，这位名作家大教授的头发长达一尺，

索性扎进腰带。而类似张炜这样的不避任何行路艰辛的作家，精神与实地的双重探险者，今天很少很少了……

就旅行而言，如果旅行者一味把自己弄舒适，那么，感觉层面的东西会打折扣。感觉少，体验就流于平均化。

苏东坡的特征是多欲多善多思，三者平衡，高端融合。他是个好吃嘴，每到一地就要寻美食，还自酿酒，自创了许多菜肴，至今一些城市流行色香味俱佳的“东坡宴”。他酒量小，年轻时望杯而醉，后来饮少辄醉，于是他发明了“把盏为乐”。估计他是湿热型体质，容易生火，多年为痔疮所苦，却偏偏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性大热，他吃成了兔子眼。

西蜀，荆襄，中原，陕西，齐鲁，江南，淮南，岭南……苏东坡在路上的日子究竟有多少？有心人不妨作个统计。宋代的官员上任，可以磨磨蹭蹭，一路会朋友，到任后则忙得团团转。苏轼喜欢玩儿着走，几天的路程不妨走上个把月，神奇的地方就停下来，访古寻幽探奇。家眷很享受，儿童活蹦乱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走不累。茅草野花铺天盖地，猛林平冈原野，处处惹情绪。东坡不刻意游名山，峨眉山他没去过；在济南一带先后转悠两个多月，无意去登五岳之首泰山。他的性格特点是随性。房前屋后皆风景，这一点，他追随陶渊明。对一个具备了审美目光的人来说，抬眼便是好风光。

先有内心纵深，后有景物延伸。

古人重游历，重交游，而不是单纯的旅游。旅游是个现代概念，是经济学的一种产物。古代士子读很多书，然后他走出家门去。出门天地宽，十里不同俗，百里之外就像异邦。于是，漫游者的目光亮了又亮。苏东坡总是牵挂很多人，很多人也就牵

挂他。他不辞遥远去造访朋友，朋友们又千百里来造访他。

苏东坡四十几岁贬黄州的时候，陈慥七次到黄州看他，他三次去歧亭回访。十次往返，加起来就有好几千里路。眉山人巢谷，从家乡出发去湖北黄州，后来又以七十三岁的老迈之躯，不远万里去看望贬到海南儋州的东坡，累死在广东境内的新州道旁。而苏州的和尚卓契顺，徒步走到惠州，为东坡送一封珍贵的家书，翻山越岭走到惠州城，人都走变形了，东坡问他想要点什么，他说：有所求我就到京城去了。

牵挂亲朋，牵挂家园，牵挂天下苍生，苏东坡的一生可谓“大牵挂”，总是操不完的心。活得广阔，活得认真而投入，是谓深度之生存，而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浅表性生存、快餐性生存、无根性生存、被生存。东坡的出行、远游，看朋友占了很大的比重。“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和江西九江的一群素心人你来我往，日复一日长足于道路：闲暇则相思，“登高赋新诗”，这作派这风度，苏东坡是羡慕到家了。他到处去看朋友，少则住几天，多则盘桓几个月。哪怕是个小村落，他也想穷尽它的方方面面，备尝它的风土人情。他是著名的夜游神，游赤壁，游石钟山，游夜西湖，游夜海岛……披星星踏月色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在黄州有一次骑马远游，东坡先生游丢了，整夜不归，家里人急了，四处去找他，发现他睡在一座拱桥边，桥柱上赫然有新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解鞍欹枕绿杨桥，我欲醉眠芳草！”家人和布谷鸟同声唤醒他。

美得像神仙，难怪人们叫他坡仙。凡人身上有仙气，苏东坡最典型。

杰出的艺术家，个个是美神。普通人怎么办呢？法国大哲福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把自己的一生视为艺术创造。

修身认真，敬畏天地，然后才能赢得感觉的丰富性。感觉的丰富性乃是一切生活质量的前提。对旅行者来说，当把实实在在的感觉摆在首位。

我认识的一个从不看书的“木脑袋”，曾经夸耀他去了北京天安门，我揶揄说：你那木头脑袋老是东张西望的，跟一块圆石头滚过了天安门广场有什么区别吗？当时我二十多岁，说话比较损。

而这几年，一些四川人自驾游，不过是换个地

方打牌而已。即便是在气象万千的峨眉仙山，不打牌他就打瞌睡……

心思放不远，人是走不远的，即使走到地球的另一面，他碰上的还是他自己，肉身拖着精气下沉。而陆游学习苏东坡的岭南之旅，八十五岁还在浙江绍兴读书修炼。

如果你读过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欣赏过列宾等巨匠的油画，那么你去俄罗斯，就会赢得感觉的丰富性。

萨特的红颜知己兼生活伴侣波伏瓦，徒步穿过法国，她那海量的感觉与思绪，任何高科技仪器不能测量。

苏东坡五十年走过了几百个城市与村落，几乎全是“深度游”，人们形容他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天风海雨逼人”。诗意之旅，谈何容易。

慢慢走，不着急。不要蜻蜓点水。拜读大好山河，先练审美之眼。

苏东坡年近半百还在攀岩，他爬黄冈的赤壁，直上峭壁之巅，不怕怪鸟巨蛇，“二客不能从焉”。二客之一的杨世昌，是个以漫游著称的道士，他比苏轼还小几岁，体魄与胆魄却甘拜下风；苏轼月夜造访石钟山，和长子苏迈驾小舟同往，攀上那块可容百人的大石头，躺在岩石上，翘起二郎腿，仿佛躺在巨型乐器的顶部。茫茫江水冲击石窟，岩层天籁演奏交响，苏氏父子美得哎哟喂浑身疼，满天大星星朝他们蜂拥，闪烁着无边的神性。苏东坡大激动，偏偏又能够冷思索，他修改了郦道元《水经注》关于石钟山的结论，写下《石钟山记》，永载华夏教科书。他登惠州的罗浮山，攀白水山佛迹岩，吃荔枝浦的鲜荔枝，漂浩荡东江水，建东新桥、西新桥，推广农业技术，捐资修建至今犹存的永福寺放生湖……这个眉山男人啊，既是豪放潇洒的艺术家，又是心思缜密的科考专家。他还是优秀的水利、建筑工程师，是良医，是种植的内行，是茶道的推广者，是热血智者，是宋代第一勇士，是内心与外形高度统一的头号美男，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是古代最好的地方官之一。

苏东坡的生命符号，何尝小于孔夫子？

为什么能这样呢？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可作诠释：“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这话我曾用作《品中国文人》的卷首语。

东坡四十九岁游庐山，转悠半个多月，访高僧，品香茶，泡温泉，吃美味，留墨宝。开头几天，写

诗很一般，像他祖父苏序写的顺口溜。佳作就像佳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当初他在济南逗留，屡观趵突泉，畅游大明湖，也无好诗出来。其中的奥妙，东坡先生自知：“写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五百里大庐山，约二十天漫不经心的游览，先生终于被灵感击中，《题西林壁》横空出世：“横看成岭侧成峰……”

东坡近六十岁贬惠州、儋州，五年半的岭海生涯，备尝人间苦难，永别“散花天女”王朝云。可是他照样在常人难以抵御的苦难中抬起头来，享受岭南好湖山，调动一切“政治资源”行美政，帮穷人，和惠州老百姓血肉相连。时至今日，惠州人多么爱戴他。惠州市政府对东坡文化高度重视，今年又要举办纪苏盛会。而杭州人至今称他是“我们的老市长”；黄冈市斥资十个亿，打造七千亩东坡“遗爱湖”主题公园……伟人感动中国，一千年还在升温。

苏东坡在惠州各地畅游，活动半径很大，灵感如岩浆，好诗如喷泉。在儋州，他与黎族人共游，穿木屐，戴斗笠，看朋友，办书院；和黎汉男女共舞神奇的古调声，精气神为之一振。他骄傲地宣布：“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又空前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些传神句子，如今成了海南最好的旅游广告词。

广东惠州人则津津乐道：“自从东坡谪岭南，天下不敢小惠州！”

苏东坡走到哪儿就爱上哪儿，寸寸抚摸山河，魂牵梦萦百姓，这是一个谜。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学习。

苏东坡的诗意之旅，说不尽道不完。本文挂一漏万。

2011年5月13日 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惠州市评选的“东坡文化论坛”6篇优秀论文之一）

切皆是虚幻而无法把持的消极人生观，决定了她对现实世界的疏离与绝望。而苏东坡对佛教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他确实说过“今年洗心归佛祖”（《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但最终觉得“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他的思想和精神，始终停留在现实世界里。尽管很矛盾、很痛苦、很无奈，苏东坡也不得不按世间的常情、常理、常法来处理与王朝云的关系。

苏东坡“二妻一侍妾”中，继妻王闰之以博大的胸怀和荣辱与共，穷达不易其节的实际表现，赢得了全家的尊敬和信任。苏东坡在元祐八年八月一日《祭亡妻同安郡君文》里公开表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看法，此后苏东坡完全可以将侍妾王朝云扶正为妻子。然而碍于艰难的现实处境，碍于“毋以妾为妻”的古训（《谷梁传·僖公九年》），碍于朝云无子和全家人的认同（特别是弟弟苏辙的态度），对人间婚恋日渐失去兴趣和信心的苏东坡、王朝云终于没有走出这一步。苏东坡的“未能免俗”和王朝云的“一心成仙”，大大加浓了这场人间“才子佳人”的生死恋的悲剧色彩，说“此恨绵绵无绝期”毫不为过。

后世的研究者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偏爱，比如影响较大的《苏东坡三部曲》（钟莱茵著），硬把王朝云脱离时代特征和局限，渲染成苏东坡最光彩照人的“第三位夫人”，其研究的方法和客观实际就值得认真审视了。

2011年5月至7月撰稿

（眉山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上接第34页）

王朝云“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朝云墓志铭》）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种看破红尘，认为一

散谈乌台诗案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江澄格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乌台诗案发生的政治背景、人物心态和事件始末，然后就《乌台诗案》的流传、内容和特色加以评点，最后对诗案的利弊加以评说。

关键词：苏轼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

曾经被神宗皇帝嘉许为“奇才”的苏轼，尽管他从不以孤高自负、卓犖自许，但因其人品高洁、才华出众、秉性脱俗，总免不了惹人嫉妒、受人指责，甚至遭人攻击。

北宋末年，国势积弱，朝纲不振，皇上求治心切，重臣方策众多。激进派不惜残民以逞，大喊着求新、求变的口号，不管天下苍生是死是活，一味强行蛮干。对以民生为重的温和派，则视为不同调的异己，不合作的异端，甚而进一步诬谪其为朝廷国政的反叛者，对其发动围攻、进行群斗。苏轼就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俗话说“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刹那之间，漫天乌云密布，疾风迅雷交加，八方风雨骤至。一向反应锐敏、遇事机灵的苏轼，对来自御史台的指控与外界流言责难深感不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作何解释。事实上也是“与其争辩也是徒然无益”，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是苏轼尊翁苏洵《权书》中的名句。日常也多受到这方面教诲的苏轼，深知“镇静是处理一切巨变首要的基本方策”。故尔在遭受到指控诬告之初，既不鸣冤也未叫屈，更不作任何辩驳，不曾有一句自白，抱着坦然的态度，用无言以对的默然，来回应百般的污蔑、千种的谰言。蜀中流传有一句遍为童稚所知而又绝对有效的俗语就是：“原地蹲下不动，可以吓跑一群疯狗。”这是自保的有效绝

招，亦为自救的易行上策。北方人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渐渐向自己逼近企图发起围攻的狼群，无论是白天或者是夜晚，都会引起狼的狐疑，使其畏然怯步。采取这种不反击的低姿态，是基于“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兵家常用的最佳策略、最高战术指导原则。

由于熙宁末年元丰之前，朝廷之中政争波涛汹涌，很少有人不被卷入。职不论高下、位不分尊卑，官拜宰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安石，在熙宁七八九的三年之间，竟然“累仆累起”，年免年复又年免。神宗求治心切，可是用人不当，最大的弱点是不识忠奸不说，并且还不明是非，朝廷高官有了派系，是因为政策摇摆不定，时而革新，时而沿旧，政策对立，互不相容。“乌台诗案”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别有用心的一些人摘录对方平时生活中所写的一些章句用辞来大做文章，擅自以己意解释，既不合乎常理，也违背本文原意，很明显地看得出是“故意栽赃，刻意陷害”。神宗任由谗臣将苏轼推入陷阱眼看大家落井下石。

造成“诗案”的第一本参劾奏章，是由御史台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所撰，以苏轼在徐州任上治水有功，加恩量移湖州，上任后呈皇上谢表之中，找出一些字句来加以曲解。参劾的奏章指明：

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垂拱殿进呈。

这章举奏参劾文疏，辞不达意，且不是激进派对苏轼所发的第一支暗箭。在此之前，太子中允集贤殿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早在同年一月二

日,时逢新春正旦佳节就上过一道劄子,内容指称:

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殿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襄汉梁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輿盖可谓大不恭矣……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伏望陛下,体先王之义,用治世之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元丰二年一月二日。

前后两案,主控检举分别各有其人,但同劾一事,共谪苏轼“悖慢放肆”。其计之狠毒,是在将一般行政措施,上推至御前,视为圣旨,非论新政,就是反对皇命,据此而论非,百口莫辩。相继又有国子博士李宜之、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上疏,附和追查究办,于是“柏台”成了“乌台”。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赴湖州上任不久,被朝廷所派遣的中使皇甫遵拦截逮捕,解京下狱,案经大理寺彻查严审,并无实据,主要是自徐州守湖州是升迁,并非贬调,上表谢恩是常例,并无怨“由”之意,不宜另作推测。

历史上对于这段造成苏轼系狱百日冤狱的经过情形,有些前贤曾经予以相当的关注,并且着手搜集访求当时保存在御史手中的机密案牍。其间包括最初举发的奏章奏疏、谪官后的表章书启诗词等。汇编成册,书命名为“乌台诗案”。保留了南宋时代之旧貌的《乌台诗案》现存文本,除诗话类书籍和各种苏诗注本中引用的以外,最著名的当首推蜀人朋九万的《乌台诗案》,为清中期李调元《函海》所收。李调元是绵州人,字美堂,号雨村,乾隆进士,授员外郎,出任通永道。调元博于学,自经史百家,以及稗官野史靡不浏览。李调元在“乌台诗案”的序言中指称:

乌台诗案一册,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作《乌台诗话》十二卷。蜀人朋九万录东坡下御史狱公案,附以初举发章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而成之者,今所得宋本合为一册不分卷次。

再往前推进追索至宋代的始作俑者陈振孙,安吉人,字伯玉,号直斋,端平中为浙西提举,尝仕于莆田。尝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余卷,著有《直斋书录解题》。

由乡贤朋九万汇编而成的“乌台诗案”这本集子,阅读过的社会大众可能不会太多,可是知道乌台诗案,这桩陷害苏轼事件的人,就绝对为数不少,也就是凡是知道苏轼这个人都晓得乌台诗案,这件荒唐至极怪诞荒谬的事。从古到今,为时已将近千年,大家长记在心,嘴上也还在谈论,并且是兴致不减、热情不逊,显然是愈“炒”愈热,以致形成“书以案为名”“案用书显真”。因其是出自当时人物的手笔,当中收入了不少直接而又具有高度可靠性的相关资料。虽然并不是原件旧纸,但都是照录誊缮的全案原文、实录抄本、状纸誊本,然后把这些“原文照抄”的汇本,刻版印刷成书,因而得以流传于世。在当时设法要从大理寺或是御史台、御史手中取得这些说法不同,可是攻击目标一致,交相谴责苏轼的奏疏控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相当高的困难度和危险性。

“乌台诗案”一书,是以档案文件为主的历史资料汇集。它记载了当事人的呈述,包括了原告的指控和被告的辩解、自白、供诉,可见案件的发展经过、审讯过程和最后定讞。同时也揭露出新政集团激进分子相勾结急欲陷苏轼于绝境、置苏轼于死地的狠毒。他们把苏轼当作公敌,并且早已挽弓在手,已然到了非放不可“忍无可忍”的临界时刻。苏轼被捕下狱之后,未蒙赦免之前,“百日冤狱”期间,那些口头高喊“富国强兵”,心里无虑苍生的“改革派”,为加强罪证严密罗织,因而加紧了对苏轼历年著作文字方面的清查、审核、检视,下令各地方官衙全面侦缉搜查,予以没入,务求细察,绝不容片纸只字留存,饬令“各级地方官府一体详察细查,诸凡苏轼手笔文字,不论内容所述及文章类属概以专案快报上呈,选派专差以特快加密封专解,如有怠忽差池,以同案共犯论处,居官有职务在身者,罪加一等”。

这样一道出自御史台由大理寺发出的文疏。

(下转第 57 页)

从《清明上河图》 看三苏在京城寓所、宅院和府邸

刘继增

内容提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京城开封的繁荣景象。能否从画面中找到“三苏”在京城寓所、宅院和府邸呢？作者以清明上河图、北宋臣庶室屋制度和三苏诗文等文献为依据，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 三苏 寓所 宅院 府邸

由“眉山一中”学生提出并引发的从《清明上河图》探究三苏在京城寓所、宅院和府邸的问题，对于探索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中弘扬三苏文化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3月，拙作《三苏在京城开封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初探》^①在中国苏轼学会会刊《苏轼研究》2011年第1期发表后，7月7日收到“眉山一中”一位学生的来信：

读了文章后，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刘爷爷：不知道东坡先生当年在京时的寓所、宅院、府邸能否在《清明上河图》上找到呢？虽然我是中学生，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多想去搞清楚！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2010年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在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中国馆闭馆后又赴港、澳、台展出，引起不小的轰动。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首段：

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汴京市区的街景。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各色人物大者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纤毫俱现，极富情趣。描绘的人物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都要多。其中比《三国演义》多452人、比《红楼梦》多668人、比《水浒传》多856人。《清明上河图》被世人公认为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艺术史证。通过这幅画，可窥测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一斑。

三苏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从嘉祐二元年（1056）起在京城汴梁居住十一年零七个月，官至三品，先后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其弟苏辙，官至尚书右丞、守门下侍郎，位列六执政之一。他们当年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能否在此名画上找到呢？

二、寻找的依据

中国封建社会里等级制度森严，并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屋的建筑形式、房内外的建筑装饰，更是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载体。如在《清明上河图》中寻找三苏在京城寓所、宅院和府邸，必须以北宋的“臣庶室屋制度”作为基本依据。

景祐三年（1036）二月丙辰，仁宗诏两制礼官详定京师士民服用、居室之制。景祐三年（1036）八月三日，仁宗颁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

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墨漆梁柱、窗牖、雕缕柱础。”②

据《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载，“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台、曰部、曰寺、曰监、曰院，在外监、司、州、郡曰衙。在外称衙而在内之公卿大夫士不称者，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称。后在外藩镇亦借曰衙，遂为臣下通称。今帝居虽不曰衙而在内省、部、寺、监之名则仍，唐旧也然。亦在内者，为尊者避。在外者，远君无嫌欤。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诸道、府公门得施戟，若私门则爵位穹显经口赐者，许之。在内官不设，亦避君也。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桯栿。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鸱。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为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③

从以上两条文献可知：

一是，北宋品官之家才可称“宅”；“执政”，北宋称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执政”之家方可称“府”。如此一来，苏辙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时，在京城开封的家，其名方可称“府”；苏轼在京城开封的家，只可称“宅”。

二是，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或“门屋”。宋李诫《营造法式》载，乌头门：《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楬、闕闕也。楬音竭，今呼为棖星门。”④门屋（门屋），宅院出入的建筑物设墙和门，上有屋顶，前后两面有柱无墙。

三、找出的画面

以文献记载的北宋的“臣庶室屋制度”为基本依据，可查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上有六品以上的官宅三处：

一处在城楼外搭棚“课命”者的右侧。大门上部呈一间房屋形，两扇大门敞开，门上虎头钉三排。大门两边是整齐的土院墙，院墙上有短杈子。墙右边竖靠着一把大遮阳伞、两杆旗，墙左边竖靠着两杆旗、两杆枪、门外六人：三人坐在门外两边台阶

上，另外三人一人蹲在树下、一人靠墙蹲着、一人趴在地上睡觉。院内有一匹马卧在地上。

一处在“赵太丞家”药店一侧。有一“门楼屋”院落，屋檐施铺作（清工部《工程做法》中称斗科，今称斗拱），门前有上马用的三级台阶，又称上马台。檐下台阶坐着两人一人坐在上马台上，三人似在交谈；又一人背着包裹，在向看门者打探什么。

一处在“赵太丞家”药店对面。一宅院大门房顶檐下亦饰铺作，顶下门柱两个，两扇门敞开着。开封文化艺术中心研究员韩顺发在《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以《〈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建筑与等级制度》为题撰文称之为“乌头门”。周宝珠认为只是带有斗拱的一种门楼，为官员宅第，而非一般民居。

《清明上河图》画面上有一处寺院：坐落在城楼外平桥东端北区的大街边上，这条街北边临河，寺院坐北朝南，一僧人身披佛衣，伫立在寺的偏门外，作拱手状。寺院房檐下有斗拱，檐廊有杈子，大门两扇，门板上排钉清晰可见。门外街上行人稀少，显得格外宁静。⑤

四、问题的破解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被誉为东京的民俗画，尤其是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推出，其直观效果有着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清明上河图、三苏诗文珠联璧合，为探究三苏在东京汴梁的寓所、宅院和府邸提供了立体的想象空间。判读纸质版和动画版《清明上河图》中的三处官宅的画面，至少让我们对三苏在东京汴梁的宅院有一个直觉的感受：其宅院的呈工字型或王字形的布局，宅院大门为门楼屋或乌头门。《清明上河图》中寺院的画面使我们对三苏的寓所——兴国寺有个意象，加深了对苏轼、苏辙在进士考试之前寓居兴国寺浴室院的直觉感受。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京城汴梁的东南部，即沿汴河进入城区闹市的区域。嘉祐元年

（1056）五、六月间苏洵携子轼、辙抵京师应试馆于兴国寺浴室院。即里城墙西门——阊阖门内至宫城宣德门前之间的“御路”南侧。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轼母丧服除离蜀抵京师，赁居一宅子暂住在里城西岗。嘉祐五年（1060），苏轼授福昌县主簿、澠池县主簿未赴，仁宗诏敕制科考试，

遂寓居怀远驿准备制科。怀远驿，待交趾使，为京都四驿馆之一。据孔凡礼《三苏年谱》引施注《苏轼诗集》、《北道刊误志》载，怀远驿位于丽景门河南岸，旧城内左一厢，又名崇德坊、兴道坊。苏辙中制科后，从怀远驿搬出居太学。城南痒斋（太学）北宋为最高学府，在里城南。嘉祐五年（1060）三月苏洵寓居雍丘（杞县）一年余，轼、辙备考制科期间多次前去与伯父、父亲相聚。雍丘城（即今杞县县城）距京东八十七里。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朝廷任苏轼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赴任前，苏轼在宜秋门里购得一住宅，名南园。宜秋门为内城西墙南门，因唐汴州城称郑门亦称旧郑门。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在范镇东园寓居两个月。范镇东园，位于京城外城东门——陈桥门外。范镇，字景仁，时以户部侍郎致仕，东园是其别业。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苏轼再次回到京城居闾阖门外白家巷中。闾阖门为内城西墙北门。东府——苏辙在开封的府邸，位于京城大内宫城正门宣德楼右掖门之前。由此可见，三苏在京城汴梁的寓所、宅院、府邸都不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区域内。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绘画艺术，他运用的是艺术手段形象地展示，但它不能够也不可能一一证诸史事，以图证史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被誉为东京的“百科全书”，但《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具体楼店，图上一个也没有；图上标出楼店字号的，《东京梦华录》又缺载就是例证。一定要把画面指为某一实体建筑，那就会走向忽视艺术特征的极端，是不足取的，也是不科学的态度。

作为一名中学生在读了今年《苏轼研究》第1期《三苏在京城开封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初探》后，大胆向作者提出的问题——实现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和世界千年英雄有效链接，我真乃感到后生可畏、“不觉汗出”！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多少突发奇想，需要从事三苏研究者想还没有想的论题需要我们去“背书”？这名敢于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有兴趣渴望解决问题的中学生来自于“眉山一中”，得益于所他在学校“景苏润德”理念、“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教风、“自进不已，自致其知”的学风滋润。苏东坡在《日喻》中，把亲自钻研、全面把握、透彻领悟、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过程，叫做“致知”。把“致知”作为我们生活的快乐，

自下而上的本领，同时积极主动地构建知识体系，特别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好之、乐之，进而形成“自进不已，自致其知”的学风，也应成为三研究者的借鉴。诸如此类的“突发奇想”是推动三苏研究前进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论文注释：

①刘继增《三苏在京城开封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初探》，《苏轼研究》2011年第1期51～56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96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0页。

④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⑤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79～81页。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郟县苏轼研究学会执行会长）

亭亭欲立东坡魂

——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续篇（一）

吴继路

内容提要：本文选择苏轼诗歌中以亭为题材或者题旨的作品80篇左右，分为自叙、典故、唱和、景观四类加以记述、介绍和评点。苏东坡亭文化涉及作品本身、时代背景、风景名胜和人物品格诸多方面，很有意味。

关键词：苏东坡 亭 亭文化 东坡魂

引

钱钟书《宋诗选注》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苏轼是宋诗最杰出的代表，郑振铎评苏轼是“最有天才的诗人，在宋代的诗坛上，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其地位和杜甫在唐是没有二致的。”将苏轼与杜甫比并，称之为“异代相对的双璧”。

本文并不涉及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的历程、成就、地位和影响，本文只关注苏轼诗歌所热衷描述的关于亭的题材。而这个题材可称是苏轼诗歌创作上无古人后乏来者的独创性贡献，以前还没有被记述和研究过。亭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许多国家，特别在文化悠久的民族都有过的。但是在长远的历史中，亭这种形构简易、规制不大的建筑，在我国丰赡精微的文化土壤中，将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相融合，从而形成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亭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成为一个值得瞩目的亮点，这个课题本该引起人们着意研究的。笔者撰写的《精魂长峙天地间》在《苏轼研究》2008年第1期刊载，首次揭出“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题目。该文以现今仍然存留于全国各地、成为文物名胜景点的亭为题材，从苏轼传世作品中的亭记、词赋等作品展开叙述，证明苏东坡乃是中国特有的“亭文化”

的当然代表。随着对苏轼文化现象的开拓与深掘，人们发现他的全部作品，乃成为中国11世纪文化集大成的优质富矿，提供给后世的文化遗产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他完全有资格跻身世界文化名人之列，被敬重播扬。

我继续就“苏轼与中国亭文化”这个题目探究下去，惊喜地发现：单在他存世的主要文学体裁诗歌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亭为题目、题材和题旨的。他存留的诗歌共有二千七百余首，而其中以亭为内容、为背景、为吟咏对象的诗作竟达七八十篇，就是说，他的每四十或三十篇（首）诗作中，就有一篇是关涉亭的。这个事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两项重要信息。

其一，社会文化领域。人们看到，在北宋后期，东坡生活的11世纪，作为建筑形式的亭已经相当普遍，亭成为人文内涵的载体，与文人学士发生密切关系。仅从“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便可以摘出许多描述亭或以亭为背景的佳篇。东坡仕途坎坷，足迹遍布各处，他喜游山林寺观，嗜爱风光名胜，更善于结交各色人物。他咏亭的诗篇，恰恰成为当时甚为兴盛，独具中国特色的亭文化的珍贵遗产。

其二，文学艺术领域。东坡作为宋代诗坛巨擘，他的大量诗作，在题材与风格上力主创新。无论豪健清雅、质朴简远、平实险峻、瘦削丰腴，他的诗作都随势赋形、臻于化境，许多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凡这些创作气质格调上的非凡功力，都能够在他描述亭建筑的作品得到确切印证。从诗人主体方面考察，如同在一枝一叶上更精微地鉴赏参天大树，应该也算研究苏轼人品、作品的一项方法吧。

现在，让我把东坡有关亭的各式诗歌分作几大

类别逐一咏诵与考察。这里的分类，一是顾及到诗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也关涉诗人由情思意趣而酝酿成的特定主题，而这些还与亭建筑本身的性质、价值及其文化内涵特点等相融会。考虑到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的多重因素，以下我们且把苏轼的亭诗划分为四大类别，分别记述。

一

第一大类，跟大诗家东坡本人的生活经历、行为、情感紧密相联，可以看作他不自觉的“自叙诗”式作品，这些亭诗跟东坡的境遇命运的缘分，既可以使后人体察东坡的人格风范，也能够深味他艺术创造的底蕴渊源。当然从“亭文化”意义上，更可以给人独特的重要的启发。

喜雨亭

东坡二十二岁出蜀入京，在科举中幸遇伯乐，以才赋“出人头地”。二十七岁首次被朝廷召任官职，到凤翔府作签判，辅助太守处理文书及行政事务。东坡性情自幼素喜创造，任职不久，他就筹划并着手整理环境，把衙署中一块废弃已久的宅地改造利用，建横池、短桥、厅廊，在空地上栽十几种果树。而他特别用心的，是“于其廨宇之北隙地为亭”，即拆了墙，建造成一座亭。起初没有为亭特意命名，就叫“北亭”。说东坡一生与亭有“奇缘”，这是他亲自设计并督建的一座亭。园林完工，刚好弟弟子由寄了诗来，东坡乘兴和答，就以新落成的诸景观为题材，写了《次韵子由岐下诗》，共二十一首。第一首诗正是咏亭的，题为《北亭》：

谁人筑短墙，横绝拥吾堂。

不作新亭槛，幽花为谁香。①

诗句点出了亭的位置重要，成为统领园林景致的核心。辛勤营造的园亭，为他和朋友带来盎然情趣，正如他作当时的诗句所记：“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风光。”为了给新亭增彩，他还特地托人把当地仁寿宫（隋朝旧物）的奇石搬来作为装饰，使这座亭子更具古色古韵意味。

事情更出他所料，这座原为衙内赏景的普通的亭，后来竟大大出名，成为千载存留的一处名胜。现在陕西凤翔市东湖公园内的一座引动游人观赏的亭，名喜雨亭，它的前身正是东坡建造的北亭。

原来北亭落成之后，凤翔一带正遇干旱，春夏无雨，官民焦虑。东坡被太守派遣，负责祈雨仪式，赴太白山拜神，请来“圣水”。同时他还受命向朝廷呈递奏折。幸逢天公作美，连降喜雨，旱情解除，万民欢悦。东坡与同僚在新建的亭中祝贺。他才华横溢，当场撰作一篇感念的文章，同时为亭取了一个应时的名字，叫“喜雨亭”。东坡撰写的那篇文章即《喜雨亭记》。物以文传，于是此后喜雨亭名声远播，穿越千载历史，喜雨亭成为亭文化的典型，也是东坡与亭极有奇缘的物证。他所作的二十字咏亭五绝诗，也应该认作东坡系列亭诗华美乐章的序曲。

会景亭——招隐亭

东坡在凤翔，年富力强，借公差机会，遍游当地山水风光。他时有发现，建北亭与作《喜雨亭记》的那年八月，他路过南溪，看到那里有座亭，名叫会景亭。他考察一番亭的周遭环境，感觉有些名实不符。他设想，这座亭如果迁移到西侧，那里濒临断崖，向西眺望，视野开阔，奇景入怀，观感会好得多。可是时间紧迫，他的设想没有能兑现。于是带了憾惜，他作了一首诗《南溪有会景亭，处众亭之间，无所见，甚不称其名。予欲迁之少西，临断岸，西向可以远望，而力未暇，特为制名曰招隐。仍为诗以告来者，庶几迁之》，把期望融在诗句中。于是这首咏会景亭诗，便成东坡挚切关注亭建筑的文字，诗曰：

飞檐临古道，高榜劝游人。

未即令公隐，聊须濯路尘。

茅茨分聚落，烟火傍城闉。

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

居民惟白帽，过客浸朱轮。

山好留归屐，风回落醉巾。

他年谁改筑，旧制不须因。

再到吾虽老，犹堪作坐宾。②

当时的东坡，刚踏上仕途，才二十八岁年纪，而在诗里表达了一种憧憬隐者生活的意向，希望有人把这座会景亭移址改建，并且重新命名为“招隐亭”。他说将来自己老了，再来到这亭里，极乐意作作嘉宾哩。

墨妙亭

苏轼属于举世罕见的多面天才，在艺术与文学领域都富于创造，被后世誉为“艺文精魂”。诗词文赋方面的造诣不必说，他还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大师。历史上号称的“三大行书”，指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东坡倡导“尚意书风”，追求自我个性的表达，认为“书为心画”。他的书作与理论对中国书法产生深远影响。东坡恰有一首畅论书法的亭诗，成为他书法理论与实践以及艺术精神的特殊表达。这首诗在他以亭为题材的诗作中举足轻重。

东坡三十七岁，被朝廷任命为杭州通判。当时任湖州太守的孙觉，字莘老，是东坡的挚友。孙太守热衷文化教育事业，雅好古迹文物，在任上大力收集历代金石碑刻，古籍书帖，特地修造了一座陈列馆，取名“墨妙亭”。东坡被邀参观了“故开新馆集琳琅”（曾巩诗）的墨妙亭，除了作一篇亭记，赞扬这件好事，还应好朋友之约，创作了一篇长诗，专门记述书法的历史沿革，同时阐述他的书法主张。文学史上专讲书法的诗不多见，东坡的这首《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便成为独树一帜有特殊价值的佳作。全诗如下：

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
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
峯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
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
奇踪散出走吴越，胜事传说夸友朋。
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
后来视今犹视昔，过眼百事如风灯。
他年刘郎忆贺监，还道同时应服膺。③

后世学者纪晓岚评这首诗为“通人之论”，“句句警拔，东坡极加意之作”。在东坡亭诗中，这篇论书法的诗弥足珍贵。如今墨妙亭已不存而诗的生命则长在。

种德亭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苏轼的才赋与品格都超卓出众，德艺双馨，有些言行，则称得上高风亮节。他也终生以德行修养鉴人交友。表达他这种观念情思的也有一首亭诗。那是他应邀为一位朋友家园林的亭命名，并题赠一首诗《种德亭并叙》。亭题名为“种德”，诗前小序交代了原由：“处士王复，家于钱塘。为人多技能，而医尤精，期于活人而已，不志于利。筑室候潮门外，治园圃，作亭榭，以与贤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终无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艺果之勤，而不知所种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诗以遗之。”诗曰：

小圃傍城郭，闭门艺术香。
名随市人隐，德与佳木长。
元化善养性，仓公多禁方。
所活不可数，相逢旋相忘。
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
我欲东南去，再观双桧苍。
山茶想出屋，湖橘应过墙。
木老德亦熟，吾言岂荒唐。④

这首诗里的“我欲东南去，再观双桧苍”一句，还连带着跟东坡命运相关的典故。东坡写过描绘王秀才园中双桧的两首诗。第二首是：“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后来，东坡遭遇政敌诬陷，入“乌台”文字狱，差点丢了命。一个叫王珪的朝官就举出这首诗，给东坡栽脏，说：“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地下之蛰龙，不臣孰甚焉！”皇上给了这构人之罪的家伙一句：“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

垂云亭

熙宁年间，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期间，结识了一位僧人朋友，法名清顺，怡然清苦，喜欢作诗。东坡与他交谊甚笃，给他寄的诗曾说：“年来渐织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后来，清顺在名寺宝严院修建了一座亭，名为垂云亭。从选址、筹划直到亭子建成，东坡参与了全过程，投入了精力，因而也十分熟悉并赏识这座亭的优势与特点。他自己在凤翔督造了喜雨亭，可是从地址、气派与影响看，那亭显然不能与这座西子湖畔风光无限的垂云亭

相比并。他诗情喷薄，写出了一首被后人称赏为“锻炼之工，字字创获”的诗《僧清顺新作垂云亭》。风骨峻耸，追踪韩昌黎（愈）又极具本色，诗曰：

江山虽有余，亭榭苦难稳。
登临不得要，万象各偃蹇。
惜哉垂云轩，此地得何晚。
天公争向背，诗眼巧增损。
路穷朱栏出，山破石壁狠。
海门浸坤轴，湖尾抱云巘。
葱葱城郭丽，淡淡烟村远。
纷纷鸟鹊去，一一渔樵返。
雄观快新获，微景收昔遁。
道人真古人，啸咏慕嵇阮。
空斋卧蒲褐，芒屨每自捆。
天怜诗人穷，乞与供诗本。
我诗久不作，荒涩旋锄垦。
从君觅佳句，咀嚼废朝饭。⑤

东坡所作的亭诗很多，对亭的观察鉴赏也极具见地。可咏亭的作品中对亭的形制、位置、优点作全方位描述解读，这首诗则是惟一的力作。至于诗中从头至尾用“险韵”，读起来叫人感到刻削傲岸，气机流走，乃更见出大诗家本色。

万松亭

东坡有幸躲过“乌台诗案”冤狱之劫，于元丰三年正月，从京城出发赴黄州，走上受贬谪的苦难旅程。他路过麻城关山万松岭，来到万松亭，作了一首诗，题《万松亭并叙》，其叙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诗为七律：

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
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
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⑥

作为天才诗人、艺术大师，苏轼千载流芳，最令后人钦仰的还在于他的人格、人品。而其中的根本点是他一贯关注民生，务实公益。十多年前，在杭州他为友人王复写过种德亭诗，现在看到麻城县令所栽种的松树，这种为后人着想的“好德”行为，正是他心仪的风范。种松恰恰是“种德”。可是叫人喟然叹息的，是世间建设者寡，而自私毁坏者多。

在这首咏亭诗里，东坡殷切呼出了他的期盼，提到古诗《角弓》留下的训诫。《角弓》是《诗经·小雅》收录题为《桑扈之什》的诗，全诗主旨在于提倡人与人之间宽容和谐。其中有句子“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意思是说只要君子有善道，人民自会跟着跑。又说“如蜚如髦，我是用忧”，意思说为人行事如蜚夷，我心为此甚忧愁。

临皋亭

我们称颂苏东坡是“中国亭文化的代表”，说他一生与亭有“奇缘”。而在宦游四方，历经坎坷，与各种亭的关系中，最紧密、最独特，大可称“天赐奇缘”的一座亭，是黄州的临皋亭。名字叫亭，实际这地方本是公家建设的一处驿馆，接待往来公差的。此亭地处黄州朝宗门外，建于江滨夏澳口侧，依岸临江，屋舍早已破旧。东坡被朝廷贬放黄州，做个有职无权的团练副使。他刚来时候，没有官衙住所，他曾与儿子借宿定惠院僧舍。待全家人到了，太守做主，特地把临皋亭拨给他，作为东坡一家人栖息处所。于是“亭”便成了他的家，一住便住了四年多。

而谪居黄州的四年，在东坡一生经历中意义极重要，这当中，他的生活、思想与创作都发生极大变化。他在这里亲尝苦难，从被皇帝信任的朝官，地方首长，一下子投荒过农民式的日子。当然他也更亲近大自然，体验“适者为乐”的情味，充分展现精神空间，发出过“临皋烟景世间无”的赞叹。而他本人在名为“亭”的住所里，进行了对世事人生的深入思索，联系自己大起大落的遭际，他憬悟玄机，但似乎又无话可说。这位天纵大才的诗豪，便在新居临皋亭，写下袒露心迹的诗《迁居临皋亭》：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
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
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
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
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
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
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
淡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⑦

东坡从一名被朝廷器重的命官，突然成为流贬荒州的罪臣，巨大的命运落差，对他当然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而一家人居住在驿亭，他却表现出超脱旷达的精神状态与面对灾难的坚韧性格。在临皋亭为题的这首诗里，他引用典故，也直抒胸臆，把“疲马解鞍馱”、“淡然无忧乐”，与厄运周旋的浩然之气，和不作“苦语”的桀骜性情袒露无遗。清代大文士纪晓岚评赞这首亭诗说“有兀傲之气”，颇有见地。

四望亭

东坡来黄州第二年，新任太守看他家生活实在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特地把城东一块荒地拨给他。苏轼带一家人在那里开荒种庄稼菜蔬。那地方原来叫“东坡”，苏轼就把地名取来作自己的“号”，于是子瞻先生自此就叫“东坡先生”或“东坡居士”，这个号变成传播千古的敬称了。他在垦荒耕种的同时，也在那里修建了房舍，取名“雪堂”。那以后他就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创作诗文，挥毫书画，接待宾客，雪堂也成为他寄寓之所。他原本喜爱园林，曾在雪堂近边修建过一座亭，叫远景亭，作为观赏风景之用。同时，雪堂附近原本有一座亭，名为四望亭。那亭是唐元和年间刺史刘嗣之修建的，可算得古迹。唐代诗人李绅还作过亭记。东坡刚到黄州，借宿定惠院，曾经特地到这里来踏访，那时他看到的亭已经破损。可亭附近的风物景色却给他留下绝佳印象。他回去写下两首诗，题目为《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其一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
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
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
鹤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其二⑧

两首吟咏四望亭的短诗，总共有八句，八十个字，那样细致入微地再现了春日的形色声气，花草竹树，生机勃勃，淳朴清新。开头两句“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多么自然，多么气韵生动，声景如在眼前如临耳畔。怪不得千年后的二十世纪，

大文学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在他的大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讲到宋诗大家苏轼作品时候，特别引述了咏四望亭诗首联的这两句。

兰皋亭

元丰八年，东坡北行，二月至南都，曾为朋友王胜之（益柔）所建的妙峰亭留诗。往西行，七月间到达宿州灵壁镇，在这里应邀观光了一座私家园林，即张氏园亭。这座园亭外面，有森然修竹，蓊然乔木，园中引汴水支流储水为池塘。园主人之子张硕，请求造访的东坡赐诗文。东坡写了《张氏园亭记》，并且乘兴以诗句，抒胸臆，作了一首七律，《留题兰皋亭》：

雪后东风未肯和，扣门迁客夜经过。
不知旧竹生新笋，但见清伊换浊河。
无复往来乘下泽，聊同语笑说东坡。
明年我亦开三径，寂寂兼无雀可罗。⑨

尽管描述了张氏园亭的建制景观，但诗的主调却在于表达自己经过灾难之后的心境，他十分景慕向往高士陶潜远离官场的淡泊生活，“聊欲弦歌为三径之资”。如同黄州东坡作农夫躬耕自适的情形，既使清冷索寞、门可罗雀，也无需忧虑。

松风亭

“才高遭妒，树大招风”，苏东坡晚年，再次遇到意料之外的人生大起大落。结束了黄州四年多的流离生活，他被召回朝廷，被委以重任。以后做杭州太守时期他多有建树，政通人和，再入朝受诏命为翰林学士，还被授过尚书职。等到年轻皇帝赵煦登基，受权臣巨奸蛊惑，大批老臣又遭残酷迫害。做了皇上八年老师的东坡，更成为政敌的眼中钉，遭到严重打击，贬官流放到遥远荒僻的岭南。年届六十岁的他，数千里跋涉，一路风尘来到陌生的惠州。

东坡来到惠州，先被当地官员安置到城外合江楼，后不久迁到嘉祐寺。当时跟随东坡照顾他生活的有小儿苏过、侍妾王朝云。

由嘉祐寺进山，还有一座弥陀寺，寺后不远处荒山坡近边也有一座小亭，原来叫峻峰亭，因为僧人在亭周遭栽种几十株松树，树已葱翠如盖，清风徐来，飒飒有声，人们就称小亭为松风亭。那儿成

为游人休息赏景的绝佳处所。东坡曾写过一则绝妙的笔记文《记游松风亭》，仅用百十字，便道破了一个佛教中博深精妙的顿悟之理，即所谓“得大自在”的“破执”。此文已成为千古名篇。

而作为诗界大手笔，从松风亭获得灵感，东坡对世界人生的感悟，化为一篇名诗。他创作了被后人赞誉为“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的诗，诗用联袂七律，题目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蜚雨愁黄昏。
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桃榔园。
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

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
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
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
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①

松竹梅历来成为诗人的眷爱之物。东坡这首咏松风亭之梅的诗，借用了个梅花幻化美女的精妙幽艳故事，韵味更隽永深微，在咏梅诗中堪称极品。而此诗同他晚年的伴侣，先为使女，后来成为侍妾的朝云有直接关联。朝云三十四岁于惠州去世，东坡作过悼念她的诗词，其中讲过“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这位女子长期受东坡熏陶，诵经礼佛，她去世后，东坡在《西江月》高度颂赞她：“高情已逐彩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将她寓意为梅花。所以东坡这首咏梅诗，同悼念眷爱的人相关，又同亭联结一体，在他的亭诗中占有特殊地位。如今惠州有朝云墓，那里人们特地建了一座纪念亭名为“六如亭”，已成为名胜文物。

洞酌亭

苏东坡不仅秉赋超卓天才，而且一生一贯亲民务实，极注重为百姓做实事好事，泽被后人。晚年，他再次遭贬谪，又从惠州迁移海南。当他渡海登岛来到琼州时候，听说当地百姓的生活用水苦涩难喝。他到城东踏查，发现那里有两个泉，离得很近，而水的味道不一样，一个好喝一个不好喝。于是他向当地长官建议，可以把优质水引到方便取用的泉里，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太守接受提议，还特地在泉边修建一座亭作纪念。三年以后，新皇帝徽宗即

位，东坡受诏命从儋州迁往合浦，北渡路上又来到琼州。当时任职的陆太守，请东坡为泉命名并赠诗。东坡欣然应命，他为亭取名曰“洞酌”，并且作了一首诗《洞酌亭并引》。亭名取自《诗经·大雅·洞酌》，他的亭诗也便采用了典雅的四言，诗曰：

洞酌彼两泉，挹彼注兹。
一瓶之中，有澠有淄。
以淪以烹，众喊莫齐。
自江徂海，浩然无私。
岂弟君子，江海是仪。
既味我家，亦哿我诗。①

《诗经》的“洞酌”诗，共三节，起句都是“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意思是打远处去取沟中水，挑回注满这水缸。而诗的意义落在后面两句。诗三节的后两句分别是：“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岂弟君子，民之攸暨”。意思译为：“胸怀广阔的君王，你是百姓的父母”；“胸怀广阔的君王，百姓向往你”；“胸怀广阔的君王，百姓受戴你”。这些理想品格，都可以概括为东坡亭诗中的核心句子：“自江徂海，浩然无私”。

（未完待续）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⑪张先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第391页、第738页、第1714页、第904页、第2138页、第2205页、第2173页、第2763页、第4454页、第5127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苏轼尺牘校勘记(上)

刘奇晋

内容提要：通过与苏轼墨迹、刻帖对勘，作者发现《苏轼佚文汇编》中58件存在错字、错点、错简和贗品等问题。

关键词：苏轼 尺牘 手迹 校勘

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佚文汇编》，见于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苏轼文集》第六册。是继《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之后，先生花费五、六年时间完成的又一成果，贡献巨大，为世人瞩目。

我是个苏轼书法爱好者，孔先生的书我买了几种，读了一些。总的讲，感觉很好，受益颇多。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苏轼佚文汇编》卷二、三、四，计收尺牘238件，其中，自墨迹、刻帖录入者78件。今以78件与苏轼手迹对勘，发现有58件存在文字不确、错漏，标点欠妥，或原本是一件被误为两件、三件，或不同的两件又被误判为一件，以及贗品入录等问题。这里，主要做文字校勘，亦就尺牘系年、分合等发表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如偶有一得，仅供《苏轼文集》再版时修订参考。

校注说明：1. 一件一个编号，按在《苏轼佚文汇编》先后为序。2. 每件一个标题，均使用《苏轼佚文汇编》原标题。p××××，为该尺牘在《苏轼佚文汇编》页码。3. 尺牘文字、标点，一如《苏轼佚文汇编》，照录，仅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4. 校注部份，为尺牘与苏轼手迹对勘发现的问题及个人的意见。

1. 与杜道源五首（五）（P2440）

令子所示，专在意来日，相见即达之，但未必有益也①。辄送十缗省为一奠之用。难患流落中②，深愧不能展毫末也。不罪！不罪！轼手启。

【校勘】①似应标点为“令子所示，专在意，来日相见即达之，但未必有益也。”②此帖有墨迹，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墨迹，“难患”二字之间有一倒置符号，应为“患难”。

2. 与文与可十一首（五）（P2442）

轼启。近递中辱书，承非久到阙，即日想已入覲矣。无缘一见，于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贵眷令子各安胜。轼蒙庇粗遣，但秋来水灾，几已为鱼，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见。老兄别后，道德文章日进，追配作者。而劣弟懒堕日退，卒为庸人，他日何以见左右，惭愧而已。所要拙文，实未有以应命，又见兄之作，但欲焚笔砚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虽与时阔疎，而公议卓然，当遂践清近也。岁行尽，万万以时自重，不宣①。轼再拜与可学士老兄阁下②。十二月十六日。

【校勘】①据《西楼帖》，“自重”后还有“谨奉手启上问”数字。补后应为：“万万以时自重，谨奉手启上问。不宣。”②阁，《西楼帖》作“閤”，虽字不同而其用同“阁”，从之。下同。

3. 与文与可十一首（六）（P2443）

轼启。郡人还，叠辱书教。承尊候微违和，寻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书云：尊貌颇清削。伏料道气久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忧悬，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轼近来亦自多病，年老使然，无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真可为古今之冠，谨当缀黄素其后，作十许句赞。盖多年火下，不可无言也。呵呵。闻幼安父子共得卅余轴。谨援此例，不可过望①。所示，当作歌诗题之。轼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愿而不得者。今后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吓之术，一何疎哉。想当一大噱。别后亦有拙诗百余首，方令人编录，以求斤斧，后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见少，当更蒙借示，使

劣弟稍稍长进。此其为赐，又非颁墨惠竹之比也②。冗中奉启，不尽言③。

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正月廿八日。

【校勘】①可，《西楼帖》为“敢”。②颁墨惠竹，《西楼帖》为“颁惠墨竹”。③不尽言，《西楼帖》为“不尽尽意”。

4. 与文与可十一首（七）①（P2444）

轼辄有少愆，托幼安干闻。为近于守居之东作黄楼，甚宏壮，非复超然之比。曾告公作《黄楼赋》，当以拙翰刻石其上。其临观境物，可令幼安道其详，告为多纪江山之胜，仍不用过有褒誉。若过誉，仆即难亲写耳，切告。又有少事，甚是不识好恶，辄附绢四幅去，告为作竹木、怪石少许，置楼上为屏风，以为彭门无穷之奇观，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画，必相继修葺，则黄楼永远不坏，而不肖因得挂名，公其忍拒此意乎？见已作记上石。旦夕寄书去②。正月中遣人至淮上咨请，幸少留意，不罪，幸甚。轼惶恐。

【校勘】①孔注此帖作于元丰元年春，我以为应该是元丰元年的九、十月间。理由是：书云，“为近于守居之东作黄楼，甚宏壮，非复‘超然’之比。”可知作此书时黄楼已成。据苏轼《书子由黄楼赋后》：“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由此可知楼成于八月十一日，大合乐于九月九日，则刻石必在其后。书云：“见已作记上石，旦夕寄本去。”则此书必在九月九日之后，又在十月十六日与文同书（见本文6）之前。②书，《西楼帖》为“本”。

5. 与文与可十一首（八）（P2444）

轼启。叠辱来教，承起居佳胜①。适闻中间复微恙②，且喜寻已平复。轼比来亦多病，渐老不耐，小放意辄成疾，不可不加意慎护也。水后弥年劳役，今复闻决口未可塞，纷纷何时定乎？寄示和潞老诗甚精奇。稍间当亦继作六言诗，殆难继也。未缘会遇，万万以时自珍。谨奉手启上问，不宣。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三月二十六日③。

【校勘】①胜，《西楼帖》为“适”。②《西楼帖》无“适”字。③二十六日，《西楼帖》为“廿六日”。

6. 与文与可十一首（一〇）（P2445）

轼启。稍不驰问，不审入冬尊体何如？想旧疾尽去，眠食益佳矣。见秋榜，知八郎已捷①，不胜欣慰。惟十一郎偶失，甚为怅然。一跌岂废千里②，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语古妙，非世俗所能仿佛。长句偈尤奇，非独文字甘降，便当北面参问也。近有一僧名道潜，字参寥，杭人也。特来相见。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有一诗与之，录呈，为一笑也。未由展奉，万万以时自重，不一不一③。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十月十六日。

《黄楼赋》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留意！

【校勘】①见秋榜，知八郎已捷，《西楼帖》为“见秋，轼知八郎已捷”。②在《西楼帖》，“一”字前还有一“然”字，补后为“然一跌岂废千里”。③不一不一，按习惯，作“不一一”。

7. 与张天觉四首（一）（P2447）

轼启。羁旅索寞久矣，见公得一散怀抱，为乐难名。行日犹欲上谒，遽闻侵夜解去，既而累日风雨，知仙舟未免留连，甚为耿耿也。两沐□□，慰□□□①。即日起居何如？公受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舟中之……②。

【校勘】①“两沐□□，慰□□□”，《西楼帖》涂改难辨，似为“两沐书问，□慰牢落。□”。②“公受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舟中之……”。□，《西楼帖》为“散”（已改）。孔先生所据为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本，“会散舟中之”后缺。然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端方本则是完整的。现用天津本补字后点为：“公受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散舟中之语，想必留意也。余更万万慎重自爱。谨奉手启上问。不宣。轼再拜天觉学士执事。三月十四日。”其缺失皆由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本前后淆乱所致。

8. 与张天觉四首（二）（P2448）

轼启。一向多病，不时奉书，思仰甚矣。比日履兹畏暑，起居佳胜。向蒙示谕“铁牛老鼠”之说，实不晓此谜。但废放之中，病患相仍，默坐观者①，虽无所得，而向之浮念杂好，尽脱落矣。永日杜门，游从登览，举觉无味，此下根钝器，所守如此，不足为达者言也。久望公还②，何故至今，何时复得

把臂一笑。未间，惟万万以时自重③。轼再拜天觉学士阁下。六月五日。

【校勘】①者，《西楼帖》作“省”（已改）。②公，《西楼帖》作“召”。③“自重”后，《西楼帖》还有“不宣”二字。补字后为“惟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9. 与张天觉四首（四）（P2448）

……语想必留意也。余更万万慎重自爱。谨奉手启上问。不宣。轼再拜天觉学士执事。三月十四日。①

【校勘】①此残简当是本文7《与张天觉四首（一）》之一部份。合为：“轼启。羁旅索寞久矣，见公得一散怀抱，为乐难名。行日犹欲上谒，遽闻侵夜解去，既而累日风雨，知仙舟未免留连，甚为耿耿也。两沐书问，□慰牢落。□即日起居何如？公受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散舟中之语，想必留意也。余更万万慎重自爱。谨奉手启上问。不宣。轼再拜天觉学士执事。三月十四日。”

10. 与石幼安二首（一）（P2453）

轼启。前日急足还，领手教，具审起居佳胜，眷爱各佳安，至慰！至慰！轼此与贱累并安。知令子九月末方还，侍下未敢奉书。杭州接人口未到①，□到便行，不出此月末起发，十月上旬必到也。乍此远别，岂胜依恋，新凉，惟若时加爱。舍弟未及奉启，不宣。再拜幼安□兄②。

油两瓶封全，充□不讶轻渎③。八月十一日。

贵眷万福。

洋州令子必安。见报，与可已有替人，莫是别有美命否？贱累并安。轼又上。④

【校勘】①□，《西楼帖》作“犹”（已改）。②“再”字前，《西楼帖》有“轼”字。□，《西楼帖》作“表”。补字后为“轼再拜幼安表兄。”③□，《西楼帖》作“信”。补缺字后，应点为：“油两瓶，封全充信，不讶轻渎。”④《与石幼安二首（一）》，作于熙宁四年八月十一日即将离京赴杭任时。但“贵眷万福”以下，在天津本《西楼帖》虽紧接《与石幼安二首（一）》，然实为另书残件，当作于熙宁十年。理由是：书云：“洋州令子必安。见报，与可已有替人，莫是别有美命否？”据此，苏轼作此书时，文同将离洋州任。据何增鸾、刘泰焰《文同年谱表》，文同“熙宁十年

在洋州任。冬赴京，判登闻鼓院。”证明“贵眷万福”以下作于熙宁十年。

11. 与石幼安二首（二）（P2453）

轼启。向者人还，领手字，具审起居佳安，眷爱各宁谧。轼此与贱累并无恙。凶岁之余，流殍盗贼无虚日，凡百劳心。近颇肃静，吏民稍见信，渐向无事，幸不忧及。杨元素处书信不知收得未？□□及余信物幸早为觅便附去①。先人今次封赠，此已纳钱讫，更不烦干致，惟告说与□院人吏令早附去也②。春向晚，拜见无由，每念契阔，未尝□□□而□也③。惟万万自重，不宣。轼再拜幼安表兄阁下。三月□□日④。

【校勘】①□□，《西楼帖》作“诤黄”。②□，《西楼帖》作“本”。③而□也，《西楼帖》作“而叹也”。④□□，《西楼帖》作“廿四”。

12. 与陈季常四首（一）①（P2459）

一夜寻黄居案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拓，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

轼白季常。廿三日。

【校勘】①孔先生说此帖见于《西楼帖》，恐是误记。据我所知，此帖有墨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刻帖见《三希堂法帖》等，但不见于《西楼帖》。

13. 与陈季常四首（二）（P2459）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于此时来①，如何？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所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②，试令依朴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丈阁下。正月二日。③

【校勘】①于，墨迹为“以”。②所借，墨迹为“欲借”。③据墨迹，此首失录附言：“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

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快悵，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

14. 与陈季常四首（三）①（P2460）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哀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未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皇，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校勘】①据墨迹，此首失录附言：“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

15. 与陈季常四首（四）①（P2460）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校勘】①此首为故宫博物院藏与陈季常书墨迹《人来得书帖》的附言。即本文14与陈季常四首（三）。

16. 与纯父一首（P2461）

轼启。辱教，伏承起居佳胜。示及文字及缙物，物领如数①。忽忽，复而不尽②。轼再拜纯父侍讲足下③。廿五日。

【校勘】①物领，读《西楼帖》，判为“已领”似更恰当一些。②而，《西楼帖》为“白”（已改）。不尽，应为“不一一”。改后，应点为“忽忽复白，不一一。”③父，《西楼帖》为“夫”，故标题应为《与纯夫一首》。

17. 与家退翁三首（一）（P2461）

轼启。数日斗寒，身体佳否①？来日谒告一日，与公略会话，幸访临早食也。不宣。轼再拜退翁朝散年兄。②

【校勘】①身，《西楼帖》作“尊”。②据《西楼帖》，“朝散年兄”后，尚少“廿三日”三字（已改）。

18. 与家退翁三首（二）（P2462）

轼启。昨日先纳送行诗，必达。经宿起居何如，来日定成行否？卑体尚畏风，不果往别。千万顺维自爱①。细簟一领，暑途恐须用。鱼胶四斤②，鹿顶合子一枚，赐墨三丸，纳上。不讶浼渎，不宣。轼再拜退翁朝奉使君兄。十一日。

【校勘】①维，《西楼帖》为“候”（已改）。②斤，在《西楼帖》，此字像“斤”，确认是“片”（已改）。

19. 与家退翁三首（三）（P2462）

轼启。人来，辱手书，具审起居胜常，甚慰想望。轼连岁乞补外，请越得杭，恩出望外。不独少便衰疾，亦遂安蠢拙矣。但去口日远①，归扫坟墓何日，不能无惘惘也。乍热，千万以时保爱，治行，冗中布谢，草略，不宣。轼再拜退翁朝散年兄②。口月十三日③。

手启上退翁朝散家。轼谨封。

【校勘】①口，《西楼帖》作“德”。②据《西楼帖》，“朝散”后尚少“使君”二字。③口月十三日，《西楼帖》为“四月十二日”。

20. 与程正辅三首（一）（P2488）

轼近得子由书报，近有旨，去岁贬逐十五人，永不叙复，恐赦书量移指麾，亦未该也。行止孰非命者？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欲不老于此邦，岂可得哉！私心如此，兄必亮之也。添“蛙”字一韵，亦已添讫。

寄惠松子牛膝梨枣，一一珍佩。岩起茶芍如寻得，亦告，因便示及与邓师也。念五口未暇书①，复信寄去次②。轼再启。

朝云蒙颁赐牙梳，附百拜之恳。③

【校勘】①口，《西楼帖》作“绢”。②复，《西楼帖》作“后”。③此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甸斋本《西楼帖》第五册，为绍圣二年十一月三日与程正辅书《时走湖上帖》之附件一。《时走湖上帖》云：“轼启。别后，因本州使人一次上状并《香积诗》必已达尊览。两辱赐教，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轼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观作新桥。掩骼之事，亦有条理，皆初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之免忧。药钱亦已如请。比来数事，皆蒙赐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

万万自重。不宣。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阁下。十一月三日。”

21. 与程正辅三首（二）①（P2489）

“纵”字韵诗，和得尤奇，诵咏不已。兄尚少《香积》一首，想续示及也。轼又上。

轼诗于“霞”字韵下添入一联云：“岂无轩车驾熟鹿，亦有鼓吹号寒蛙。”更不别写去。

子由一书，告发一口角递②。

【校勘】①此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匋斋本《西楼帖》第五册，为绍圣二年十一月三日与程正辅书《时走湖上帖》的附件二。②口，《西楼帖》为“皮”。

22. 与程正辅三首（三）①（P2489）

十郎计别来安乐。博罗公人回，简帖已领矣。

【校勘】①此帖在《西楼帖》第五册第十三页，紧接第十一、十二页与程正辅书《诵咏帖》，俨然是《诵咏帖》的附件。

23. 与程六郎十郎一首（P2489）

六郎，十郎昆仲：节近，感慕愈深，奈何！奈何！惟千万节衣强饭①，以慰亲意。大郎、三郎有消耗到未？复信附慰疏也②。轼白。

【校勘】①衣，《西楼帖》为“哀”。②复，《西楼帖》为“后”。

24. 与范子丰二首（二）（P2492）

轼启。别来新岁庆侍多暇，日集休福。轼百凡如昨①，然方求郡，累削不允，终当坚请，以息烦言耳。蜀公丈以节下人事略无少暇②，未果上问，乞道下怀。新春，万万以时保练，冗中不谨。轼再拜子丰承事亲家翁执事。正月六日③。

【校勘】①百凡，《西楼帖》为“凡百”。②“蜀公丈以节下人事略无少暇”，应点为“蜀公丈以节下，人事略无少暇”。③六，《西楼帖》为“二”。

25. 与质翁一首①（P2496）

轼启。近人回，奉状必达。比日履兹春候②，岂弟之化，想已信服，吏民坐啸之乐，岂有涯哉！无缘陪接，但深驰仰。尚冀若时保练，少慰区区，不宣。轼再拜质翁朝散使君老兄阁下。正月廿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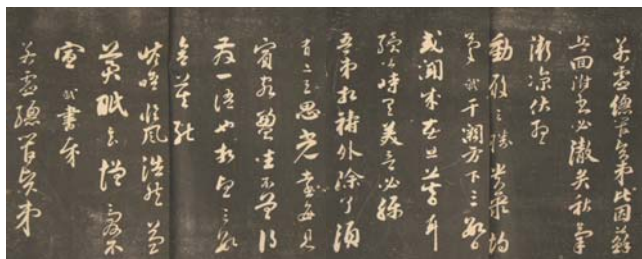
【校勘】①网上见此帖墨迹，谓上海张氏涵庐旧藏，不知现藏何处。②墨迹未见“春候”二字。倒是在“比日履兹”下有“起居佳胜”四字。

26. 与若虚总管一首（P2496）

原文（略）

此件录自《三希堂法帖》，贋品无疑。观苏轼遗墨，虽云变化，然面貌风格，自有其一贯性书风。在现存苏轼遗墨贋品中，此件与苏书面貌风格，毫不沾边，不知当年是如何进入内府的。我以为像这类既非苏轼手迹、文字亦无来历的东西，是不应该收入《苏轼文集》的。

附图：



27. 与枢密一首①（P2501）

轼启。孟冬薄寒，伏惟枢密正议台候万福。轼即日蒙恩，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不足上谢。又不敢辄废此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庙朝，精调寝味。下情祝颂之至。谨奉启起居，不宣。轼顿首再拜枢密正议执事。十月十七日。

【校勘】①与司马君实书。上海图书馆藏宋搨《郁孤台法帖》卷六有手迹，但与此首文字出入较多，宜以《郁孤台法帖》文字为准。兹录如下：“轼顿首再拜。孟冬薄寒，恭惟门下侍郎台候万福。轼即日蒙免，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岂足上谢。又不敢废此小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宗社精调寝兴，下情祝颂之至。谨奉手启，布陈万一，不宣。轼顿首再拜门下侍郎执事。十月十七日。”

注：凡括号注明“已改”者，为编者注，2008年7月北京第7次印刷已改。

（未完待续）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副主编）

再论苏洵族谱理论之宗旨

陈子彬

内容摘要：苏氏族谱理论宗旨，对当今修谱、研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背离苏洵族谱理论，必将走向邪路。

关键词：修谱间隔 30 年一易世 尊祖而谱族知祖宗之所出 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夸于人世

为纪念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诞辰一千周年，《苏轼研究》（2009 年第 1 期）刊笔者《苏洵对族谱学的贡献——恭读苏洵经典之作〈族谱后录〉》。文中概述北宗族谱学的奠基者，阐明了大宗之法、小宗之法，考述了苏氏远祖及苏氏之源，提出了修谱间隔 30 年一易世的原理。时至今日，苏洵公的族谱理论，对我们的修谱、研谱者而言，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当今，在修谱和研谱工作中若是背离苏洵公的族谱理论，必将走上邪路。

“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名门望族，都常常追溯自己是名人之后。从黄帝、颛顼至夏代中国尚无文，苏益的自叙，很难说有确凿根据。但是现在的一切中国人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苏氏之起于黄帝、颛顼，既无可非议，又无须考证。”（管成学、王兴文《苏颂评传》第 11 页）

宋苏洵编修（眉山）《苏氏族谱》四十八卷之卷一，载有汉平陵侯六派三族之图，其中《唐苏氏三大族图》曰：“自并州刺史章、魏都亭侯则之后，许国公长子、三子之裔居蜀、居闽，唐凤阁侍郎留一子居眉，是为三大族，皆宗扶风平陵之苏”。“三族皆远宗平陵侯，近宗并州刺史，原属一本，而分眉与闽、蜀为三族。而并州刺史章及都亭侯则为三族之祖”。此段说得清楚，“三族同源平陵（武功）系，原本一家，追本溯源，不分不弃，和睦相处……”

《苏氏族谱》原为宋苏洵编制。据查，现藏天一阁的苏洵谱，仅存一卷（九叶），并无三族之图。

《苏氏族谱》四十八卷，现存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河北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河北省栾城县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有四十八卷全套复印本，北京大学管成学教授亦复印了全套四十八卷进行研究。《苏氏族谱》四十八卷，实是安徽太平、石埭两邑十排公八修《苏氏族谱》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年）刊刻版本。此谱始创于宋至和乙未（1055 年）^①以苏洵撰写的《苏氏族谱》为基线，宋绍兴七年（丁巳，1137 年），由苏洵次子苏辙之曾孙苏继芳第二次编修，宋嘉泰二年（壬戌，1202 年）三修，元泰定二年（乙丑，1325 年）四修，明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 年）五修，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 年）六修，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 年）七修，清光绪己亥第八次编修。

据称，谱记苏辙曾孙苏继芳携二子入安徽黄山太平县，散居太平、石埭等地，子孙繁衍三十余世。该谱是以眉山为嫡系的一部较完善的版本。

《苏氏族谱》卷一谱序、凡例、宋代名人题字、源流考、总系图及迁徙各地支派，卷二、卷三诰敕、传记，卷四迁祠记、碑记，卷五为本族历修之序跋，卷六人物传、墓志铭，卷七至三十八为世谱，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七为家志，卷四十八历代修谱人名。卷长 4471 页，线装古版竖排本。

《苏氏族谱》卷一第 81 页有关唐苏氏三大族图，有如下文字记载：自并州刺史章、魏都亭侯则之后，唐凤阁侍郎留一子居眉，是为三大族，皆宗扶风平陵之苏，而并州刺史章及都亭侯则为三族之祖。详载新安苏氏世谱进士从政郎汉序之最明。今

仍其旧牒而列其图记，俾得考核有据，不失同宗之义，云尔。

《苏氏族谱》四十八卷之卷一第35页《凡例》中这样记载：建仕汉武帝，封平陵侯，其子孙分为六派：曰赵郡、曰襄阳、曰武邑、曰武疆、曰蓝田、曰河南。迄唐又分为三大族：曰蜀、曰闽、曰眉。汉唐以来均出平陵，眉出并州刺史章，为建八世孙。眉为本宗，则历历可考，系以世次。

谱系自黄帝至昆吾樊编为苏氏族谱总系，自樊至苏子编为苏氏受氏以后谱系，自汉平陵侯建至唐凤阁味道编为苏氏汉支派总系，内附六派三族图。自味道至今编为眉山苏氏总系，自继芳至今编为苏氏南迁谱系一本，遂传嫡支正派，并无丝毫牵合。

苏辙之曾孙苏继芳继其高祖苏洵编撰《苏氏族谱》已是82年之后的事了。第二次编撰距第一次又是65年了；第三次编撰也是有123年后；第四次编撰又是有121年之后了；第五次编撰也是又一个110年了；第六次编撰与前又相距270年；第七次编撰又是时隔有136年。从苏洵老先生于宋至和乙未编撰《苏氏族谱》至清光绪乙亥年八次修撰，历经844年，历时之长，工程之浩繁是史所少见，是家族谱史上绝无仅有的了。苏继芳在《眉山苏氏重修族谱说》一文阐明继承其高祖苏洵老先生修谱的宗旨和遗志：

苏氏自昆吾至味道，始家于眉。自味道之子家于眉，至涇，其间世次俱不可详。而吾高祖洵始为族谱以纪其族属。曰：“苏氏之谱，谱苏氏之族”，“观吾谱者，孝悌之心可油然而生”。又曰：“高祖之上不可详，自吾之后则从吾谱而益广之，可以至于无穷。盖高祖之子孙家授一谱存之而无废，百世之后，凡吾高祖之子孙，出其而存者而合之，而以吾谱考焉，则至于无穷而不可乱也。”此吾高祖为谱之志诚，欲尊祖敬宗，敦伦睦族，俾苏氏子姓胥游于仁壤之天，而引之以勿替，其盛心也。继芳叨祖泽，蒙恩赐，任铜陵邑令。不数载，值世运多艰，欲返蜀而势不能，乃谢职，卜仙源之涇阳岭头冲为潜居之所。然故里迢遥，宗支回隔，每出吾高祖谱书以目，即三复慨叹而不容已于水源本木之思。适叔父等伯兄蕙莞自西江颖上来访，及告别芳，顾相与流涕曰：吾氏为眉山望族，芳不幸寄寓于此，而族属之念未尝一息忘也。且吾高祖尝为五世之图，曰吾高

祖以下，服尚存而情未尽者，仅百余人，苟非有谱牒以联之，则分以居迁而易紊，情以日隔而易疏，将至忧而不吊，喜不庆，何以异于涂人之不相休戚耶。今自吾高祖以后，亦不下百余人，使不继吾高祖为谱之志，则服属虽未尽，而情义莫相洽。矧时遭兵甲，地判西南，祖功宗德固不敢以或忘，而世远人殊，音问弗及，虽兄弟子侄功缌之亲，其初本一人之身，其不于涂人者，几希矣。是可慨也，是可惧也。而谱牒之修，当不容缓也已。高祖之谱既以斲为高祖，而下逮昆弟，与昆弟之子矣，而吾可以不尊高祖以合昆弟乎。于是效五世图法，尊洵公为高祖，自洵公而降，有曾祖与伯曾祖，有祖父与伯叔祖父，有父与伯叔父，感列于上而广吾尊尊之孝也。五世之下，则由吾身推之诸昆弟，及昆弟子，备书之无遗，而达吾亲亲之仁也。是帙既成，众者不涣，涣者可合，凡同吾高祖分迁于江淮闽浙吴会间者，虽林不一，而一开卷则尊尊亲亲之心将皆油然而生，涂人之弊其庶几乎免。与是则吾之继吾高祖为谱之志也。因识之，以俟后世于无穷云。（绍兴七年丁巳十月初六 洵五世孙继芳书）②

继芳公继承了其高祖洵老先生遗志，《谱说》一文高度阐明“苏氏之谱，谱苏氏之族”，“观吾谱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吾高祖为谱之志诚，欲尊祖敬宗，敦伦睦族，俾苏氏子姓胥游于仁壤之天，而引之以勿替，其盛心也。”族谱之作，尊祖也。尊祖而谱族，知祖宗之所出，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夸于人世也。正如宋文彦博《苏氏族谱叙》所言：“盖将后世观之而考世德之纯疵，明统泽之广狭，俾其子孙益思所以自立云尔。”在《眉阳苏氏族谱引》中又指出：“然亲睦之道惟何始？谱法立则伦理明，伦理明则恩意笃，推而致之荡荡平平何有也。不然伦理一味，而亲亲之仁，长长之义或塞，诸侯无世国，士大夫无世家矣，又何望其能治化哉！”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兴盛起来，这个时候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尤其是洵老先生创立苏氏族谱，其作用转移到尊宗睦族的传统上。在我国历代都有“盛世修志”的风气。家族谱经常被反复修撰，而每次修谱时，也就成同姓同族人们之间的一项重大事件。

在封建社会里，村镇同姓同宗人士靠祠堂来团结或支配同族人们，一个或数个地域，就靠宗族谱来联系同姓人士。尤其是到了明代以后家族修谱已经不是单纯的为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了。尤其是明、清以来，家谱的修撰，也是为扩大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一般人家是无力修撰家族谱。历来修撰家族谱必须具备几项重要条件，而这些条件缺一项都不足以完成谱作。首先，由家族长者、名人首倡主持，因可以具有一定号召力；其次，具备相当的经济物资条件；再次，有一定族群、人文环境和文人们参与缮写和梓版印刷。可以说自苏继芳之后的六次修撰《苏氏族谱》，都是他们均具备上述条件。

《苏氏族谱》无论是洵老先生初修，或是继芳公之再修，都无《三山图》的出现。唐分三派，而且进一步的将眉、闽、蜀三个苏姓家族，都定为因出扶风平陵系。如果我们翻开《史记》、《汉书》、《新旧唐书》或《宋史》，自公元前至清代末年近二千年的时光，我们不言改朝换代及天灾人祸。那么《三山图》，这种血缘关系的图谱合理吗？符合社会发展和自然规律吗？谁能圆其说？近日读栾城苏士福先生为我复印《苏氏族谱》卷之五苏氏分派序，文后落款署名为：“登进士从政郎任健康府府学教授闽派丞相五世孙汉谨序”。与颜中其先生主编《新编苏氏大族谱》（以下简称《大族谱》）中同苏汉所做序文相核对，其重要内容有很大差异，如：“诜徐州刺史生震吏部侍郎生奕元和中为光州刺史生益随王潮入闽为温州刺史生光海为漳州刺史遂为泉州同安人……”（见《苏氏族谱》卷五第7~8页）《大族谱》第26页载《苏氏分派原序》是：“诜徐州刺史，赠吏部侍郎，生震，为御史中丞，爵岐国公，五世孙益为隰州刺史，随王潮入闽，遂居焉。……”据《芦山苏氏大宗族谱》（上集）载，诜为第九十九世，其下有震、奕、纠、深、晚，至益为百五世。与苏汉序之两个不同版本相对照，差异太大了。眉山派衍之《族谱》有闽派之孙为之作序，故应对四十八卷《苏氏族谱》进行一次全面研究为好。也许对我们编辑《新编苏氏总族谱》会有教益。苏士福先生在致我信中指出：“两序皆没注明撰写年代，从字面上看‘原序’应早于‘序’，‘序’是对‘原序’的修订，是否如此，需要考证，两‘序’中是否其一次是伪作，也值得分析。”颜

中其先生收入《大谱》中苏汉之‘原序’，查明出处或许可以弄清其真伪。

四位都是这一方面的学者。我想向各位请教，“人”的血缘不是单体传代的，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二人，四位祖父母（包外祖父母，下同），八位曾祖父母，十六位高祖父母。也就是说前十世人数应是1004位，前十五世祖的人数32136位^③，也就是前十五代先人的总和该是多少位？如果以我们汉族人类推算到司马迁《史记》记载“五帝”时那个数字会让人吃惊不已。笔者提出上述数字并非是在谈笑话，而是列出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是说我们在研究和修治家族谱中，牢记遵循洵公老先生的教导和洵公曾孙苏继芳所言才是。那还是不要“摘录攀附为好啊！”^④封建社会这种攀附之风是可以理解的。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不也有攀附名人姓氏之想吗？有一些人士也有“摘录攀附”之想也不足为奇了啊！可是时至今日还存在这种攀附之风，那可就令人无法理解了啊，而且有的是逼迫他人去攀附名门望族就令人更不好理解了啊！

自古有言：“一将成名万骨骷”。尤其是唐五代以来唐五代时的战乱，包括苏姓广大群众为生，奔走于战乱之中，那些死者又有谁记下他的名姓？经两宋、元、明、清的闽南地域动乱频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泉州一带的倭寇之患，包括苏姓在内众多的平民百姓死于倭寇之刀下，有的整个家族被毁，可他们的名姓又有哪部史书记下了呢？我们作修治家族谱者，不应该深思吗？史书上留下光彩大名者我们应推崇，那些没有留下名号者也应备受后人的尊敬才是。

近读福建惠安苏渭滨先生编修《惠安苏氏支谱》中介绍惠安四世祖双溪翁《修谱凡例》载：“族谱，一家信史实志也。务要核实直书，不得冒名臣、近援贵家大族为祖。莫稽其详，则仿苏老泉之法。自所知者祖之……亦不得虚美溢称，以诬先人而诳后代，诚阅其谱，世代著矣，昭穆序矣，名字传矣，而实行录矣，复尚何言……”

惠六世《尚忠公谱序》载：“苏氏之先，由河南光州府固始入闽，传诸长老旧矣！而先世家谱，燹于至正（1341~1368年）者。吾曾大父宁波翁（苏兴）意纂辑焉，第志阻于年迈，未遑也。归化时嘱我祖叔双溪翁，翁始也锐志功名，续也驻兵燹，亦弗之逮也。迄万历元年（1573年）秋，忠服承重，冬趋谢南安母家，有襟兄苏质吾者，下苏人也。谈

论间，言及宗事，忠愚稽其家谱，誉之归，遗双溪叔，叔喜告中曰，是若先志也。吾子达求苏氏谱，于亦兢遂先志也，宁独吾哉！于是，双溪翁始以我太祖高皇帝时先人为始祖而著族谱初稿云。噫！族而系谱，谱承重矣！要之，谱以系亲，代以朝著，非必有名人华胄，以为远祖也；非必攀援世家富豪门，以为光宠也，忠观世人序谱，多援远代豪世夸耀耳目，有以崇韬之拜汾阳者，失其谱也……”

与上述尚忠公大约同一时代的南安霞舒明奉直大夫河南开封府许州知州九十翁阜山苏希栻先生族谱之作，尊祖教宗，知祖宗之所出。阜山先生重视世次，“非特以著世次”，更不“纪官位而夸于世”。阜山自是始有苏氏，故阜山之苏，必须宗入闽始祖大郎公。苏希栻祖孙三代人及其伯叔祖都坚持，阜山自是有苏氏，阜山之苏，只能是入闽之后。世居武荣山之梅山之下，“称阜山苏氏”。在苏希栻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明代闽南地域是名臣辈出又是修治族谱的胜地，阜山先生在修谱中“无摘录无攀附”，那是何等高贵啊！也许在唐五代入闽者先后有数个大郎公。阜山先生认定的是随王潮入闽并且是阜山定居的始祖之大郎公。苏希栻《阜山苏氏族谱》不仅历经五十五个年头，而且有《墓志》为证，这部《族谱》及苏希栻为《族谱》三次作《序》，说明明代中期社会上编制家族谱的事情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而苏希栻《族谱》之作志承洵公老先生的尊祖敬宗之法，堪为当时治谱的典范之作。

论文注释：

① 至和乙未，是宋仁宗至和二年。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二子赴京应试，苏轼、苏辙同中进士，苏洵遂父子名动京师。

② 选录自《新编苏氏大族谱》，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③ 其所测算的数字有待复核。

④ 苏继芳《眉山苏氏本宗族之便览》（刊《新编苏氏大族谱》第26页）。

参考书目：

《苏氏族谱》（48卷版本）、苏渭滨《惠安苏氏支谱》、福建南安《阜山苏氏族谱》（2009年版）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承德

（世界苏氏宗亲总会顾问、《新编苏氏总族谱》常务副主编，原河北承德苏武苏颂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接第39页）

虽然不是御诏圣旨，但较之圣旨还重要，普遍引起各级地方官府的关注。在民间与苏轼平时有所交往的人士，也都有了立即性的反应，知道事态的严重性、问题的复杂性。一时之间虽免不了有更多的牵扯，或许还有更进一步的动作，益为激烈的手段，把法网张得更大，企图网罗到更多的异议分子，以便一网打尽。于是各自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防意外不测，大致是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是按照规定，呈缴所有关于苏轼的一切文件与著作。其次，是检出所藏照章予以彻底销毁，以免受到牵连。另则，是因有所爱好而设法加以私藏，其中以字画居多。

于是，那些出自苏轼笔下，一手挥洒而成，却被珍藏在千家万户之中的文字翰墨，有的为避祸而蒙灾，主人为消灾，所以将字画付之一炬，以免怀璧而获罪。与苏家常有往还的近亲，与苏轼时有省问的好友，多有所警觉，大部分也都采取了迫不得已的安全措施，以免有人再有机可乘，节外生枝，据以作为把柄，用为诬陷罪证。一时无法为苏轼脱罪，但也不能使其添祸，被收缴没入的就让官府拿去交差，没有被发觉，剩下的劫后余存，也都一概付之祝融，避免拿这些文字来加油添醋再作文章。

基于这一理念，采取同样行动，以情理兼顾的方式加以处理的人，料必不在少数，经由这些人毁掉珍贵的资料，无不是稀世罕见的墨宝，不能说不计其数，至少是相当可观。所以说劈头的一记闷棍，“先逮捕，再审讯”造成终生难以遗忘的创痛“百日冤狱”，对苏轼不失为一种外力所加诸于精神上的淬炼、意志方面的考验，并且是舍此无从他求的机缘。这是从正面的观点来看，苏轼自始也是抱着这种理念，一切都以宽容对待。若是以客观第三者的感觉来说，对于苏轼未尝不是一桩令其心力交瘁，受到濒临生死折磨的苦难。倘若是以苏轼个人而论，应该是祸福参半，有坏处也有好处。

倘若是从更深入作一番全盘的通视，就“乌台诗案”而言，同样地，也是各有利弊得失。言其利益，是朝廷为苏轼所有的翰墨文笔做了一次彻底的整理，禁读苏轼诗文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所生弊害，是让大众因畏惧而毁损掉不少可贵难以再得的作品。此事使后世更清楚地认识了苏东坡“眼似初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的情怀与秉性。

（台湾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客座教授）

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

——品三苏中秋沙龙活动掠影

刘寅

“品三苏中秋沙龙”是今年眉山市委确定的57个重点会节活动之一。筹备之际，8月19日，受眉山市委书记、市长李静的委托，眉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十庆召集财政、城管、规建、文化、旅游等部门领导，听取苏学专家的意见，如何更好地在城市建设中注入东坡文化元素。按照会议精神，将主题确定为“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这个主题包含了三层含义：是真才子自风流，千年英雄苏东坡，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眉山这个城市本身，有没有影响力，影响力有多大，具有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缺乏影响力原因何在，这是二；苏东坡与眉山的关系，苏东坡在眉山影响力中的地位，如何把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有机结合，又如何在突出东坡文化核心品牌的同时全面提升眉山影响力，这是三。此主题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9月9日，由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品三苏中秋沙龙——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隆重开幕。各路专家学者们就“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展开了热议。

挖掘苏东坡，要着眼于文化，也要着眼于政治

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指出，“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这个主题很好。眉山建市以来，知名度不高，许多人不知晓、不了解，要提升眉山的影响力，很重要的是靠文化的力量。

东坡文化是个广泛的概念，不仅指诗词文赋，更包括他的美政理想。苏东坡是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官，他身上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学习。前些年我们编了一本书——《苏轼为官之道》，目前看来反

响不错，很多人说很受启发、很受教育，从影响一代官员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研究苏东坡，先要研究他的文化影响力，后要研究政治影响力。

让苏东坡和眉山影响力成为有机的整体

眉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影聪说，了解苏东坡的人很多，但知道眉山的人很少。弘扬东坡文化，提升眉山影响力，是当今眉山人应做的大事。几年前，眉山市委宣传部举行了眉山主题词的征集活动，一开始收集了4000多条主题词，但都没能通过，后又重新组织征集，才有了“东坡老家，快乐眉山”。这个提法一目了然，任何人看到了，都能自然而然地将苏东坡与眉山连在一起。

当然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还要深入挖掘，要从思想、物质、理念上来开拓创造，要让苏东坡与眉山影响力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眉山市委、市政府一贯倡导的事。

把握苏东坡的核心价值观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说，作为眉山人，要懂得苏东坡为何具有如此影响力。苏海汪洋，太丰富，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苏东坡的核心价值观。我用四句话来概括：爱国爱民、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凡有成就的中国文化人，无不受苏东坡的影响。而眉山是苏东坡的出生之地，也是东坡精神的发源之地，可以说苏东坡的影响力就是眉山的影响力。（下转第60页）

醉眼中与月光下的春夜薪水

——重读苏轼《西江月》

颜正源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薪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对这首词的解读，古今之评家几乎都忽略了苏轼此时处于“酒醉”（即酣适）状态。所以，他们的评注皆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苏轼对春夜薪水景物的观察与欣赏是处于醉眼与月光这双重条件的限制中。“照野弥弥浅浪”从表面上看明明是自相矛盾的（这里排除了薪水泛滥成灾，淹没了两岸原野。因为绿杨桥还能通行，而且苏轼竟然斗胆于桥上“解鞍欹枕”，直至“春晓”，安然无惊也。此是内证）。“野”应指原野。“浅浪”指水。如果不是薪水泛滥，平坦、宽阔的原野上哪里来“弥弥浅浪”呢？这非自相矛盾吗？非也。我们必须注意醉眼与月光这两个条件的限制。“照野”一词是动宾而非修饰，不是说有个地名叫照野，而是说（月光）照洒在原野。苏轼省去了主语月光，此乃词之格律所限也，也是古文辞语法之特点也。“照野”之自然现象有个特点，月光是银白色的，如同白水一样，特别是洒落在平坦而宽阔的原野上，更是如此。有苏轼诗文为证。如《记承天寺夜游》云：“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又如《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云：“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两篇诗文皆将月光喻指水，一为静止之积水，

一为动态之流水。其后者“流水”之感受也是处在酒醉酣适状态下，这与“照野弥弥浅浪”如出一辙。既是比喻，更是醉眼朦胧中的“错觉”行动之结果。

“弥弥”形容水流的样子。水在流动，当然也有“浅浪”翻动。原来这是比喻原野上的“芳草”。春天之芳草，不比夏季之芳草，长得不高不茂，却低矮浅短。芳草长在原野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在春夜微风的吹拂下，如同水面上的浅浅之浪花，一排一排，一阵一阵，向前翻动。

“横空隐隐层霄”，此句化用陶渊明诗句“宇暧微霄”。“横空”即“宇”，此处指夜空。“隐隐”指暗昧朦胧的样子。“微霄”指层云。这也是苏轼醉眼所见，视角由下而上，夜空显得很低，横在地平线上，些微的云气朦胧不清。杜甫《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此两句皆是诗人之错觉。原野平坦辽阔，似乎觉得星儿垂落下来，离地面颇近。苏轼也是醉眼之错觉：身处平坦宽广的原野上，觉得夜空就横放在不远的地平线上，云气也显得暗淡朦胧。这句诗是对陶渊明的继承也是超越。有苏轼由醉眼所见之错觉感受。

“障泥未解玉骢骄”。“玉骢骄”，乃王公贵族甚至天子所乘之骑。杜甫《丹青引》云：“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先帝指唐玄宗李隆基，玉花骢是一种毛色青白的骏马，如同青白之美玉，故名“玉花骢”也。杜甫又喻为“真龙”，乃指玉花骢身高八尺，所以称为“御马”。苏轼在黄州乃一待罪之臣，何来宋神宗赵顼将御马赐予一罪臣。此非天方夜谭乎？原来此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错觉，是苏轼醉眼出御马。月光披覆于马身，马毛也呈现银白色。苏轼醉眼看花了，错认凡马为御马。“障泥”指马鞍。马鞍没有解下，苏轼就扑

向原野芳草了，可见心情迫切、醉意浓重。

“我欲醉眠芳草”，在苏轼的醉眼里，夜空是屋，原野是床，芳草乃软软的香香的床褥也。“欲”字指希望，并非指存在。苏轼并未“醉眠芳草”，他可能不忍卧破芳草之美，仅仅是坐在芳草边上，继续欣赏春夜景物。这时，他的醉眼注意到薪水了。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在苏轼醉眼中，“一溪明月”即满溪都是明月。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站在什么方位，看到的到处皆是一轮又一轮的明月。这正如俗话：你走，月亮也走；你停，月亮也停。这当然也是苏轼醉眼之错觉，才会将一轮明月的倒影错认为满溪皆是明月。太可爱了，太美妙了。他竟然忍不住对旁人说：请你们不要踏破美玉般的明月。其实身旁无人，而是一匹马。醉眼中，他大概将马错认为人了。

此刻他才想睡眠了，“解鞍欹枕绿杨桥”，解下马鞍，当一枕头，躺在石桥上。一看这石桥也太小了，一株绿杨的树阴就遮满了它。醉意朦胧，睡意浓重，突然一声杜宇（即杜鹃鸟、子规鸟）的叫声，唤醒了苏轼：原来天色破晓了。“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这是什么地方？不是尘世吗？该不是神仙住的世外桃源吧？这种错觉，真是错得太美了。

此刻他突然灵感乍现，诗兴勃发，仿佛置身于酒家，拿出笔，即满壁挥洒，填词曰《西江月》。写毕，才清醒过来，此乃桥柱也。将错就错，也算献给大自然的一首诗吧。

“尘世”何在？黄州也。此乃软禁乌台诗案之受害者苏轼的流放之地。在这样的尘世，人是失却自由的。但身体可以拘禁，心灵却难以囚禁。苏轼在春夜薪水的特定时空环境中，将自己的醉思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才是摆脱尘世一切束缚的自由天地，所以他这一个夜晚，仿佛真的亲临世外桃源。但终究是黄粱一梦，天亮了，月光没了，人也清醒了，又回到了不愿回去的尘世。自然与艺术造就的世外桃源却保留了下来，将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理事）

（上接第 58 页）

眉山品牌就是苏东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邱俊鹏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争取苏东坡这个品牌，凡是有苏轼遗址遗迹的地方，都非

常乐意开苏轼研讨会，这也说明了苏东坡的影响力之大。自眉山提出东坡精神之后，像黄冈等地也在提东坡精神，但我曾多次明确表示东坡精神是眉山首先提出的，如今东坡精神已在苏东坡所有的遗址遗迹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唐宋八大家，四川和江西各三人，而四川的三人全在眉山，我认为这绝不单靠他们的个人天才，更和眉山这座诗书城的文化氛围有关。今日的眉山要抓教育、抓文化，不单是个经济大市，更要是个文化大市，如此眉山和苏东坡便能画上等号。

提升影响力还需多努力

眉山市社联副主席、党组书记马湘君说：“影响力即是指用一种别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要让别人接受东坡文化，通过东坡文化来认识眉山，首先我们自己要接受东坡文化。眉山车城中学副校长杨志强认为，东坡文化应该成为生活在眉山普通民众的文化自觉。要增强眉山影响力，提升眉山软实力，就要着眼于提升这种文化自觉性。眉山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莉茹则主要关注城市建设的问题。她谈到我们对东坡文化的挖掘、打造、宣传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她说，莎士比亚故里斯特拉特福的市长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名人可以养活一座城市。在斯特拉特福，唯一的产业就是经营莎士比亚，这座 6 万人口的小城，每年能够吸引 600 万人来此旅游。在莫扎特的故里萨尔茨堡，有人计算若以商业价值来估量莫扎特，至少是 300 亿欧元。苏东坡是法国《世界报》评选出的世界十二位“千年英雄”之一，他的伟大绝不亚于莎士比亚和莫扎特，而眉山作为东坡故里，也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下一个斯特拉特福或萨尔茨堡。宋明刚提出应有一种紧迫感。目前凡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都在打东坡牌，如徐州、黄冈、儋州、常州、宜兴等苏轼遗址遗迹地。而苏东坡是眉山人，每每题款都署名“眉山苏轼”，这是眉山的优势所在。宜兴某位校长曾讲，我们宜兴只有一把东坡提梁壶，但你们眉山则是苏东坡的出生之地。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种意识，明确自身优势，才能将东坡牌“打好”。

眉山是苏东坡的出生之地，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这与生俱来的绝对优势，便能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打出一张最响亮的“东坡牌”。

（《眉山日报》记者）

郭福彬、郭文英编著

《苏轼故事选》序

蔡心华

故事不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影子。

《苏轼故事选》，虽然不完全是苏轼生活的真实历史，但却是苏轼一生的历史影子。

故事是文学的一个种类，是散布在民间的传说。

苏轼为官十六地，主政八个州，足迹踏遍了北宋大半个中国，他的政绩人声，以及传奇经历，无一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东坡故事传播千年，很少有人全部收集。二〇〇一年，四川眉山的王晋川先生收集编撰出版了《苏东坡故事》，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很多故事还未编入文集。河北定州市的郭福彬等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除自己编写外，还收集了全国十七位作家撰写的东坡故事并汇编成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是传播东坡文化的有效途径

在我们的记忆中，或多或少存留着长辈、先生们讲述的故事，有的故事让你一辈子不会忘怀，有的甚至影响你整个人生。这就是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对生活实际的反作用，东坡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对我们的行为思想，对年轻人的成长，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东坡故事是传播东坡文化的有效途径。

二、是东坡文化产业创意的最好体现

东坡是世界名人，在全球影响千年，是世界千年英雄，影响就是市场，影响就是生产力。因此，

围绕东坡文化的产业应运而生，而产业要靠产品支撑，而能赢得大众喜爱的产品需要很好的创意，创意从哪里来，从故事中来，而东坡故事，既是文学的又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东坡文化产业创意的最好体现。

三、是苏轼研究资料的窗口

无论你是苏轼的粉丝，还是学者、专家，都会常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停涉，常常为查一个历史史实而苦苦思考，却不得其解。这时，你可以从历史的故纸堆中走出来，翻一翻故事集，你会大有启发，同时，你再将东坡故事带回历史，去逻辑、理性地组合，还会联想到东坡在北宋时的生活。也许，你的课题便有了解了，因而，当你的课题无解时，不妨打开东坡故事的窗口，呼吸一下神话的、民间的新鲜空气。

研究苏轼，是专家、学者的事；传播东坡文化，是作家、艺术家们的事。其实，也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需要传播；作家、艺术家们也必然从专家、学者研究的成果中获取营养，成就艺术作品，也难免孕育出民间文学的花朵，成为老百姓口中的传说。

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春节

（眉山市文广新局调研员、文联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原秘书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院长）

孟昭全编著《苏学发展学初探》序言

蔡心华

二〇〇八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我认识了该会副秘书长孟昭全先生，他是徐州铜山供电公司的退休工程师，带着对苏东坡执着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苏学”的研究中，出版了《苏轼与利国》一书，现又编著出了《苏学发展学初探》。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在《答汪尚书》中，就有“苏学邪正之辨”及“语及苏学”等，之后，历代专家学者都围绕“苏学”展开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还没有人语及“苏学发展学”。孟昭全老先生是正式提出“苏学发展学”概念的先行者，并进行了研究初探。

记得在“中国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上，苏醒提出了“苏学文化研究”的概念，并从广义和狭义上进行了区分。而孟昭全先生这里的“苏学”，显然是狭义上的，专指“苏轼”的苏学。既不是南宋朱熹所言的“三苏”苏学，也不是苏醒言及的广义的“苏学文化研究”的苏学。

孟昭全老先生在《苏学发展学初探》中的苏学是指研究苏轼文化的科学，“苏学发展学则是指导苏学研究更快更好发展的科学”。

“苏学发展学把苏学分为理论苏学和应用苏学两大范畴。前者，重点研究苏轼和苏学的定位，以及研究苏学的原理与科学体系，旨在构建科学而完整的苏学；后者，重点研究苏学如何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现实服务，为苏学构建雄厚的社会基础。两者相互关联，不可截然分开”。

显然，孟昭全先生的“苏学发展学”就是苏学科学学，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因而，孟昭全先生结合江苏徐州的苏轼文化研究和苏轼文化运用实践，从而编著出了《苏学发展学初探》。看起来好像是一部资料汇编，其实，细细品读，慢慢疏理，

便会领悟出什么是“苏学发展学”。

孟昭全老先生提出的“苏学发展学”是建立在钱学森大师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问题》基础上的，或者说“苏学发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在苏学中的运用。

虽然孟昭全先生在编著此书时，没有从苏学的科学体系上多着墨，但却提出了苏学如何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构建雄厚的社会基础的战略构想。这就是他所言及的苏学发展学的精髓“三化”，即政治化、社会化、群众化。

“三化”的提出，是全方位弘扬苏轼文化的伟大创举，也是经典的理论概括。这为我们无论是官方的研究机构，还是民间的研究团体，指出了发展方向。今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使“三化”落到实处，这也是“苏学发展学”的具体内容和任务要求。

当然，政治化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基本解决，民本思想从上至下都在贯穿始终。接下来的就是如何使之社会化、群众化。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易办又难办的问题。

说他易办，是说只要大家努力，全力弘扬和宣传东坡文化，就能普及，使之社会化、群众化。

说他难办，是因为这是一件办不完的事情，这需要代代相传。

所以，《苏学发展学初探》就很有意义，他会让我们的子孙、世代相传，一代一代地去研究，一代一代地去传播、去弘扬。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春

（眉山市文广新局调研员、文联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原秘书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院长）

情系东坡

——苏灿学习研究东坡文化记事

宋明刚

苏灿与苏轼同姓，但他们是否有宗族关系，我无从考证，但按中国人通常的传统观念：当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一听到对方与自己同姓就会立即用“家门”回应。

苏灿的阅历丰富，当过兵、搞过新闻宣传、做过组织人事工作，还主持过一个区（县）的全面工作，也许在他的意识里，从来没有想到三苏故里为官的任何迹象。说来也奇，他从省委组织部下派任职，首先就到乐山市沙湾担任区委书记，沙湾地处大渡河畔，是郭沫若的故乡。苏灿是学者型的官员，他不但自己重视理论与文化修养，同时很重视一个地方文化品牌的研究与塑造。

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乐山一分为二，成立眉山地区，苏灿奉命来到三苏故里，担任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眉山文化底蕴丰厚，唐宋八大家眉山占三家，有“千载诗书城”的美誉。苏灿虽然小学时就能背诵苏轼写庐山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都是苏轼的千古绝唱，能背诵的人太多了。但苏灿自己认为，他对苏轼的全面认识与了解还是来到眉山之后。

几年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后，他担任了眉山市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工作。这以后他就把研究、弘扬东坡文化纳入了重要的工作议程。他要求三苏祠，要成为全国三苏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文物收集陈列中心，他每两个月要检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积极推动成立

东坡书画院，为弘扬东坡文化奠定了基础。随后苏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苏轼研究和大型活动，把苏轼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和新的领域，受到苏学界的高度称赞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创办《苏轼研究》杂志

早在1980年9月，中国研究苏轼的一批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在眉山三苏祠，全国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杨明照先生出任首任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址：设在四川大学唐宋文学研究室。

20多年后，这批专家相继退休，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没有人干学会的具体事务。他们经过认真思考，2005年，经中共眉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议定，省社科联同意，会址由四川大学迁来三苏故里眉山。会址就设在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烈任会长，经中共眉山市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苏灿任常务副会长。显然学会的具体工作由眉山负责。

近30年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联系海内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在苏轼遗址地城市先后召开了17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学术会均由当地党委政府、苏轼研究学会联合主办），出版论文集20余卷，在全国形成了以苏轼研究最为活跃广泛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学会。

2005年1月28日，在纪念苏轼诞辰968周年之日，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披风榭前举行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迁眉挂牌仪式。

当时的中共眉山市委书记余斌、市长崔保华、政协主席严文清、市委副书记苏灿等，原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苏学专家邱俊鹏，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苏学专家曾枣庄，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大学教授、苏学专家张志烈，市级有关部门的领导，苏学研究人员 40 多人参加了挂牌仪式。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迁眉后，苏灿同志迅速组织市委宣传部、三苏祠有关领导开会研究，提出创办《苏轼研究》，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刊。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担任主编，苏灿担任执行主编。20 位全国各地知名苏学专家和本地学者成为该刊编委。

苏灿提出了《苏轼研究》的办刊宗旨：“会聚苏学专家，交流研究成果，追寻东坡遗韵，展现三苏风采。”他要求刊物要体现三性：“即学术性、理论性、权威性。”以刊发专家学者的苏学研究文章为主。设置栏目：苏学研究、苏学专家、书评、景苏札记、三苏遗韵、研究史话、苏氏宗族、动态等，根据需要增减栏目。学刊定为季刊，一年出四期，大 16 开，5 个印张，80 个页码，一期文字约 12 万字。

苏灿还亲自到省新闻出版局跑刊号，向市委、市政府报告，落实办刊经费等。

苏灿要求创刊号研究文章要体现苏学研究的广泛性和导向性，知名苏学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创刊号选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出刊后受到苏学界的广泛好评。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学会迁眉如此短的时间里，办出这么好的一个刊物，真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苏轼研究》填补 20 多年学会工作的一项空白。著名苏学专家、四川大学曾枣庄教授说：“这本刊物是拿得出手的！”

《苏轼研究》创刊取得初步成果。刊物从无到有，从草创到较为成熟，赢得了全国苏学专家的普遍赞誉，至今已经出版 26 期，已经成为凝聚苏学专家，开展苏学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

苏灿还加强学会工作，建立与苏学专家的密切联系：

一是学会领导成员进行了充实调整。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出任会长。苏灿任常务副会长。邱俊鹏（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四川大学教授）、

王水照（复旦大学教授）、刘乃昌（山东大学教授）任名誉会长。增选的副會長有：宋明刚（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周成仕（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希龙（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徐州市政府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涂普生（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原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祝云（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二是加强与苏学专家联系。学会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发放了新的会员证。每期《苏轼研究》免费赠送苏学专家，苏轼遗址遗迹地党委政府相关人员、苏学爱好者、博物馆纪念馆，大专院校苏轼研究学者等 800 多本，其中包括港台国外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苏轼研究学者 20 多人。

二、开展“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活动

按照市委的要求，2007 年 5 月 13 日由苏灿组织、带队开始“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活动，此时苏灿是眉山市政协主席。

出发前考察组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苏灿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制定了详细的考察方案，苏灿将考察组分为摄影组、电视摄制组、资料收集组、后勤组、并制定了各组的工作细则，他召集考察组全体成员，进行动员，首先是要求大家做好硬件准备：诸如摄像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要求出发前要读《苏东坡传》等几本书，从思想上、知识上、设备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苏灿要求每个成员，通过网上以及有关资料，出发前对我们所到之处，苏轼遗址遗迹地的经济、文化、地理状况都要心中有数；苏灿还要求每个组进行一次“预演”，摄制编辑的电视片要播放大家看，交流评说，提高工作质量。

“东坡足迹万里行”重点考察了苏东坡当年为官的 16 个城市，历时一个半月，考察团横跨 10 个省，包括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广东、海南、湖北，考察了苏东坡当年为官或经过的 16 个城市，包括凤翔、开封、定州、蓬莱（登州）、诸城（密州）、徐州、阜阳（颍州）、扬州、常州、湖州、杭州、惠州、儋州、黄冈（黄州）、镇江、宜兴，行程达到 1 万余公里。

全团同志没有休息一个星期天，每到一地，立即投入紧张的参观、考察、拍摄、采访工作。摄影的同志有时凌晨4点就起床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住地，又投入紧张的文字撰写和图片处理以及发稿，常常忙到深夜12点才休息，赢得了沿途政协领导的高度赞赏，他们说：“我们还没有接待过像你们这样认真、敬业的考察团。”

在考察中，苏灿与大家同行，与大家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一次，我们早晨乘坐公共汽车从河北定州出发，晚上到达山东登州，在高速公路上走了11个小时。苏灿的以身作则鼓舞着疲倦的考察队员们。

这次考察活动赢得了沿途领导、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他们说：“眉山市委、市政府这一举措是大手笔，将在苏学研究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这是三苏故里对外的一次“文化之旅”。考察团所到之处，听取了50多位政协领导介绍当地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50多位苏学专家研究东坡文化的最新成果，收集了一大批东坡文化研究的音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包括专著、论文、录音；实地考察了苏东坡当年留存下来的遗址、遗迹、遗物100多处（件），参观了东坡纪念馆、历史博物馆16处，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和50多个小时、3万多个分镜头的电视画面，采访了40多位苏学专家、100多位当地市民，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眉山新建“三苏纪念馆”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这次考察有效提高了眉山知名度，也是一次“外宣之旅”。考察团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宣传眉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交流政协工作经验，赠送各种宣传资料，使各地增强了对眉山的了解。这次考察，还得到了新华网眉山频道的大力支持，他们派出强有力的记者参加考察，并全程采访，先后发出了50多条新闻、通讯以及100多张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网民的极大关注，点击超过2万多人次，反响很大。这次考察活动，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不少媒体的极大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全国政协报和四川政协报，以及沿途城市徐州、常州、儋州、惠州、黄冈、凤翔、开封、定州、诸城等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新闻报道、电视采访，国内许多网站纷纷转载，对宣传眉山，提高眉山知名度，扩大我市影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坡足迹万里行圆满结束。但苏灿并没有像通常的考察活动那样，提交一份考察报告了事，而是组织、领导出了一大批成果：

编辑出版了《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大型画册。他亲自担任主编，撰写绪论，审阅文稿和图片，并联系出版社。全书图文并茂地反映了苏东坡所到之处的业绩、遗址、遗迹、遗物、遗墨，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份高质量的反映东坡文化的精神食粮。该书以图片为主，全书分16章，从苏东坡在眉山少年时代写起，先后展现了他名震京师、初仕凤翔、杭州通判、密州望月、徐州抗洪、湖州惊变、黄州东坡、阳羨买田、登州五日、再莅杭州、颍州求是、扬润留迹、定州戍边、贬谪惠州、儋州岁月、终老常州的全过程，全书铜版纸印刷，图文并茂，真实地反正了苏东坡从政的一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在苏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人们称为是一本填补研究苏轼空白的好书。

在《眉山日报》推出《千秋功业，万世丰碑》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苏轼离开眉山很早，他的主要功业在外省，眉山人除了研究苏轼的少数人外，老百姓知道得并不多，苏灿考虑到这一点，他请来眉山市政协原教文委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宋明刚同志撰写文稿，推出了《千秋功业，万世丰碑》长达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在《眉山日报》连载，重点介绍苏轼在外地从政、文学艺术创作成就以及他的人格魅力，这是第一次在报上全面介绍苏轼业绩的作品，在眉山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当地百姓了解苏轼、弘扬东坡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少机关干部争相传阅，并作为资料保存。徐州市创办的《放鹤亭》杂志听说后，也在刊物上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受到读者好评。

制作播发“东坡足迹万里行”电视专题系列片。眉山电视台的几名摄影记者按照苏主席的要求，精心撰写脚本，根据考察期间拍摄的大量电视镜头，连续奋战，加班加点，在较短的时间内，编辑制作了一部15集大型历史文化系列片《东坡足迹行》（每集15分钟）全面系统地展示苏东坡一生的辉煌业绩和坎坷经历，在眉山电视台播放，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

开展了“领地杯”东坡文化知识百题竞赛活动。按照苏主席的要求，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同志牵头，市政协教文委、团市委、市教育局和新华网眉山频道等单位参加，组织专家学者出了100道苏

学文化知识的题目，在《眉山日报》发表，引来万余名学生、机关干部和群众的参与，大家争相答题，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这次活动有效地普及了东坡文化知识，让全社会都来参与学习弘扬东坡文化。

在市委中心组作报告。按照中共眉山市委的要求，苏灿同志在结束了东坡足迹万里行以后，精心准备文稿，满腔热情地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向大家作了一场东坡足迹万里行的考察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轼从政、为官 40 年的政绩，介绍了各地党政发掘东坡文化的经验，并提出了进一步弘扬东坡文化的建议，引起较大反响。

考察结束后，他还和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文史委主任林凤鸣等同志一起，编辑出版了《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日志》详细地记载了考察组每天的活动，为这次活动留下了一本难能可贵的文史资料。

这次大规模的东坡文化考察活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在眉山历史上，在苏轼遗迹遗址地都是前所未有的，苏灿为眉山、为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此同时也为眉山培养锻炼了一批热爱苏轼、了解苏轼、研究苏轼的中青年人才。

三、开展纪念学会成立 30 周年活动

2010 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苏灿在两年前就着手思考，研究策划制定有关方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时间大体与改革开放同步。这 30 年，无论是苏轼研究成果还是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苏灿抓住这一契机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起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总结报告》，回顾总结了学会成立 30 周年所取得的成就、经验。二是召开了“苏东坡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这个题目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苏轼研究的开创性。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共有 70 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江苏、海南、湖北、河南、河北、安徽、湖南、四川等九个省市，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党政机关干部和文博工作者。苏灿认真阅读了这次收到的 45 篇论文，涉及到苏轼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和养生等各个方面，苏灿概括为：一是苏轼文学艺术创作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二是苏轼从政为官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三是苏轼军事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四是苏轼养生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五是苏轼创新理念的形成原因探讨

等。他还对每篇写出了精短的评介，形成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论文观点综述，受到与会者称赞。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走过了 30 年的历史，苏灿总结学会 30 年来在开展苏轼研究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对研究会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第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己任，组织广大专业和业余的苏轼研究者、爱好者，开展对苏轼的文化研究、典籍整理、合作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贡献一份力量。第二，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注重把研究方向从“文学苏轼”向“政治苏轼”作适当的转移。苏轼为官 40 年，从人生的经历来看，证明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多闪光的治国理念和为人称道的为官业绩，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总结。第三，进一步完善研究机制。苏轼研究学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总结 30 年来的基本经验：就是学会主导、专家参与、党政支持。所谓学会主导，就是由学会牵头，确定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内容，召开的时间、地点、人员等，并组织会员积极撰写论文。专家参与，是指国内外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积极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党政支持，是指苏轼遗址遗迹地的党委政府，通过行政的力量，出钱出人出力，提供优质服务，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第四，进一步加强同会员的联系和对市级研究学会的指导。目前学会的会员从当初的 56 人，发展到了现在的 268 人，分布在十几个省市自治区。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同会员的联系，定期给他们寄送研究会会刊《苏轼研究》杂志，了解他们的研究选题和进展情况，积极帮助他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条件。其次要加强同已经建立了研究学会的市县学会的联系，互通信息，成果共享，信息共用。第五，进一步办好“苏轼研究”刊物。苏轼研究杂志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学术刊物，也是广大会员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阵地。要进一步把这个刊物办好，充分体现刊物的特色，努力做到“三性”，即学术性、理论性和权威性。

按照纪念活动规划，出版了《三十年回顾》。该书收录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年来学会发展状况，历届会长及会员简介，举办的全国十六

届学术研讨会研讨的基本概况、研讨会综述，部分苏学专家介绍，苏学论著概览等，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与苏轼研究的史书。

四、研究苏轼为官之道

苏灿结束了在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工作生涯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与组织人事打交道，这对苏灿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组织人事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改革探索与经验总结，这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超前思维和写作能力，苏灿迅速转变角色，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未知的领域。

在三苏文化研究，特别是弘扬东坡文化方面，苏灿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出了许多成果。他不仅仅满足于组织领导工作，而且自己动脑动笔，撰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稿。

苏灿在研究苏轼时，发现苏轼从政艰难，饱经风霜，密州吃野菜、徐州抗洪水、湖州遭“诗案”，贬谪黄州，躬耕生活，也不改他为民的理念……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他都乐观豁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这勾起了他的许多联想，他曾经从事过组织人事领导工作、组织人事研究工作，他着手思考研究千年前苏轼的为官之道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他担任中共眉山市委副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梁守勋来眉山检查工作，问及苏灿最近在研究什么呢，苏灿说，我在思考研究“苏轼的为官之道”。梁书记说：“好啊，你打个报告来，我们支持你。”于是，“苏轼为官之道”就正式被省社科联立项为2006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并且得到了省社科联的部分经费支持。

不久，因市里换届，苏灿同志由市委副书记转到市政协担任主席，他就把这个课题带到新的岗位。并邀请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科工园纪委书记、硕士研究生李昌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胡先酉等加入，正式成立了编著小组。他们多次召开研讨会，听取意见，提出了《苏轼为官之道》的研究大纲和全书的框架，包括绪论，理念篇，政事篇，附录篇，并进行了分工，苏灿亲自撰写绪论和苏轼的廉政理念。

理念篇分为：民本、改革、经济、教育、军事、廉政、哲学等七篇；政事篇分为：经济、社会事业、军事事业、文学艺术等四篇。

进入“苏轼为官之道”的研究和撰写研究文稿，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为了把这个课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得深入一点，苏灿还组织编写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研究和实地考察工作，写出初稿后又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对书稿从头至尾进行了统稿和审稿，从章节的制定到文章的语法修辞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花了一段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课题，然后他又联系出版社，筹集出版经费，还请有关领导同志题词，紧张工作了几个月，终于告一段落。从着手研究“苏轼为官之道”到成书出版历时三年之久。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看到书稿后十分高兴，欣然命笔：“天涯倦客雪泥鸿爪留胜迹，千古风流世间圣贤拜先生。”他用苏轼诗词中的语言来赞美东坡和研究东坡的后人。

《苏轼为官之道》共26万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苏学专家曾枣庄为该书作序，他认为该书：“很有学术价值，一是具有创新性。他开拓了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苏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二是具有系统性。本书全面、系统地从理论上对苏轼的为官理念、为官实践进行了梳理，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苏轼的为官理念提供了一份比较系统的资料。三是具有实践性。本书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了苏轼为官的基本理念，而且紧密结合苏轼为官的实践、现有资料，系统地展现了苏轼为官的千秋功业，使我们既看到了苏轼为官的‘知’，又看到了苏轼为官的‘行’。”

《苏轼为官之道》一书出版后，受到了苏学界和眉山市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第一次印刷了3000册，很快就脱销，接着又印了5000册，眉山市纪委将该书作为廉政教材发给全市科级以上干部学习。后来这本书还获得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五、揭示“东坡精神”

苏灿还对“东坡精神”进行了认真研究。

千百年来东坡精神不朽，东坡文化为国内外所关注。法国《世界报》曾推出1001年至2000年世

界“千年英雄”，苏轼是中国唯一的入选者，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西方人眼里的苏东坡”。苏轼靠什么影响如此深远，千年不衰。苏灿根据市委要求，成立一个小组，专题研究“东坡精神”。怎么简明扼要表述东坡精神呢？研究小组采取集思广益的办法，分别在《眉山日报》、互联网上刊登启示，征集对“东坡精神”的表述意见，结果收到几千条。最后筛选到 20 条、10 条，但还是不尽如人意。又组织召开研讨会，表述各有千秋。由于各自对苏轼的研究或者认识理解的不同，其表述并不如意。最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苏灿集中大家的智慧把东坡精神概括为 4 句话 16 个字：“勇于创新、关注民生、和谐相处、自强不息”。他对这 4 句话逐一进行了解释。“勇于创新”，主要表现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开创一代豪放派词风，文人画派创始人，写庐山，写西湖独树一帜。“关注民生”，主要体现在苏轼长达 40 年的从政理念与实践的全过程，他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无论在位还是遭贬，他都在关注老百姓的生计，做一些力所能及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和谐相处”，是指苏轼在一生中，他与人相处始终坚持和为贵的理念，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乡间，与君臣、亲人和朋友相处，他始终坚持和谐待人，即便工作认识上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影响其交往。例如，王安石在朝，他对王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但是当他引退后，苏轼还去拜访他，相谈甚欢。“自强不息”，苏轼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有当世之志，孜孜追求，不懈奋斗。他在人生道路上流放蛮荒之地，历尽艰辛，坐牢、贬谪 10 多年，但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在概括东坡精神的基础上，由市政协文史委写出了一篇研究报告，详细阐述了东坡精神的由来及其内涵，刊发在《苏轼研究》，引起较大反响，得到了苏学界的认可。

苏灿还撰写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东坡文化现象的回顾与思考》的长篇文章，回顾、总结了 30 年来苏轼研究的成果、影响、思考、现实的许多问题，被《四川政协报》全文刊发，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苏灿在该文中，首先回顾了苏轼的魅力。一是在文学艺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二是在政治道路上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精神；三是在人际关系上（君臣、同僚、臣民、父子、兄弟、夫妻）和谐相处的精神；四是在人生道路上自强不息的精神。

苏轼为何千年不衰，苏轼的这一文化现象，使苏灿受到很大的启示。他认为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精神文化也要随之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认为要善于组织力量，大力发掘本地区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名人文化资源，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把他们的一些有益的思想发掘和提炼出来，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要求，吸取合理的思想内核，特别是那些历经千年不衰的文化（诸如苏东坡），这是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精神力量。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使之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协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三月，和煦的阳光洒在三苏祠里，古老的建筑掩映在绿林丛中，这里总是散发出园林的幽香和文化的气息。苏灿带着 3 岁的孙子走进了三苏祠飨殿，这里供奉着三苏塑像，幼小的孩子好奇的仰望着他们，苏灿说：你要去美国了，走之前你得拜拜三苏，吸收一点文化灵气。爷爷话音刚落，小孙子马上就跪在蒲团上，逐一跪拜，那乖巧与天真的动作，让苏灿也为之动容。

苏灿在眉山，在组织领导研究苏轼、弘扬东坡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对于提高眉山知名度，进一步深入研究三苏、弘扬东坡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必将载入史册。

2011 年 10 月 16 日于眉山

（眉山市委宣传部调研员、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苏灿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中留影）

苏味道研究概述

苏士福

苏味道，河北栾城人，唐初“文章四友”之一，武则天时任宰相，眉山苏氏之始祖。

对于苏味道其人，过去很少有人关注，随着研究苏东坡热的掀起，人们才注意到，苏味道是眉山“三苏”的始祖，苏东坡的祖籍地是河北省栾城县。随之对苏味道研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2000年中国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河北栾城召开，拉开了研究苏东坡与苏味道关系的序幕，进而对苏味道有了进一步的探讨。

要研究苏味道与苏东坡的关系，首先要有历史资料，可是当时栾城掌握到的苏味道资料很少，除《栾城县志》依据新旧唐书《苏味道列传》编写的数百字的《苏味道》外，别无他记。为此，栾城县政府派出了6个考察团奔赴14个省46个市县进行了历时百余天的万里考察，取得了大量的有关苏东坡的资料，编撰了苏味道与三苏研究丛书四部：《苏味道、三苏与栾城》、《苏味道、李峤年谱》、《苏味道与三苏足迹考察万里行》、《苏味道诗译注》；史志办研究员张斌亦编写了《苏味道年谱》，但涉及到苏味道的史料仍然不足。为了取得苏味道与三苏亲缘的家族历史资料，栾城县政府又筹资一万多元派人到河北大学复印了四部《苏氏族谱》，其中有苏洵首修、苏继芳续修、清光绪年间刻印的48卷（眉山）太石《苏氏族谱》。这些族谱为我县研究苏味道与苏东坡的亲缘关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石《苏氏族谱》探讨了苏氏源流，系统地列出了眉山世族，特别是对“三苏”家族的世系有较明确的记载。依据这部族谱，解决了历史上很多遗留下来的含糊不清问题。

一、苏味道何子留眉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出生在眉山，这是人所共知的。苏东坡的先祖是哪里人，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宋至和二年（1055）《苏氏族谱引》中说：“唐神龙初，长史苏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苏洵在《苏氏族谱》中表列了自苏洵高祖苏铨至其兄子共六世，同时说“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

味道何子留眉，苏味道至苏铨之间的世系，这些谜千百年来一直没被揭开。

苏洵五世孙苏继芳在宋绍兴七年（1137）《眉山苏氏本宗谱系便览》中曰：味道“生子四人：佃、份、倜、碗，留一于眉，不能归，遂家焉。涇、渭，味道公孙也。”又在《眉山苏氏重修族谱说》中曰：“自味道之子家于眉，至涇，期间世次俱不可详。”就是苏继芳在苏洵《苏氏族谱》的基础上第二次续修时也没有说出苏味道的那个儿子留在了眉山。

之后历代的谱序、谱引依然如此。

宋绍兴辛巳（1161）尚书左仆射陈康伯《苏氏宗谱引》：“武后朝，味道公以相位谪刺眉州，迁益州长史，未就而卒。一子不能归，遂家于眉。”

元大德丁酉（1297）苏颂七世孙苏绎《浙东四明苏氏族谱源流》：“味道，唐武后时为相，左迁眉州刺史，一子居眉州”。

清乾隆四年（1739）江浩《苏氏族谱源流四修序》“荣子味道拜相后，贬眉州刺史，卒于官。一子廷献迁眉”。

清嘉庆戊寅（1818）苏述曾《武功书院记》“味道公为眉州刺史，迁益州长史，留一子于眉”。

清同治二年（1863）忠坤公十世孙苏佐治《眉山苏氏七修宗谱源流序》“荣子味道拜相，复为眉

州刺史，一子廷献居眉”。

从宋到清，这些谱牒都没说出是苏味道的那个儿子留于眉山。这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就是到了2000年，在苏东坡的出生地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陈列的《三苏世系简表》仍然是这样向世人展示：

苏章，汉武帝时人，官冀州刺史，其子孙家于赵州，世称赵郡苏氏——苏味道，唐武则天时人，官至宰相，后为眉州刺史，一子居眉州，眉州苏氏自此始——苏新——苏祐——苏杲——苏序——苏洵——苏轼、苏辙。

眉山对苏味道何子留眉以及苏味道至苏新之间的世次仍然没有连接上。

2000年在栾城召开研讨会，因为栾城是苏东坡的祖籍地，苏味道是眉山苏氏始祖，栾城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苏氏世族的渊源。为此，根据我县分赴各地考察团寻访的苏氏资料，以及从河北大学复制来的48卷眉派（太石）《苏氏族谱》和蜀派（新安）《苏氏族谱》，从中了解到了苏味道有四个儿子：佃，膳部员外郎；份，未仕；倬，兖州刺史；惋，职方员外郎。但眉派（太石）《苏氏族谱》在按语中同样注明：“留一子于眉，未详何子”，“老泉公尝云：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至高祖涇则不详。”看了这个族谱，佃、份、倬、惋四个儿子之中，究竟是哪一位留在了眉山，仍然是个谜。

起初有人按照传统观念推理，认为是苏味道的长子苏佃留于眉山。但细分析，苏佃在京都任膳部员外郎，苏味道被贬眉州，苏佃又怎能放下皇宫的差事不干而跟随父亲往四川呢。同样的道理，三子、四子亦有官职在身，也不能脱身去川。那么只能是二儿子苏份了。苏份未仕，完全有可能跟随父亲苏味道入川。联想到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子苏过跟随其父渡海，以此喻彼，此理也就讲得通了。

再看苏颂三世孙苏玘《苏氏世谱原序》曰：“味道出刺眉州，卒于官，二子留眉。至宋有老泉父子。”五世孙苏汉《苏氏分派原序》亦曰：味道“出刺眉州，卒于官，二子留眉，后生明允父子”。“二子”，系指苏味道的第二个儿子苏份。这样次子苏份留眉就有依据了。再联系江浩、苏佐治“一子廷献迁眉”的说法，可以认为，苏份即廷献。现在可以这样理解，苏味道的二儿子，字份，讳廷献，留于眉山。

《龙塘苏氏族谱》卷六载：“味道子，芬，字馥斋庠生，咸亨四年癸酉（673）正月初一时生，

开元十七年己巳（729）六月时没，葬彭山县安镇乡。”彭山县安镇乡，即苏味道十一世孙苏洵葬地安镇乡可龙里，芬、份同音，亦可作为苏味道留眉之子的佐证。

中国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8月21日至24日在苏轼郡望河北栾城召开。与会98名代表中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代表们向大会提交了七十余篇论文。研讨会围绕苏味道、三苏世系的文化研究和三苏的文学成就两个方面展开，为此苏士福根据研究情况，写了一篇论文《苏味道至三苏世系考索》，切入点从“苏味道第二个儿子苏份留于眉山”的论点着手，首次进行了大会论证，此文发到了中国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百与会人员手中，并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揭示了近千年苏洵《苏氏族谱》中“一子留于眉”不知是何子的谜团。这个论点被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认可，评论首载于《天府新论》2000年第6期《中国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同时转载于巴蜀文化网上。评论说：“《苏味道至三苏世系考索》以翔实材料，考证了三苏原本出于河北赵郡栾城苏味道，梳理清晰，世系明确，令人可信。”之后有很多学者先后引用。现在的眉山三苏纪念馆也按此标示。

二、苏味道至三苏世系

苏味道一子苏份留眉揭示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苏味道至苏东坡间的世系。

苏洵《族谱后录》尝云：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至高祖涇则不详。自曾祖新而后稍可记。

到了苏洵五世孙苏继芳二修《苏氏族谱》时，对苏味道的后裔、苏洵的先祖有了初步揭示。

《苏氏族谱》在《眉山苏氏总系》中曰：味道，按唐书，自并州刺史至公十八世，相武后，生四子：佃、份、倬、惋。

涇、渭。按：涇、渭二公皆味道之孙。

涇，公之行述无闻，而世次又不可纪。俾子孙知为新公所自出。

苏继芳在《眉山苏氏本宗谱系便览》中写道：“涇之后有新，新生祈、福、礼、祐、祐五人。祐生宗善、宗宴、宗昇、宗杲、宗晁、宗德六人。杲生序，序为大理评事，生澹、涣、洵。洵为秘书省校书郎，生轼、辙。”

这部《苏氏族谱》仍然没有点出苏味道留一子于眉而家于眉州后，至苏洵高祖涇之间的世次。

为此，研究会翻阅了其他多部《苏氏族谱》以及各种族谱之《序》后，在清乾隆和同治年间的苏氏族谱中发现了端倪线索。

清乾隆四年（1739），江浩在《苏氏族谱源流四修序》中撰道：“荣子味道拜相后，贬眉州刺史，卒于官，一子廷献迁眉，故眉有苏氏，献之长子瓌，为西京留守，后封许国公，徙雍州。其次子瑗，瑗子洸，洸生汝集，集生源榜，榜生冠，冠生祐，祐生杲，杲生序。序生子三：澹、涣、洵。洵子二：轼、辙。”

清同治二年（1863），德化忠坤公十世孙苏佐治在《庐山苏氏七修宗谱源流序》中撰道：“荣子味道拜相，复为眉州刺史，一子廷献居眉，此眉山苏氏所由来也。献长子瓌，为西京留守，封许国公。瓌子颀亦拜相，世称大手笔。献次子瑗，越八世而生澹、涣、洵。洵生轼、辙，世号‘三苏’，文名大显”。

以上二序指出了“味道一子廷献居眉”，下至‘三苏’的世系则是瑗、洸、汝集、源榜、冠、祐、杲，序、洵、轼辙。

但此二序，从文字上没见到苏洵提到的“涇、渭”二公。

“涇、渭”二公究竟指的是何人呢？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原馆长胡惠芬在《眉山苏氏世系略考》中引用《苏氏源流老谱序》云：“若夫四川之有眉州苏，此由味道为眉州刺史，卒于官，一子廷宪居眉，故眉有苏氏，族之最望者也。嗣是而生瑗，瑗生洸，洸生汝集，集生源榜（涇），榜生冠（鉞），冠生祐，祐生杲，杲生序，序生三子：曰澹、曰涣、曰洵。”《老谱序》中只提到了“廷宪生瑗”，而没说廷宪有长子瓌，且注明源榜即涇公，渭公即涇之弟也。

综合以上资料则可看出，味道至“三苏”的世系是：味道一份（廷献）—瑗—汝集—涇（源榜）—鉞（冠）—祐—杲—序—洵—轼、辙。

对于这一研究，在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苏味道至三苏世系考索》中，既揭开了苏味道何子留眉之谜，又考辨补充了苏味道至苏洵高祖涇之间的五世断代谱系，填补了苏洵所言的“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涇则已不详”的空白。此文发到了中国第12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并收

集到《苏氏源流录》一书。2002年栾城县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布展，引用了这个世系，以后各地苏氏纪念馆陆续采用。

三、编著苏氏源流录

第12届苏轼研讨会后，栾城县文化研究会即致力于研讨苏氏家族，只要发现哪里有苏氏族谱，总要千方百计地搜集到手，除掌握《新编苏氏大族谱》外，还先后搜集有眉派（太石）《苏氏族谱》、澄江《苏氏族谱》、湖南龙塘《苏氏族谱》、河南郟县《苏氏族谱》、山东甘泉《苏氏族谱》、云南长沟《苏氏族谱》、广东武功书院族谱、广西桂东南《苏氏族谱》、蜀派休宁（新安）《苏氏族谱》以及闽派福建苏氏等二十多部苏氏族谱。为寻找苏氏资料，研究人员曾数十次到省市图书馆查阅资料。据此，苏士福先后撰写有第14届苏轼研讨会论文《三苏后代行踪略记》、第15届苏轼研讨会论文《苏东坡眉山亲族系年释析》，绘制了《苏味道与三苏世族图》。为将全国各地每个苏氏家族的世系分别汇制在一起，体现一纸一族，世系清楚，一目了然，苏士福亲自执笔，冒酷暑，抗寒冬，历经三载，牍耘不辍，编写了《苏氏源流录》一书。在县政协主席高梅淑的全力支持下，《苏氏源流录》得以出版，2003年首先发放到县政协第九届全体代表大会上，人手一册，继而分送到国内外，这为海内外苏氏族人寻根问祖搭起了又一个过渡桥梁，深受海内外族人的欢迎。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常州东坡公园合编的《苏学通讯》2004年2月15日第8期头版刊头登出“一部汇集苏氏族谱的书籍《苏氏源流录》近日面世”。

四川筠连苏廷芳先生一生酷爱研究苏氏族谱。当他收到《苏氏源流录》后，兴奋万分，当即回信致谢：“苏士福先生：您寄来送我的《苏氏源流录》一书，我于2003年12月15日收到。见书后我非常高兴，当即在邮电局翻阅了一个小时，在回家的路上也在翻阅。近几晚我将书看阅至晚上一点多才休息。该书确实编写得很好，是继《新编苏氏大族谱》、《中华姓氏谱·苏》之后的一本史料和世系较详的叙苏专著。该书问世后将会启迪更多的苏氏后裔寻根问祖，研苏学者更加对苏氏进行深入研究。”2004年，苏廷芳主编的《云南长沟苏氏族谱》，

其中引用了《苏氏源流录》中的 10 多篇文章，并将他在编族谱过程中得到关照和支持的江苏常州苏慎、河北栾城苏士福、河南郑县苏盘根的照片刊登在了族谱上，序言称感谢他们寄来了很有价值的族谱资料。

四川成都苏鹤孙是苏辙 33 代孙，其族人自先祖苏洵始，至清光绪二十五年，曾连续八次撰修《苏氏族谱》，共编有四十八卷。1987 年苏燕孙、苏鹤孙兄弟将几经浩劫抢救回来的全国罕见的家藏苏氏族谱献置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2004 年，当他收到《苏氏源流录》一书后，更加激发了七旬老人苏鹤孙续谱的热忱。为此，鹤孙先生依据老谱，远函近询，采用《苏氏源流录》一书 166 页中的《眉派苏氏世系》图，补充了前谱四十八卷味道至洵高祖斩间的份一瑗一洗一汝集一泾五世断代空白，至 2008 年，历经 20 多年的艰辛，续编、刊印、精装了《苏氏族谱》第四十九卷，归档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香樟族谱柜中，与前四十八卷老谱并存，终于圆了眉派苏氏久而欲知的全部世系之夙愿。苏鹤孙在该卷《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氏源流简述》一文中认同：味道“其子苏份留于眉，眉之有苏氏当自此始”。序二特别提示：以此“供我族人寻根觅祖之需”。

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苏意兰 2006 年全家欢度元宵节时兴奋地说：“得到《苏氏源流录》后，知道了咱们的祖先起源在河北栾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是蜚声中外的著名苏学专家和宋代文学研究大家，兼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栾城县文化研究会会长。接到《苏氏源流录》后，十分高兴，2004 年 2 月 9 日写信评价说：“您的著作对中华民族之苏氏宗族之发展和苏氏文化的渊源研究大有裨益，尤其对栾城赵郡苏氏宗族的发展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希望能将它纳入到研究会的工作规划中才好。”

遍及河北全省、发行量数十万的《燕赵晚报》专门到栾城采访，2008 年 2 月 28 日《燕赵晚报》在第 A10 版用彩印报道了《苏东坡的祖籍在栾城》：“昨日上午，记者在栾城县见到了苏味道的第 43 代后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苏士福。一杯清茶，几本翻得发黄的旧书摆在桌头，60 多岁的苏士福老人戴上老花镜，翻开了一本书，指着几行字说：“看，苏洵自己也说，他的祖上是栾城的苏味道。”



此报道由燕赵晚报记者王朝辉撰文、晚报记者崔婉摄影，随即中国河北经济网、新华网——河北频道、燕赵资讯、衡水等网站原图文进行了转载。

四、纪念苏味道逝世 1300 周年

苏味道是唐武周时宰相，初唐“文章四友”之一，早期格律诗人，其不朽名作《正月十五夜》一诗被称为“古今写元宵节之首”。苏味道于神龙元年（705）病逝于眉州刺史任上，享年 58 岁，其次子苏份留眉，形成眉山苏氏，名震中外的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是其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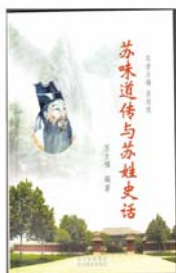
近年来，栾城利用苏味道故里和苏东坡祖籍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打造县城文化品牌，提高栾城对外知名度，先后修复了苏味道墓、清明桥和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出版了《苏味道、三苏与栾城》、《李峤、苏味道年谱》、《苏味道诗译注》、《苏味道与三苏考察万里行》，主办了中国第 12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开发了《味道府》等系列名牌酒，邀请了诸多海内外苏学专家、苏姓名人和苏学爱好者来栾城视察指导，并先后参加了历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与海内外苏学专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广泛开展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苏味道是栾城人民的骄傲，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才华的宰相，他为官清廉，不徇私情，为人和顺谦恭，在栾城人的心目中具有良好的形象。2005 年农历三月十一日是苏味道逝世 1300 周年纪念日，为加强对栾城历史文化名人苏味道研究与宣传，教育人们学习和发扬苏味道的优良品质，激励全县人民以家乡先贤为榜样，争做新时期栾城才俊和国家栋梁，栾城县政协于 8 月 25 日组织召开了纪念苏味道逝世 1300 周年座谈会，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局、县文联以及研苏学者等 20 余人出席了座谈纪念会。

纪念会由县政协主席高梅淑主持，有 11 名同

志发言。会上，县文体局局长牛树增阐述了苏味道故里和苏东坡祖籍栾城的历史文化资源。栾城中学教师张景昌论述了苏味道的文化成就。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馆长付吉生分析了苏味道的仕途晋升与贬迁原由。原栾城县史志办主任董维新、退休教师解志维从史料上论证了苏味道参政的历史背景与策略，指出苏味道是一位“治国能臣、处世俊才”。县文体局副局长王荣菊，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苏士福、张斌分析了苏味道的从政哲学，对“模棱”微词赋有新的解释。县政协干事张景义剖析了苏味道的器识与为人。退休教师檀承琳赞扬了苏味道廉洁自律、正直为人的高贵品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中宝在会上论述了苏味道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肯定地说，继续深入研究苏味道与“三苏”文化，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栾城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这次纪念苏味道逝世 1300 周年活动的情况及论文，由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收集并刊印成了《栾城文史资料专辑》，以便存史资政，留传后代。



五、苏洵出生月日

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味道十一世孙。

2009 年是苏洵诞辰 1000 年，但苏洵到底是在 1009 年哪月哪日出生的呢？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查遍了众多史学家、苏学家、作家的作品资料均未见有记载。苏洵的诞辰纪念日应定在哪月哪日，这就成了一个谜。后来，就请人通过有关资料，结合《万年历》推算苏洵的出生月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的《苏轼研究》2008 年第 3 期发表了一篇征文《苏洵生年、生月初考》，提出推算结果“可断定为 100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30 日之间。”并谨慎地加了编

者按：“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对此有个定论”。

《苏洵生年、生月初考》登载后，引起了文史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栾城收到《苏轼研究》第 3 期刊物，见文末提到了“近读苏士福编著的《苏味道传与苏姓史话》，其 160 页明确表示：苏洵

(1009. 1. 7—1066. 4. 25)，不知出自何处，希望作者能明白宣示”。于是苏士福根据多年掌握的资料，撰写了《苏洵生卒年月日释析》，以文回复：

苏洵，眉州眉山人，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四月戊申二十五日，享年五十八岁，这在《宋史·苏洵传》等史书上早有记载，无可争议。

关于苏洵的出生年份，《宋史·苏洵传》、《墓志铭》、《墓表》中均无明确记载，但从其“治平三年（1066）卒，享年五十八”记载中向上推 58 年，可以确认苏洵“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1009）”，这个出生年份，已为现代诸多史学家所公认。

至于苏洵出生在哪月哪日，查《宋史·苏洵传》、欧阳修《老苏先生墓志铭》、张方平《墓表》、曾巩《老苏先生哀词》、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孙汝听《苏颖滨年表》以及现代出版的《苏洵年谱》、《苏洵评传》中均无记载，因而世人对苏洵的出生月日不太清楚。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像推算苏洵的出生年那样去推算苏洵的出生月日。近几年不少人翻阅了《二十四史》中的宋史人物列传，查读历代学者有关苏洵的著述，都没结果。但在安徽太石两邑 48 卷（眉山）《苏氏族谱》卷之一第 86 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洵，字明允，号老泉，初官文安县主簿，追赠太子太师。生宋大中祥符己酉（1009）正月初七巳时，娶程氏三娘，生大中祥符己酉

（1009）二月廿（二十）八子时，生三子：景、轼、辙，追封成国太夫人。公卒治平丙午（1066）四月，夫人卒嘉祐丁酉（105 年）四月。合葬彭山安镇乡可龙里。”



太石两邑《苏氏族谱》



《龙塘苏氏族谱》

还有湖南《龙塘苏氏族谱》卷六 14 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洵，字明允，晚号老泉，四川眉州眉山縣人。由进士出身除试秘书省校书郎，又官霸州文安县主簿，纂太常因革礼书一百卷，授中议大夫，赠光禄寺丞，加太子太师。宋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1008）正月初六日子时生，治平三年丙午（1066 年）四月十六日戌时没，年五十有八。四年丁未（1067）十月壬申葬眉山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从这两个族谱中可以看出，苏洵的出生月日是“正月初七”或“正月初六”，前后仅差一天。权衡两谱的真实性，相对地说，（眉山）太石《苏氏族谱》的记载比较可信，理由有二：一是本谱所记苏洵的出生年份（1009）准确，与《宋史·苏洵传》、《墓志铭》、《墓表》、《苏颍滨年表》记载一致。二是本族谱是由苏辙的曾孙，即苏洵的重孙苏继芳在苏洵首修《苏氏族谱》的基础上第二次撰修的，继芳生于宋绍圣丙子（1096）九月初二，与苏洵去世仅隔 30 年，继芳或其族人对他们的祖辈苏洵的出生年月日要比旁人更了解。因此，《苏味道传与苏姓史话》一书加以采用，写道：苏洵（1009. 1. 7—1066. 4. 25），即苏洵“生于宋大中祥符己酉（1009）正月初七”，这不是没有道理。进一步说，遵照古人出生下地即按 1 虚岁计算的习惯，苏洵若在 1009 年正月初七出生即算 1 岁，1010 年正月初一就算 2 岁，以此类推，到 1066 年正月初一直至四月二十五日都算 58 岁，符合《宋史·苏洵传》“治平三年（1066）卒，享年五十八”的史书记载。因此，《族谱》中所记的“正月初七生”不能说不能成立。

此文反馈到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后，《苏轼研究》2008 年第 4 期刊登了《苏洵生卒年月日释析》一文，并加了编者按：“上期刊登了《苏洵生年生月初考》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现将苏士福《苏洵生卒年月日释析》刊载，以正视听”。“以正视听”，即肯定现在的说法，矫正过去的所说所闻，份量很重。水落石出，落叶归根，关于苏洵的出生月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9 年 4 月 23 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眉山召开了纪念苏洵诞辰 1000 年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河北代表苏士福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会论文集《苏洵研究》重登了《苏洵生卒年月日释析》，并在篇前加了“内容提要：苏洵逝世的年月日，有明确的记载。但苏洵出生的月日，苏洵的《墓志铭》、《墓表》、《宋史·苏洵传》等文献资料均无明确记

载。从已有史料推断能确定出生年，却不能确定出生月日，本文根据不同藏本《苏氏族谱》的记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苏洵出生于 1009 年 1 月 7 日”。苏洵的出生月日是正月初七，这个出生日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公开首肯。

就在全各地苏学专家纪念苏洵诞辰 1000 年研讨会上，分发了由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主编、长江出版社出版的《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三部传记丛书，其中眉山市文联副主席刘川眉编著的《眉山苏洵》一书第一章就采用了《苏洵生卒年月日释析》的论点，开篇第一句即写道：“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月七日，苏洵出生在西蜀眉州眉山市一个“五世不显”的乡绅家庭。”至此，苏洵的出生月日正式亮相，传记书中有了苏洵出生月日的记载。

六、编著苏味道传

第 12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后，栾城县文化研究会即想给苏味道写一部传记，因为历史名人都有其传记，而《旧唐书》卷九十四、《新唐书》卷一一四列传中的《苏味道》，只有几百个字，过于简略，又没见那部书籍专门写有苏味道的传记。动笔伊始，因掌握的资料很少，仅靠山东烟台师范学院陈冠明教授撰写的《苏味道、李峤年谱》和栾城县景点办汇编的《苏味道与三苏足迹万里行》资料编写，写出来的东西既不系统，又不完善，很难成为一个集子。怎么办，于是就下决心到处收集资料，收集不到的就买，先后购买了成套图书《中国通史》、《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隋唐演义》、《武则天》、《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辞海》、《辞源》、《河北省村镇词典》等，同时参照《栾城县志》、《栾城县地名志》和《苏味道年谱》，由苏士福着手编写。起初，用手工抄写，但因改动太多，草稿乱作一团，面目全非，并且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纸张，后改用电脑修改打印稿本。从 2003 年起，一直到 2006 年，利用四年时间，易稿十数次，耗纸数千张，终于撰写出了一个像点样子的《苏味道传》稿本。该书第一部分是《苏味道传》，采用了传统的古典文学章回小说形式写就，计 22 章，各章标题都由 8 个字冠名，按照时间的先后，客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味道的一生事迹。为验证其真实性，传记增添了附录。附录有二：一是史志资料的佐证，基本做

到了对苏味道的生平事迹记述都有史实出处；二是轶事史料集荟，把唐宋及其后的史籍中有关苏味道的记载汇集起来，并按二十二章的传记式样顺序编排，以便于阅读者查证。

初稿打印装订成册后，先后分送给了本县主要领导和北京的学者专家审查，他们看后，分别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之后又经过多遍校正修订，方将修订稿本送交给了世界苏姓宗亲总会苏永祈顾问，苏永祈看了样本后，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就推荐给了世界苏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印度尼西亚苏用发宗长。此时，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即将在陕西武功召开，大会缺少这方面的资料，经多方沟通，世苏会决定将该书列为大会资料用书，苏用发理事长慷慨表态，资助出版。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副县长李茂昌出头运作，县委书记毛全球作序，成都大学张天健教授鼎力承办出版事宜。印刷之际，正遇“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承担任务的都江堰印刷厂遭破坏，幸亏张天健教授全力抢救印版，费尽周折，才使该书幸免于难，赶在了第7届世苏会前印制完毕。

该书正式出版后，又分送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华书局，四川大学、成都大学、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以及陕西武功、上海苏氏联谊会等处，均得到了他们的好评。中国民族报社主编李升旗先生以及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第7届筹委会首先在武功网站上报道，同时刊登在武功苏氏联谊会、武功苏武研究会通讯2008年10月第15期上：2008年“将于十月在陕西武功召开的《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献礼书——《苏味道传与苏姓史话》已于近日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8年10月17~19日，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如期在中国陕西武功召开，大会将该书分发到了与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美国以及中国1000多名代表手中，一部《苏味道传》散发到了全国，走向了世界，1300年后，苏味道有了自己的传记。

若说此书的价值，正是作者历尽艰辛，搜揽了历代有关苏味道的史志资料，首编了全国第一部《苏味道传》。诚如李升旗主编及网站所评：“通观二十四史与通鉴，苏味道史料极少，每觅一则犹如身临沙海淘金，给写传带来极大困难，然作者系味道栎城本籍里人，惟有知难而上。经年构思，笃志

举笔，数十次易稿，事终成矣。此书的出版面世，填补了苏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苏轼曾在江苏省徐州任太守四年，为民办了许多好事，苏轼离任时，徐州军民倾城相送，万人空巷。2009年中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会议期间发送了几本《苏味道传与苏姓史话》，该市云龙区奎东巷书店得到一部后，如获奇宝，慎为珍藏，并上网高价出售。同年武功门户网站将该书收入了“一批苏姓宗亲著作出版”目录之列。

对于苏味道研究，虽然研究会做了不少探讨，但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研究，诸如：苏味道的文学成就；苏味道的为政业绩；苏味道的人生品德；苏味道与眉派、闽派、武功的世族关系；苏味道在历史上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等等，这些都有待我们继续发掘，深入探讨。

愿有志者共同努力，成就苏味道的研究事业。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河北省栎城县苏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增补李酌为学会副会长

近日，经会长办公会议定：增补中共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酌同志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并担任学会会刊《苏轼研究》执行主编。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
2011年12月12日

偕友访桄榔庵

林开鸿

(一)

春游约趁晓云开，瞻仰名庵结伴来。
绕径何堪新枳棘，抚碑频扫旧苍苔。
兴文重教功犹在，摘叶书铭意未灰。
千载飞鸿留胜概，不期今日委尘埃。

三年野服伦江月，四处弦歌瘴海风。
闭眼可曾消俗虑？陈编犹显济时功。
倡修胜迹终遗憾，唯抱心香仰雪鸿。

注释：闭眼：指佛家闭目参禅的功夫。坡公居庵诗《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云：“闭眼此心新活计，随身孤影旧知闻”。

(二)

垂老投荒道不穷，文星璀璨此庵中。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理事)

和《偕友访桄榔庵》

张志烈

(一)

翛然自得胆胸开，垂老东坡过岭来。
筑室结茅依茂木，杜门面壁伴莓苔。
补天有石心仍壮，泛海乘桴道不灰。
万谷千山钟鼓奏，一庵潇洒出尘埃。

千秋胜地留芳躅，翘首高山拜雪鸿。

注释：三编：指《易》、《书》、《论语》三书。
一集：指陶渊明诗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二)

坎止流行志岂穷，眇观瀛海斗筲中。
三编新注贤才业，一集追攀雅放风。
过子朗吟嗟昔梦，邻儿清诵喜时功。

中秋邀坡仙

王影聪

东坡先生在明月中秋遥望老家，我辈当邀请坡仙回到老家，快乐度中秋。

相思寄明月，
芬芳丹桂飞。
邀约坡仙飘逸回，
举杯同乐尽赏桂，
快乐老家回。

情思圆月明，
芳草天涯随。
把酒祭月盛世美，
千里婵娟长久偕，
千杯也不醉。

2011 年中秋于眉山
(眉山市政协主席)

常州的月亮

王晋川

今年是苏东坡仙逝常州 910 周年，8 月 26 日至 29 日，余有幸参加纪念活动，得小诗一首，以飨先贤。

宋朝的那枚月亮挂在了最后的常州
被汴梁的营营市声喧嚣过的月亮
被杭城的红牙白板咿呀过的月亮
后来被头绾英雄结的关西大汉
手执铁板铜琶击碎了的月亮啊

宋朝的月亮碎成了凄苦的月芽
一芽弯弓齐鲁大地西北望射天狼
一芽叮当成黄楼檐角的风铃

一芽傲立赤壁卷起千堆雪浪
一芽寄身杨柳树下海风写雄魂

九百一十年的岁月是一张网
抖落掉多少浮浮沉沉
九百一十年的岁月是一双手
把那些断片残章捏成一张玉盘
至今还在藤花旧馆浅吟低唱

2011 年 8 月 29 日

(眉山市文广新局调研员、文联副主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凤翔东湖拜苏公

刘川眉

早慕凤翔东湖美名，终于一睹芳容得偿夙愿。

是今年深秋九月的一天，烟雨蒙蒙。虽在想像中几番揣绘其美，但进得门来，眼前还是为之一亮。

宽阔的湖面上碧波粼粼，莲叶田田；沿湖周遭古柳摇曳，奇石峥嵘，翠竹森森；湖心里一座精巧的六角水亭，把湖面巧分为三，亭榭廊槛或坐落于湖上，或掩卧于岸边，交映成趣……

尽管身在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雨中的东湖，含蓄幽静，淡雅相尚，恍若一位水灵灵娇滴滴的江南美少女。

娇美的东湖，其实已有三千年高龄，且身世不俗。远在夏商时期，便被称为“橐泉”。周文王时，相传有瑞鸟凤凰飞鸣过雍，在此饮水，遂更名为“饮凤池”。

不过，那时的饮凤池还只是一池瘦水。而到了北宋嘉祐六年，二十六岁初入仕途的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后，这池瘦水才渐渐丰盈起来。

年轻的苏轼在凤翔任上，见古饮凤池有“入门便清澳，恍如梦西南”之美，于是政务之暇纠工集料，挖掘疏浚，引凤凰泉水入湖，湖中栽莲，湖岸植柳，且在湖上筑了“君子”、“宛在”二亭。因湖处凤翔城东，故复更名为东湖。

在凤翔“磨勘”三年，苏轼不仅政绩卓著，为凤翔历代官民勒于石而铭于心，还留下了180多篇诗文，其中脍炙人口的有《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翔八观》、《凤鸣驿记》、《思治论》等。而凤翔这块凤舞鸾翔的宝地，则回馈给苏轼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关中人刚毅厚朴的性情。

近千载以来，东湖因苏轼而名闻遐迩，因苏轼而出落得更加光彩照人。

宋以后，凤翔人为缅怀苏轼，屡有修葺，湖体不断扩大，今已占地300亩，其中湖水面积8万平方米，形成内外两湖的典雅格局。湖内亭桥轩榭造型

古朴，布局巧妙，且命名全都与苏轼有关。除苏轼当年建的君子亭、宛在亭外，湖心有纪念苏轼、王弗夫妇的鸳鸯亭，湖东有苏轼在此洗过“天石砚”的洗砚亭，湖北有清代建的苏文忠公祠，还有如小娇亭、来雨轩、会景堂、不系舟等。原在北宋凤翔府衙内著名的喜雨亭和凌虚台，业已迁建园内。

雨中漫步湖畔，最可人的是那一棵棵百年古柳。当年修浚东湖后，苏轼带领凤翔人在湖岸“植杨柳千章”，一时柔条婀娜，柳絮飞雪，形成垂柳戏水、水柳相媚好的绮丽景观。此后历代又多有增植，可惜在清代同治年间被一场战乱所毁。后清代名将左宗棠西御沙俄入侵，凯旋途经凤翔时游览东湖，遍觅苏公古柳不见，便命人在湖边植柳百株。今仍存留数棵，粗干虬枝，新芽吐翠，人称“左公柳”。凤翔人有引以为自豪的“凤翔三绝”，即东湖柳、姑娘手和西凤酒，而东湖柳则居三绝之首。

苏轼一生性喜水，曾有诗云“我性喜临水”。这性情，似乎与他从小生活在老家眉山的岷江边上有关。他一生所到之处，与水，特别是秀水美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的风翔东湖、颍州西湖、杭州西湖、徐州云龙湖、黄州遗爱湖、惠州西湖等，无不与他息息相关，无不因他的一颗爱心而焕然一新，无不因他的一支神笔而被激活，生出无限生机。而美丽的凤翔东湖，则无疑是他亲历亲为泽被后世的杰作之一了。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不用说，苏轼是一位仁者，但更是一位乐水的智者。水是生命之母，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柔情万种，能包容一切；“流水有令姿”，流动的旋律中自有无限快乐……

2011年11月13日

（眉山市政协调研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宜居)8月27~28日,为纪念苏东坡仙逝常州910周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常州大酒店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苏、辽宁等20多个省市、港台地区乃至日本、泰国的苏轼研究专家和苏氏后裔,共计200余人与会。

苏东坡钟情常州,“眷此邦之多君子”,曾十多次来常、两度乞居、三次买田,并先后自主择居常州府宜兴、晋陵两县,后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七月廿八日仙逝于晋陵县顾塘桥畔孙

氏馆,即今延陵西路前北岸“藤花旧馆”。今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廿八日),是苏东坡仙逝常州910周年纪念日。

本次会议以探讨“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实践”为主题,共计收到应征诗文作品204篇,其中论文169篇,还有一批书画佳作。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东坡公园、太平寺遗址、红梅公园、天宁寺和东坡终老地——藤花旧馆。

东坡遗址,黄冈名片

——2011年黄冈市东坡文化活动

本刊讯(流水)为弘扬东坡文化,打造黄冈名片,2011年黄冈市先后举办了《东坡赤壁文化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和苏东坡黄州遗址遗迹研讨会。

8月8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和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东坡赤壁文化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在黄州召开。

黄冈市赤壁管理处组织编纂的《东坡赤壁文化丛书》,包括《苏东坡谪居黄州》、《苏东坡黄州名篇赏析》、《黄州赤壁集》、《赤壁之战战地研究史》和《黄州简史》,丛书以东坡文化为主线,赤壁文化、黄州地方文化为背景和补充,系统、全面地展现了黄冈三大文化的魅力。黄冈市副市长费仁平说,这套丛书重现了黄冈灿烂文化,对于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宣传和推介东坡赤壁,展示和提升黄冈形象,帮助读者了解黄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涂普生、方永江、刘醒龙、段维、王兆鹏、

陶梅生、梅大圣等专家学者,对《东坡赤壁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提出了建议。

10月14日,200余人参加了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黄冈市旅游局、黄冈市赤壁管理处、黄州区东坡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苏东坡黄州遗址遗迹研讨会”。

10余名学者交流发言。中国研究学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涂普生总结说,将对宋城遗址、东坡、临皋亭、定惠院、黄冈山、柯山等苏东坡黄州遗址、遗迹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比较、归纳,求同存异,并再次召开专家论证会,正式向市政府报告,请求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办法,或修复,或修葺,或标识,使研究成果物态化,成为新的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的增长点。

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 征稿启事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谥文定。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与父苏洵、兄苏轼同时闻名于世，合称“三苏”，同入唐宋八大家之列。2012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三）是苏辙逝世900周年纪念日，拟在“三苏”故里四川省眉山市举行“苏辙逝世900周年纪念活动”，届时将举行“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为此面向全国征集“苏辙研究论文”。

一、征稿范围

全国苏辙遗址、遗迹地从事苏辙研究的学者、爱好者，以及全球从事宋代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

二、征稿内容

苏辙的生平研究（包括家世研究、生平史料、研究史料等）、思想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等）、文献整理与研究、作品研究、研究的研究等方面选题均可。以下选题供参考：

1. 苏辙研究综述
2. 苏辙的家世研究
3. 苏辙在××（如齐州、筠州等）
4. 评孔凡礼《苏辙年谱》
5. 苏辙革新思想研究
6. 苏辙军事思想研究
7. 苏辙的茶税观
8. 苏辙经学研究
9. 苏辙养气说
10. 苏辙和诗研究
11. 苏辙与苏洵的同题诗文比较
12. 苏辙与苏轼同题诗文比较
13.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赏析
14. 苏辙对北宋文学的贡献
15. 苏辙佚著辑考

三、征稿时间

征稿时间为自启事刊出日起至2012年8月31日止，稿件请发送到《苏轼研究》编辑部，电子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四、征稿说明

论文要求：内容提要50～200字，关键词3～5个，论文注释采用尾注。在稿件首页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尾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职务职称、邮政编码、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QQ，以便联系。优秀论文将选择刊发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收入全国首届苏辙研讨会资料汇编《苏辙研究》。部分作者将邀请参加此次研讨活动，未参会作者将赠送书、刊。

联系电话：028-38299092

苏辙逝世90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
2011年11月16日

项目合作，成果卓著

本刊讯（刘清泉）11月14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与乐山师范学院合作项目《三苏文化资源研究与建设》完成预定研究目标，顺利结项。

这是双方继《苏轼军事思想研究》后又一合作成果。其成果主件《三苏研究数据库》欢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及与学会联系密切的苏学研究者访问，地址：<http://lib.lsnu.edu.cn:88/sansu/>

近年来，由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与眉山市社科联合作承担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008年度）、《东坡文化符号与文化创意》（2009年度）和《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2010年度）均属于填补学术空白，前两者已获省、市政府奖。前者研究专著《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年3月），中者研究专著《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获眉山市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1年7月），后者研究成果获鉴定组专家首肯，即将结项。